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4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56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85,000册

书号11310·21 定价1.2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回 忆 录

- 初到陕北 李维汉 (1)
- 长征中的红一师 李聚奎 (21)
- 对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历程的回忆 许涤新 (64)
- 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
的一些情况 刘 晓 (87)
- 从山东到太行 肖 华 (108)

人 物 介 绍

- 长征中的彭德怀同志 蒋宝华 (129)

中共中央南方局 党 史 资 料

- 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
岁月 钱之光 (178)

从第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 阳翰笙 (224)

香港《经济导报》的创刊及其活动

..... 赵元浩 雷起予 林 铃 方卓芬 (263)

初到陕北

李维汉

编者按：李维汉同志生前嘱我们转告读者，对他的回忆录“敬请提出批评建议。”意见请寄本刊编辑部。

（一）陕北苏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苏区，胜利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后，陕北就发展成为我党的革命大本营，延安成为我党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

1. 陕北苏区的概况。陕北苏区和红军是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发展起来的。一九三五年二月以前，在陕北存在着地域隔绝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一是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归陕西省委领导，拥有一支红军队伍，即红二十六军；一是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归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领导，也拥有一支红军队伍，即红二十七军。一九三

五年二月初^①，双方经过协商，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和西北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②），实现了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谢子长负伤去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六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联成一片，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建立了二十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五千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人，革命形势是很好的。

一九三五年七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同郭洪涛、聂洪钧^③等一起，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九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川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随后召开了永坪会议，撤销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朱理治等组成“中央代表团”^④；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钧任主席。

当时，陕北苏区面临的任务是如何粉碎敌人从七月开

① 一说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时间是在一九三四年底。

② 一说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刘志丹。

③ 一九三四年一月郭洪涛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陕北。一九三五年五月聂洪钧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陕北。

④ 代表团的名称，现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央代表团”，一是“中央北方局代表团”。

始的第三次“围剿”。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歼敌东北军一一〇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约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中立，参谋长裴焕采。十月二十五日，在榆林桥又歼敌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加强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但是，“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又发展到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错杀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2. 党中央到达后的紧急措施。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贾拓夫于一九三四年代表陕西省委到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会后，留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任总政破坏部部长）。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来到下寺湾，听取了郭洪涛的汇报。党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由洛甫、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我率中央机关从下寺

湾直接去瓦窑堡（陕甘晋省委驻地，苏区的中心），并指定王首道到瓦窑堡查处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战第三次“围剿”的敌人。

3.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在西北建立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劳山、榆林桥两个战役击败了敌人，但未能粉碎“围剿”，敌人又以五个师的兵力再次来犯。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郿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合水、庆阳，沿葫芦河向郿县方向进犯。不粉碎敌人的进攻，就不能彻底击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十一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甘泉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共同商量决定了直罗镇战役计划。十一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十五军团会同作战，歼敌一〇九师，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终于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方面军营以上的干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央领导我们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二）参加纠正错误肃反

上述发生在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的陕北错误肃反事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

的产物。由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及时地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但关于错误肃反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最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这就为西北光荣历史的编撰扫除了路障（详见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二十八号文件）。

下面简述我参加处理这件公案的史实：

1.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

2.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开了一次平反会，洛甫、博古、刘少奇等出席，五人委员会也都参加了。记得这次会是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他们以后也作了检讨。

3.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的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边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太合理的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4. 一九三七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期间，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同志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回延安后，我向毛泽东、洛甫作了反映。

5. 我肯定过三点史实。一九八一年，我为了搜集在延安工作时期的资料，到了西安。一些从事党史研究和党史讲授的同志对我说，高岗问题发生后，边区党史不好讲了，要求我讲讲这个问题。我在座谈会上讲了话，肯定了三件史实：第一，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位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讲话记录送原陕北、陕甘边几位负责同志看过，都表示同意。

（三）参加瓦窑堡会议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在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以后，于十二月初到瓦窑堡。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在洛甫住的窑洞里召开，由洛甫主持。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和我（名单可能有缺漏）。

会议主要讨论抗日问题。会议前夕，张浩（林育英）于十一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奉共产国际之命，装扮成商人经外蒙古、内蒙古到达瓦窑堡，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消息和季米特洛夫在“七大”上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中心是论证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会上，毛泽东作了发言，并进行了充分的真认的讨论。在会议开始时，博古仍有“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很快取得了一致。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

瓦窑堡会议结束以后，十二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比较多。会上，由毛泽东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强调了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是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是毛泽东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进一步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它纠正了党内在很长一个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

瓦窑堡会议以后，党中央便利用一切可能向国民党上层、一切爱国人士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工作，并派刘少奇去领导华北的工作；稍后又派冯雪峰去上海接通党的关系。从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陕北，更是上上下下一起开展争取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的活动。吴亮平主编的《打回老家去》小报，与各地的口头喊话相结合，在东北军的下层中有很大的影响，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四）中央机构和地区组织的变动

党中央初到陕北时，中央机构作了相应的变动。在瑞金时，苏区中央局是履行中央职务、领导全国工作的；到陕北后，改称为西北中央局，同样领导全国工作。西北中央局内部分设：宣传部，部长洛甫兼，副部长吴亮平；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组织部，部长是我。

军委和政府机构也有变动：

遵义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朱德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没有变动。会后政治局常委又进行了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当红军离开遵义继续长征不久，党中央又先后决定博古的职务由洛甫代替，负总的责任；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军事行动。到陕北以后，改设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办事处主席博古，财政部长林伯渠，粮食部长邓发，土地部长王观澜，国民经济部长崔田民，教育部长徐特立，司法内务部长蔡树藩，工农检查局长罗梓铭，劳动部长邓振询。后又设立外交部，部长由博古兼任。

同时，陕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分及领导机构也作了变动。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把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以下寺湾为界，下寺湾以北为陕北省，下寺湾以南为陕

甘省)，并设立了三个特区。这样，党的领导组织就有陕北省委、陕甘省委和三边、神府、关中三个特委。

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宣传部长贾拓夫，组织部长王达成，妇女部长白茜（后为史秀云），工会主席高长久（兼工会党团书记），军事部长钟赤兵，少共书记慕纯农。省委机关在瓦窑堡。

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宣传部长李一氓，组织部长欧阳钦，白区工作部长张策，军事部长肖劲光。省委机关在甘泉下寺湾。陕甘省所属的地区面临东北军、西北军的驻地，在主力红军东征期间，许多地区如甘泉、鄜县等被他们占领了，所以工作困难很大。省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苏区、地方武装和党的组织，同时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三个特委为：

1. 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他在江西“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受批判后，调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来参加长征，一路工作积极负责，到达吴起镇以后，党中央派他在吴起镇一带消灭土匪部队。特委成立后，由他任书记，慕生忠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刘景范。独立营营长杨琪。一九三六年发生三边事变，谢维俊被叛匪杀害。

2. 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宣传部长张江全，组织部长张秀山，少共书记张汉武。红三团团团长王兆相。对于神府特区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开会作了研究。毛泽

东、洛甫、邓发、张浩以及贾拓夫、王达成、杨和亭、张江全等参加了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方很重要，是个抗日前哨！”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到对地主、富农的政策。他说：对地主，在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以后，要和农民分同等的土地；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不分浮财。

3. 关中特委，原为陕甘边南区党委，改为关中特委时，派贾拓夫为书记（后由习仲勋接任），张德生为组织部长，黄春圃（江华）为司令员，秦鲁秀为苏维埃主席，张邦英为副主席，陈国栋为游击队指挥。

以上是初到陕北的情况，以后有改变。

（五）中央组织部的工作

当时的中央组织部机构精简，只有一个部长和两个科：干部科和组织科。干部科长郭滴人，组织科长金维映，总共只有几个人。由于瓦窑堡会议以后全党的工作都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目的进行，中央组织部也不例外，组织科主要是参与和帮助当地的工、农、商、学、妇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干部科管理中央党校的招生和毕业分配及其他干部的调配工作。

我同时照管陕西省委的一部分工作，出席陕西省委的会议，并且在中央党校教“党的建设”课程，也参与中央党校的建设事宜（中央党校的情况将另篇叙述）。

党中央迁到保安以后，中央组织部还负责打通对外联系的工作。如陕西省委的汪锋、孙作宾，上海的董健吾牧师等，都是我接待以后报中央安排工作的。冯雪峰就是在接待董健吾牧师以后，经组织部派到上海接通关系的。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我离开中央组织部。

（六）联系陕北省委的工作

陕北省委在瓦窑堡被高双成侵占以前，与党中央驻在一起。我刚到瓦窑堡时，洛甫就要我联系陕北省委，参加省委的会议和某些工作。在此期间，我主要参加了省委的下列工作：

1. 帮助扩大红军。一九三五年末到一九三六年初，党中央要求陕北省委扩大红军七千人。这是陕北省委一项没有经验的工作；陕北地广人稀，要扩大这么多的红军难度很大。我帮助省委召集各县领导干部会议，介绍中央苏区扩红经验。一九三六年一月，基本完成这次扩红任务。之后，省委又召集包括各县领导干部在内的扩红活动分子会议，确定三月底以前继续扩红二千六百人。在这次会议上，我又介绍了中央苏区的经验，并帮助总结了上次扩红的经验。最后完成了扩红计划。

2. 参与修订各项政策。党中央逐步将各项苏维埃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改变，使之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富农策略的改变。刚到瓦窑堡

时，洛甫就要我研究和起草关于中立富农政策的文件。我和王观澜、郭洪涛等共同研究，并主持起草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发出的《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这个决定强调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是富农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甚至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决定指出：“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这样的改变，可以使富农对苏维埃政府采取善意中立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大的带有根本性的转变。

根据中央关于中立富农政策的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颁发了一个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佃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以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征发及特殊税捐”。同时，土地政策也作了调整，如一九三六年八月

六日在《红色中华》报上公布《土地政策新的改变》，规定地主在没收其土地财产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对于小业主的土地不没收；对于大农业企业主按已公布的对待富农的政策办理等。

商业政策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颁布布告，规定完全取消对苏区工商业的一切税收，包括营业税和关税，不仅苏区内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而且“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

除了改变若干经济政策外，政治上的政策也有明显的变化。西北办事处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公布的《西北苏维埃选举法》，和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颁布的选举法比较，有如下重大的改变：第一，一切脑力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第二，雇佣工人在十人以下、资本在五千元以下之工商业主也有选举权。第三，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可获得选举权。此外还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基本原则草案》，发表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

上述各项政策的修订，我都或多或少地参加了一些工作。

3. 参加讨论和组织地区工作。我与陕北省委的同志

一起，讨论过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和办法，讨论过神府特区的工作，特别讨论了内蒙地区的工作，主要是伊克昭盟的工作，帮助组织了以高岗为首，贾拓夫、曹动之参加的内蒙工作委员会。内蒙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靠背，党中央到陕北后，是始终重视内蒙工作的。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内蒙工作委员会撤销，成立中共少数民族委员会，将回族工作也包括进去。

4. 做东北军的工作。我们还讨论和发动群众利用《打回老家去》小报的内容进行喊话，做东北军士兵的工作。为此设立了许多工作站，我们在工作站活动，东北军士兵见了也不开枪，说明我们的争取工作是有成效的。

这个时期，我和陕北省委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总政策。

党中央迁到保安后，我随中央到了保安，陕北省委迁至安定县（今子长县）谭家营，我和陕北省委的联系就断了。

（七）在定边三个月

1. 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叫我去他那里。我到达时，宋任穷已在座。毛泽东对我说：准备打宁夏，夺取银川，因此要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要我任工委书记，宋任穷（驻防军政治委员）、宋时轮（驻防军司令）、高岗、贾

拓夫为委员，与定边、盐池县委密切合作。大约九月二十二日，我同宋任穷一道去定边。临行前，洛甫对我说，组织部的工作由他照管。到定边十多天后，接到他的来信说，中央认为中央组织部长改由陕北同志担任为好，决定由郭洪涛接替我的职务。我立即去信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后来知道，是博古任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我的免职是出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的要求。

定边工作委员会做了下列工作：同定边、盐池两个县委商定了白区工作计划；查明了吴忠渡河点和攻城有关的一些情况；组织了回民游击队，为团结哥老会开了香堂。工委的第二项任务是加强内蒙的工作，做了一些伊克昭盟的工作，但不多。

定边工作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情况变化，原计划取消，工委宣告结束。

2. 组织筹粮委员会。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和静宁会师，经过山城堡对敌战斗后，全部后撤休整。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驻在定边附近。党中央又电示我和董必武（中央党校校长。当时中央党校也迁到了定边）负责组织筹粮委员会，高岗、贾拓夫均为委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我去总指挥部。彭问我筹粮情况，我说，只能保证三个月。他说，可打安边。我说，也筹不了多少。他说，中央在考虑来个“小长征”，打到汉中去。

从彭处回定边不过两三天，又接到他的电报，说发生

了西安事变，捉了蒋介石，红军主力即日南下，不用再筹粮了。筹粮委员会也就结束了。

（八）任陕甘省委书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旬，中央来电要我回保安。我想绕道庆阳同富春谈谈江西“反罗明路线”的教训，去信约他在庆阳会晤。到庆阳时，蔡畅在等我，富春未到，未能多交换意见。

回到保安，洛甫告诉我，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委，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推进。并决定我为省委书记。现在记得的省级干部有：张邦英、李华生、杨一木分任组织、宣传、统战（白区工作）部长，申力生任秘书长；刘景范、霍维德为省苏维埃正、副主席，艾禁南为财政部长；白向银为团省委书记，黄静波为团省委宣传部长。省委驻地在黄陵县店头镇。当时，省委的大部分负责人已经前去省委驻地。洛甫要我立即去延安同郭洪涛接头。到延安后，郭洪涛要我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间道去关中特委，在那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影响，邦英打个招呼，互相戒备，互不侵犯，就过去了。一路很顺利，很快到达关中特委驻地淳化桃曲河，见到了特委书记习仲勋。

我们从特委了解了特区的情况，并初步商订了向南发

展的计划，等候前敌总政治部约我们去商谈。

住在特委期间，上午我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了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也谈了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他们谈，我只提问题，从无知到有知。有时我也谈些他们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我们还去过正宁、宁县两个县委，同县委的同志谈过话。

在关中特委住了几天，得到任弼时（前敌总政治部主任）的通知约我去前方接洽。我和张策在淳化县城见了。他告诉我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还很难确定。我们一起商定了向南发展的计划。我当天即回特委，又同特委进一步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耽搁了一些日子，我才动身去省委。出门走不到一里路，通讯员赶着送来中央给我的电报，通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省委结束，人员回延安。我回去同习仲勋谈了请他按新的形势部署工作之后，仍向省委驻地店头镇前进。

到店头镇后，开了两天会，彼此汇报了工作情况。又召集了几个新解放县区的领导同志，讨论和部署了新区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省委结束。工作人员回延安时，经过甘泉、鄜县。数月前，这两县县城由国民党的县政府保安团队控制着，我们曾想打下甘泉，但未成功。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影响和我们的统战工作，这两个县城已成

了统一战线区。在这里成立了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抗敌后援会”。我们进了这两个县城，曾在郿县县城住了一夜。

（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党中央建立新的革命大本营计划基本实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深入中国本土的危急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等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接受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发动了震动全国的爱国义举，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们在定边获悉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这是革命人民对蒋介石多年来坚持独裁卖国反动统治的深刻仇恨的自然反映。但党中央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建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一件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事情。当时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并企图取代蒋介石。在西安，我们一方面要对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宣传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个根本条件。在这方面，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做了很多很艰巨的工作；同时，在国民

党区域，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事变得到合理的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同意实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准备全国的抗战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至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相对稳固，党中央建立新的革命大本营的计划基本实现。

(宋金寿协助整理)

长征中的红一师

李 聚 奎

五十年前，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那时，我是红一军团一师师长，亲身经历了这一震惊中外的伟大壮举。下面记述的仅是我个人在一师的经历和感受，不是一师的全部历史，而且由于年代久远，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疏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在一师工作过的同志予以补正。

从 兴 国 出 发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但是，开始党中央并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提出什么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即在部队出发的前几天，我们红一师还在江西兴国县属的高兴圩同敌人进行堡垒对堡垒的战斗。一天上午，军团长林彪来到我们师指挥所，告诉我们把部队逐渐收拢起来，把阵地移交给五军团的第十三师。但这时他只跟我们说部队有一个大行动，并没有提到要离开苏区的问题。

十月十五日，我师刚收拢集结于兴国县的东南地区，

军团司令部即派机要参谋送来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交我和政委亲收的绝密信及中央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和行军路线图。信中指定一师（包括军团供给部、卫生部）为军团右翼队，于十月十六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古陂前进。同一天，上级给我师补充了几百名新战士，一批子弹和五百块大洋。我师长征就此起步。

那时部队由一个区域作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作战，是常有的事情，尤如家常便饭。但是过去部队转移，只要条件允许，军团首长总要开会讲明情况，面授任务；遇到情况紧急时，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照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均不得而知。后来我们才知道，红军主力这次转移，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强调军事保密，不但我们当师长的被蒙在鼓里，就连军团首长也不了解全部意图。

这样，我们部队离开兴国时，不但来不及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而且个别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也来不及通知。这除了因为时间仓促之外，还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会离开那么久、离开那么远。但是根据地的群众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还是从我们的行动上感觉到红军主力这次转移不是一般的战斗

转移。因此，在部队出发那天，他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聚拢来了。

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

在队伍行进的道路两旁，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往战士们的口袋里装，有的拉着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地“呜呜”哭了起来。一时间，队伍成了军民汇集在一起的人流……

这时，全师的指战员们心情异常沉重。大家都为红军离开根据地后人民的安全担忧，许多人泪洒衣襟，同乡亲们依依惜别。为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带着几名干部暂时留在后面，并给乡亲们做一些当时所能做的解释工作，告诉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就这样，我们红一师离开了生活、战斗多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告别了夹道送别的亲人，踏上了新的征途。

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整个方面军出发时，一军团为左前锋，三军团为右前锋，中央纵队居中，九军团、八军团分别配置在中央纵队的左右两翼，五军团殿后。这次部队行动，既象一次大搬家，又象一台四个人抬着走的轿子。大批辎重，如兵工机器、印刷机，也随军转移，真是负担沉重，行动笨拙。这

种甬道式的行军队形，使所有部队几乎都成了掩护队，行军、作战都受到极大影响。确实“像叫化子打狗似的”，只能边走边打。

十月二十一日，我师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袭占新田。这里是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的一个重要阵地。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团。我们猛攻了一个下午，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当天晚上敌人就跑了。与此同时，红二师六团袭占金鸡，红三军团袭占古陂，也旗开得胜。

全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十一月三日，红一方面军在城口附近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大概由于红军主力转移已经无密可保，这时，上级才正式通知我们说，红一方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座大山，高耸入云。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进的速度减慢了，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而湖南、广东敌军则乘机从两侧向我军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衔尾紧追。由于敌人的三面逼迫，全军和中央纵队都挤到一路上来了，情况十分紧张。这时，我一师正在粤汉路以东与广东敌人进行战斗，接军团首长打来的电话，令我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命令要求：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我当即令一、二团继续抗击敌人的进攻，带红三团从阵地上撤下来，赶到全

军的前头。

就在这里，我们遇见了随中央纵队行军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那时他们正在路旁休息，见我带着三团上来了，没等我开口报告情况，周恩来同志就说：

“你们来得好快呀！”

我一听，知道首长们已了解我们是来担负前头开路任务的，就没有说什么。接着，周恩来同志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划好的箭头，告诉我应从那里前进，并告诉我在行进中在那里放一个排，在那里放一个连，以担负警戒。然后周恩来同志嘱咐说：

“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我一边领会首长的意图，一边考虑队伍如何前进，并随着周恩来同志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所作的一个个标记，计算着一路上需要撒下多少部队，然后又琢磨着最后如何才能收拢这些部队。当时我感到部队撒下太多，战线拉的太长。周恩来同志看出我的顾虑，就笑着给我解释说：

“你不用担心这样会把你们部队分散了，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去接替你们的，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继续前进，这并不影响你们执行前卫的任务。”

周恩来同志布置完任务后，毛泽东同志接着对我说：

“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

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兰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后面就跟着你们来。”最后毛泽东同志又强调说：“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也是他受王明路线的排斥，离开中央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一年多没有见了，此时见到了他，我心里特别高兴。尤其是这次又听到他所说的，大方向是什么什么，具体的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一类过去很熟悉的指示，心里顿时就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毛泽东同志的话音刚落，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就连声说：“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很尊重的。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后来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我带红三团受领了前头开路的任务后，由于聂荣臻同志及时指挥红二师四团占领了乐昌附近的制高点——九峰山，再加上三军团从右翼占领了良田，这就从南北两个方

向掩护了中央军委纵队，也使我们作为中央及军委纵队开路的部队安全地通过粤汉线，并为随后通过宜章城创造了条件。

我带领三团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宜章县城后，杨得志同志率领的红一团也赶到了，紧接着红二团也上来了。于是全师继续向嘉禾、兰山前进。可是当时这两个县城因守敌早有准备，设防严密，如要攻占县城须费时间。恰接军委来电，令我们除派少量部队监视两城之敌外，部队不要停留。于是我们继续西进。

部队通过嘉禾、兰山后，横在我们面前有两条由南向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两江相隔一百多华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已尾追上来了。湖南何键的部队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从两边步步逼近。敌人企图合击我于潇水之滨。因此，先敌占领这一带的大渡口——道县，并迟滞追赶之敌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军团首长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红二师，把阻击追敌的任务交给我师。十一月二十二日，红二师四团，在团长耿飏、政委杨成武同志的率领下，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潇水岸边的道县获得成功。我师抵达潇水西岸后，立即展开部队，在四十里的正面上阻击敌人。当中央纵队从我师控制的地段渡过潇水后，军团首长命令我师继续向湘江前进。这时，我师的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我先利

用当地的长途电话线同五军团司令部联系，告诉他们我师要立即往前赶，请他们的部队向这里靠拢。电话中传来了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的声音，他说：“同志呀！你们的队伍现在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有上来哩！”我又到驻在附近村子里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那里，向他报告了我们军团首长的命令和刘参谋长的指示。彭德怀同志听了我的报告后，就说：“刘伯承同志的意见很对，潇水西岸不能给敌留下空隙，只有保住西岸，并给追来之敌以一个歼灭性的打击，才能使已经过河的中央纵队和部队更远处脱离敌人，放心前进。所以，你们师不但现在不能走，而且我们三军团的六师还要暂时归你指挥（当时六师师长曹德卿同志因病不能指挥）。至于—军团命令你们往前赶，由我同你们军团司令部联系说明。”我素来了解彭德怀同志的脾气，知道他决心一下，就不容更改，只好坚决执行。因此，除二团已随军团司令部向湘江前进外，我和—、三团继续留下防守潇水西岸。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师大部分部队和三军团的六师一起在潇水西岸阻敌，敌人一次又一次向西岸冲来的渡船，被我们打沉了，一批又一批企图泅渡过河的部队，被我们消灭了。潇水成了敌人不能逾越的障碍，敌人只能望河兴叹，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在潇水西岸迟滞追敌两天以后，撤出战斗，继续向西进发。

红一方面军从十月中旬离开中央苏区，到十一月中旬

相继突破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随后又打击了敌人的追击部队，渡过了潇水。在这段时间内，总的来说，由于我红军广大指战员猛打猛冲，英勇善战，再加上敌人的地方军阀各有各的打算，貌合神离，我军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可是，红军一向湘江挺进，立刻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暴露了我军的行动目标。于是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在湘江两岸纠集了二十个师的兵力，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当时敌人的部署是：前面，国民党中央军薛岳所部和湖南军阀何键所部，集中于零陵、东安、全州一带，沿湘江布防；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所部，集中于兴安、灌阳一带布防；后面，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的部队和湖南军阀李云杰的部队衔尾紧追。敌人企图利用湘江这一天然障碍，消灭我红军于湘江之滨。因此，湘江一仗，是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一仗。

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师撤离潇水西岸，昼夜兼程赶到了全州附近的觉山（即脚山铺）地区。当时，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由于害怕红军南下深入广西，自动放弃兴安、灌阳一带的防线，将兵力南移到富川、贺县、恭城一带，这就使中央纵队得以顺利地接近湘江东岸。但驻守全州之敌刘建绪部见我主力红军要渡湘江，就急红了眼，于是从全州倾巢出动，猛攻我觉山阵地。

觉山，北距全州三十来里，南离我军控制的湘江渡口

五十多里，是敌人进入我军渡口的咽喉要地。我师到达觉山时，红二师已在这里同敌人血战了一天。因此，虽然我师部队长途行军，非常疲劳，但仍紧急动员，同红二师一起阻击从全州方面进攻的敌军。当天下午，阵地被敌夺去。第二天拂晓，我们组织反击，失去的阵地一部又被我军夺回。以后敌人三个师在六、七架敌机的掩护下，向我正面猛扑。我第三团在下坡田附近阻击敌人，先后击退敌人的五、六次冲锋。第三天，敌人见正面进攻不能奏效，遂改变了战术，除继续加强正面进攻的兵力、火力，以压制我们外，还以大部队迂回我们整个阵地后方和侧翼。此时我们的部队，虽然连续四个晚上未睡眠，一天多时间未吃饭，身体极度疲劳，但仍同敌人争夺前沿阵地。不少阵地是在战士全部阵亡后，才被敌人夺去的。

觉山阻击战，由于敌众我寡，敌逸我劳，终为敌所破。但我军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仍给敌以巨创，迟滞了敌人的截击，这对于掩护整个部队渡过湘江起到了作用。

在我们一军团于觉山与敌人血战的同时，三军团、五军团也在湘江东岸同追敌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激战。他们也都打得很艰苦，损失很大。

湘江一仗，虽然全军指战员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不怕牺牲，英勇苦战，最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部队拖垮了，一些部队打散了；重武器、印刷机、兵工机械，以

及文件、钞票被扔进湘江里了；全军人员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为三万多人。

遵义会议前后

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后，广大指战员眼看部队损失严重，人员骤减，无不痛心疾首。那时我们的心情，正如刘伯承同志在他的《回顾长征》一文中所描写的：“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红一方面军一渡过湘江，蒋介石就觉察到我红军要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于是他一方面调集刘建绪、薛岳两部主力十多万人，配置在湘西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武冈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一方面在我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构筑碉堡，设置新的封锁线，全力堵击红军北上。

与此同时，地处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北进，在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曾向敌人发动强大的攻势，并消灭了敌军两个师，占领了澧州、桃源，威胁常德。但因城步、武冈已被敌军占

领，红一方面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被堵住了，要实现原来的计划已经成为不可能。

面对这种情况，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仍企图孤注一掷，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一方面继续电令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地区向湘西北发展，一方面强令红一方面军北上，准备以疲惫之师去同数倍于我之敌决战。我军处境万分险恶。

那时毛泽东同志虽身处逆境，但仍时刻关注着党中央和红军的安全。他在随部队渡过湘江后，既目睹了我军在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人员天天减少，部队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又获悉了蒋介石已在我军前进的道路上布下口袋、设下圈套的严重情况，深感我红一方面军若不改变战略方向，继续向北，就可能投入敌人的罗网，招来全军覆灭之灾。于是他在行军途中，今天找这个谈谈，明天和那个聊聊，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题，从而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

十二月十一日，红一方面军占领湖南通道。这时，中央负责同志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坚决主张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以摆脱湘西之敌，争取主动，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以休整，恢复体力，提高士气。毛泽东同志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但仍未能说服博古及李德等人。

十二月中旬，大概是在通道会议的一周之后，我一军团先头部队向贵州黎平前进。驻在黎平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周芳仁旅一个团，在我先头部队尚未到达之前，就弃城向十万坪、五里桥撤退。贵州敌军这种望风披靡、狼狈逃窜的情形，同湖南、广西军阀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顽强战斗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引起了到达黎平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

同时，中央领导同志还了解到，贵州军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这四个派系名为统一，实则各据一方，时常内讧。王家烈虽名为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主持贵州军政，但实际上能够由他指挥的部队只有两个师而已。还了解到，贵州的统治者为了开辟财源，中饱私囊，除立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公开宣布开禁鸦片烟。种鸦片烟、吸鸦片烟的到处可见，富人靠鸦片烟发财，穷人抽鸦片烟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老婆。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特别是军队也抽鸦片烟，被称为“双枪兵”（一杆步枪加一杆烟枪），战斗力较差，比较好打。综合这些情况，更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贵州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军贵州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这样一来，就把国民党十几

万部队甩在湘西，使中央红军得以避免陷入绝境。这是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同志之后，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的问题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这可以说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端，是尔后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的基础。

我师离开黎平以后，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一个小镇上休息，恰遇中央纵队的前梯队通过。他们听说一师师部在这里，也停了下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我们师部。那天，我们炊事班刚好宰了一口猪。我们师的几个领导，一面让炊事班准备饭，一面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等几位领导同志互相插话，气氛十分热烈。其间，毛泽东同志说话最多，他谈话的中心是询问我们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汇报完以后就开饭。那时招待首长吃饭，只要有点肉，就算是好饭了。首长们边吃边谈，笑语不断，连半个多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中央领导同志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我们猜想，一定是在什么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肯定的意见。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向我们提起，所以我们也不便于发问。

中央领导同志吃完饭正要出门时，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同志用手往后一指，告诉李德：

“里面有饭，快去吃吧！”

本来毛主席对李德说的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可是后来人们把它变成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了。我们觉得这样说不太好，但一下也纠正不过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大家对李德确实很反感，特别讨厌他那一套论调：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三十多个县，十万军队，是一个国家呀！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就是正规军，应该打正规战，应该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呀！还有什么短促突击呀！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积小胜为大胜呀！记得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的時候，有一次他在一军团的师、团长会议上，给我们讲“短促突击”的战术课，从头一天晚饭后，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更加讨厌的是他纸上谈兵，完全凭地图指挥部队打仗行军。至于地图准确不准确，部队吃上饭吃不上饭，有没有睡觉休息的时间，这些他全都不考虑。所以，广大指战员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他，也是可以理解的。

部队到达剑河时，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就发下来了，当即由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向我们师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当我们听到“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时，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当我们听到“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

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我们又会心地微笑了。因为感大家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随后，中央红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分两路挺进。一路上连战皆捷，进军迅速。十二月底，全军部队逼近乌江南岸。当时中央军委授命一军团先渡乌江。我红一师在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进抵回龙场渡口。时值新年，但部队指战员没有举行联欢，而是组织讨论如何完成突破乌江，拿下遵义的战斗任务。

这时贵州军阀的军队在沿江各渡江口构筑江防工事，妄图凭借乌江天险，抗拒红军于乌江南岸。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在尾随我军进入贵州后，也已到达黄平、三穗、镇远一带。因此迅速强渡乌江，就成为红军头等的紧迫任务。

我师在回龙场组织强渡时，由一团任前卫。一月二日，指战员们不顾风雨交加，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同志的带领下，一方面用火力压制对岸敌人，一方面组织十几名勇士，选择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三日上午强渡成功了。全师及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与此同时，红二师也在江界方向经过同敌人的激烈战斗之后，于三日渡过乌江，并首先占领了遵义城。

一月十五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就在这里胜利召开了。

我们党从军事上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使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那种极端艰险的条件下，能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并随后实现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都是开端于这次会议。

遵义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战役，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转危为安的关键。它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直接反映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成果。

我一方面军攻下遵义之后，蒋介石纠集了湘、川、桂、黔各军阀部队以及嫡系薛岳兵团共一百五十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急进，妄图围歼我方面军于乌江西北的狭窄地区。

此时，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虽然尚未成立，但通过遵义会议，博古同志领导全党之权和李德指挥军事之权实际上已取消。而毛泽东同志已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为了打破敌人企图从四面八方围攻我一方面军的严重局面，一方面决定乘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指挥红军由遵义地区向川南前进，北渡长江；一方面要求在川陕边境的红四方面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之前，密切协同作战”，西渡嘉陵江南下，牵

制川敌，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于长江一线。同时要求在湘鄂川黔边境的红二、六军团积极向东出击，牵制湘鄂之敌，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

当时，中央确定一方面军向四川进军，北渡长江，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宜宾到泸州一线。

一月十九日，遵义会议刚刚结束，一方面军即分兵三路挥师北上，向赤水县方面前进。我红一军团从桐梓出发，于一月二十三日进占东皇殿（今习水），驱使黔敌侯之担部向西北逃窜。随后我红一师为全军开路，经猿猴场向旺隆场方向疾进，一月二十六日在离赤水县约三十里的黄陂洞，与赤水县向土城开来的川敌章安平旅遭遇。敌先我占领右侧高地，以高地为支撑点，并凭借左边的工事对我师施行火力封锁。我师陷于敌人三面包围之中。

此时，中央纵队与三、五、九军团已抵达土城。但由温水而来的四川军阀部队也紧追不舍，其先头部队郭勋祺旅和潘佐旅的第六团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石羔嘴一带与我后卫的五军团形成对峙。一场恶战在土城地区展开了。

为了消灭川敌郭勋祺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二十七日，他们一方面电令我红一师在黄陂洞阻止敌人南下；一方面令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迂回包围郭旅。当时，我师虽受敌三面包围，但为了土城战斗的胜利，仍英勇抗击敌人的多次进攻。红二团的领导同志见情况危急，曾建议全师撤出战斗。我说：

我们在这里多坚持一个小时，土城的战斗就多一份胜利的把握，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撤。遂又坚持到第二天的黄昏才撤出战斗。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鉴于土城鏖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人的援军即将赶到，原订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为敌人所阻，不能实现。久战对我不利。于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于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从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当我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同志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到渡口来找我们，要我们师的几位领导同志到他那里去一下。那时师参谋长耿飏同志正在前面指挥部队渡河，我就和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来到毛泽东同志处。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这次见到我们时，对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谈的是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说：

“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这是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而且还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讲的，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

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虽然黎平会议决定转兵黔北以后，我军已由原来处处同敌人“决一死战”的方针改为“避强攻弱”、“避实击虚”的方针，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是军事领导上的问题不解决，还难以从根本上保证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所以过了十多天以后才传到红一师，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是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积极鼓吹者和追随者；在遵义会议上当李德受到批评时，林彪又没有发什么言；遵义会议结束后，林彪又同意李德跟一军团行动“体验生活”。因此，虽然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积极地及时地给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当然，那时我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

“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灵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

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机动灵活，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在中央苏区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采取了诱敌深入，隐蔽主力，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我军连连取得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也由于继续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这时毛泽东同志所以又再强调“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其用意，按我当时的理解，除了要我们不要忘记从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外，还着重告诉我们，不要因为目前军委改变从宜宾到泸州一带北渡长江的计划而产生别的什么想法；而且“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要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同志说：

“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指我）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接着，毛泽东同志问我：

“你看行不行？”

“行！没有问题！”我回答说。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

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主席接着又问：

“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

“还有三千多人。”我回答说。

“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了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

当时我和黄甦、谭政同志都为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示而特别高兴，回来后立即向师里的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表示一定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写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而在当时也就是这样做的。

当我一方面军各部于二月八、九日到达滇东北扎西时，蒋介石急调滇军三个旅到镇雄地区堵击，令川敌十多个旅由北向南压来，又令中央军周浑元向扎西地区扑来。这时，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审时度势，鉴于各路敌军奔集而至，而黔北敌军薄弱，决定利用敌人判断我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先挥戈东指，返回

川南，然后再重入贵州。于是，红一方面军各部于二月二十日，二渡赤水河，甩开了川敌，使蒋介石妄图合围红军的企图落空。

我师经古蔺以南在太平渡二渡赤水后，先头部队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同志的带领下，昼夜兼程向东前进，二十四日晚到达桐梓，趁黑夜展开攻城。不到两个小时，守敌黔军第四团蒋德铭部两个连便向娄山关溃逃。二十五日拂晓，我军再占桐梓城，揭开了第二次攻打遵义战役的序幕。

红军突然回师黔北，直指遵义，这是蒋介石始所未料的。他为阻拦红军挺进黔北，除急令中央军向遵义靠拢外，贵州军阀王家烈还到遵义亲自坐镇指挥，令其精锐部队刘鹤鸣的第六团守娄山关，企图凭天险顽抗，以待援军。但在红三军团的强大攻势下和一军团的配合下，经半天的时间反复冲杀，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娄山关，遂为我红军占领。

夺得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据了。一、三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二十七日，彭德怀同志指挥三军团首先占领遵义。我师进抵遵义时，没有进城，而是从城东门外打到南门外，配合三军团作战。先打垮了敌人的增援部队，随后又同三军团一起猛追逃敌，一直追到乌江边。由于敌人砍断了江上的浮桥，才免于全军覆灭。整个遵义战役至三月一日上午结束。

一周之内，红一方面军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我军取得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胜利后，即移到遵义城西南约三、四十里的鸭溪地区休整约一星期。这是从江西出来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并得到了休息。这时部队情绪很高。指战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毛主席一指挥，就打胜仗。

我军在鸭溪地区休整后，敌人又重整旗鼓，北渡乌江向我袭来。于是我军迅速主动放弃遵义，于三月十六日在茅台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人以为我军仍要北上，赶紧改变部署，不意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调头向东，于三月二十一日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然后又调头南下，从而把北线的敌人甩得远远的。

从一九三五年初起，我红一方面军能够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调动敌人、打击敌人、歼灭敌人，使蒋介石一个又一个“围剿”红军的部署失灵，使红军安全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继续顺利地长征。这一切，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遵义会议确实确实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之后，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再次把我军的意图隐蔽起来，继续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一方面电令红九军团暂留在乌江北岸黔北地区，伪装成我军主力，吸引和牵制敌人。一方面令其余全部红军直插乌江边，南渡乌江。

红九军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自三月二十七日起，分别在长干山、枫香坝等地活动。他们在战斗行动中，到处多打旗帜，多点炊烟，故意造成声势，吸引了在贵州的大部分敌军，掩护了红军主力南移。以后这部分红军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转战数千里，不仅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军大部队的的光荣任务，而且吸收了两千新战士，扩大了部队。

红一方面军主力这次重渡乌江，由红三团任先遣队。三月二十九日夜，红三团在团长黄永胜的带领下，冒着狂风暴雨，从手扒岩乘竹筏渡到乌江南岸。部队上岸后，迅速击溃了敌人的江防部队，并活捉了敌人的一名营长。随后即由军团的工兵连在大塘、梯子岩、江口等处架设了浮桥。四月一日前，红军主力顺利地渡过了乌江。

红军南渡乌江后，又以一个团的部队伪装主力东进，佯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而大部队则分数路南下，直逼贵阳。

红一方面军这一扑朔迷离的行动，搅得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晕头转向，疑团莫释。他忽而判断红军“徘徊于川滇黔边境，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忽而又判断“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忽而判断红军“仍企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忽而又判断红军“前遭堵截，后受追击，已是强弩之末，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就是没有料到红军会直逼贵阳。

因此，当红军一方面军主力突然出现在贵阳近郊时，全城震动。蒋介石也被吓得丧魂落魄，惶恐万状。他一面连连急电云南，令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来贵阳“保驾”；一面叫贵阳警备司令挑选二十名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听用，准备逃跑。

但是，当我军于四月九日通过贵阳郊区时，情况仍是很紧张的。

那时，奉命东调贵阳的滇军已抵贵阳和龙里两地。贵阳和龙里东西相隔约百里，有一公路接连。头一天行军，一军团靠龙里西侧前进，三军团靠贵阳东侧前进。我师居中偏西。在行进中，我师和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到同一条路上来了。由于大家都想迅速往前赶，因此出现了抢路和插队的现象。我发现后，令我师部队靠边停步，然后整了整队，把部队带上附近的山坡，给三军团让出了大路。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山上露营。第二天一早我师下山通过公路时，遇到三军团直属队已先我到达公路旁的一个村子里。

这时，我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正在吃早饭，一见我到来就批评了我们一师昨天同三军团部队插队的事。他说：

“现在中央军委和大部队都还没有过来。敌人在贵阳有四个师，在龙里有三个师，今天敌人可能从东西两面向我夹击。如果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呀！”我向他作了解释。他也就不再提插队的事了，而向我说：

“你们一师归我指挥！”

我说：“好，你给任务吧！”

他说：“你们占领西南山，监视龙里方面的敌人，三军团占领观音山，监视贵阳方面的敌人。哪一边的敌人出来，都要死打，待中央军委和后面的部队都过去了，你们见我们撤了，你们才能撤。”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部队撤时，派人通知你们。”

彭德怀同志这种当机立断、指挥若定的大将军风度和对革命赤胆忠心、敢于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当天上午，我师一面在山上监视龙里的敌人，一面派人瞭望对面三军团的行动。不久，中央军委纵队从我们的山脚底下通过了，一些随军长征的女同志也顽强地一瘸一拐地向前赶。到下午三时，眼看部队已经全部通过了；敌人由于惊魂未定，又搞不清我军虚实，也未敢轻举妄动。但可能由于三军团的部队行动紧急，或者是由于派来给我们送信的人出了意外，在三军团的部队撤出阵地时，我们并没有接到他们的通知。这时，我们即撤下山来，按计划

向目的地前进。

红军在贵阳、龙里之间乘敌军惊乱之际，越过湘黔公路，立即转头向西疾进。一路上，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从四月十日至十三日，连克定番、广顺、紫云等县城，随后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二十三日，红军进入云南境内。

这时，蒋介石急令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等部尾追我军入云南。但由于蒋军各级官兵普遍存在厌倦情绪，士气低落，行动缓慢，等他们进入云南境内时，已落后于红军数日行程了。

红军进入云南，如入无人之境，日行百里，飞速向西，直逼昆明。这时，由于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贵州，一时不及回援。云南军阀龙云坐守昆明空城，十分恐慌，只得令卢汉收罗一些团防部队守昆明城。但红军却虚晃一枪，从昆明城西转向西北，向川滇边境的金沙江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深山狭谷之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五月二日，军委指定一军团在龙街渡渡江；干部团和军委纵队在绞车渡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渡江。我师按时到达龙街渡渡口时，江上的渡船都已被敌人烧掉了，直接架桥又没有器材。我们用铁丝扎竹排，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想架一座浮桥，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气候虽刚进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曝晒之下，蒸发出一股股热气，使人心闷头昏，汗流夹背。我们整整搞

了一天，毫无进展。正准备向军团司令部报告情况，恰接林彪从十五里外打来电话。我接电话，刚开口说：

“我把架桥的情况报告一下吧！”

历来林彪说话声音很慢，但这次却急促地说：“你先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你们什么时候能过江。”

我在渡口折腾了一天没有什么结果，心里本来就很烦躁，现在一听林彪不愿意听报告情况，就急了。我回答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按现在的条件，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这时站在电话旁的师政治委员黄甦同志，听我这么一讲，就拉我的衣角，示意我不要顶撞，但我还是把话讲出去了。这下可惹怒了林彪，他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了一顿。但最后还是问我：

“你把情况说一说，为什么过不了江？”

一听他的口气有所缓和，我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等等情况向他报告了一番，并请示是否可以另选渡口。他回答说：

“你们再想想办法，我也向总部请示。”

第二天，部队再次发动大家出主意思办法。当时，我出了个主意：用牲口拉着铁丝泅渡过江，然后派人顺着铁丝过去，若能成功，就可以架起浮桥来。大家觉得可以试试看。杨得志同志就把他的自己一头黑骡子拉到江边，并在它身上缠上一条绑带，然后把铁丝的一头拴在绑带上，把骡子赶下水，让它朝着对岸游去。但无奈江水湍急，骡

游到江心，划了个半圆又返回来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这时，我判定在龙街渡架桥渡江是不可能的了，必须另选渡口。否则，不但会增加部队不必要的疲劳，而且后面敌人追兵一到，我师还会因身处狭谷，被动挨打。经我再三考虑，遂下决心令部队撤离渡口，回到离江边四、五里地的村子里待命。部队回到驻地，我一面令部队做饭；一面准备再次向林彪说明部队在这里不能架桥，必须坚决另选渡口，及早离开。这时，林彪打来电话说：“你们桥不要架了，部队立即离开渡口，出发到绞车渡，从那里渡江。”部队已经吃了饭并得到了休息。当时如果我是机械地执行和等待上级命令，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部队的架桥问题，那么，部队就会搞得很疲劳，会影响到部队以后的迅速行动。

龙街渡距离绞车渡约一百二十里地。但沿江边没有路，我们只有翻山越岭，到处是乱石岩，非常难走。当我们赶到绞车渡时，首先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一见到我就问：

“队伍来了没有？”

我说：“来是来了，就是走得稀稀拉拉的。”

邓小平同志说：“赶快组织队伍，马上过江！”并说：“人员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随即，部队在两位首长的指挥下，开始渡江，秩序井井有条。我们抵达对岸时，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渡口对岸一个崖洞里瞭望着渡江部队。后来我听说，部队渡了几天，他们就在这个洞里瞭望了几天，一直到红军全部渡江完毕才离开。

红一方面军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底开始进行四渡赤水之战，到五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历时三个多月，行程一万余里。其间，为了隐蔽我军的企图和调动敌人，虽然部队多跑了一些路，但却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顺利地实现了北上的计划。这一胜利，对红一方面军完成整个长征来说，无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迅速北上。一路上途经会理、德昌、西昌、冕宁数县，然后进入了彝民区。所谓彝民区，其实是汉人、彝民杂居的地方，不过汉人多住在城镇或平原地区，彝民则多住在高原山区。由于土地贫瘠，交通阻隔，这里物产不丰，文化落后，彝民的生活尤为困难。当时，国民党实行的是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造成彝民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红军取道这里，目的在于出敌不意占领安顺场渡口，渡过大渡河。但部队在通过彝民区时，却碰到了许多麻烦。

当时，我师一团任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为红军北上开路。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我记得刘伯承、杨得志同志和我走在队伍前面。第一天，虽然与彝族首领小叶丹达成了通过的协议，但由于对个别部落工作没做好，在我们到达时，许多彝民

拿着刀枪梭镖，挡住我们的去路，喊着：“汉官不给钱不让过。”这样，我们第一次没有通过又返回出发地。后来，总政治部派来一名懂得彝民风俗、语言的干部，并准备了一些银元、衣物，沿路上一面向他们喊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面散发一些财物，这样，第二次就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五月二十四日，我们一天一夜冒雨行军一百四十多里，来到距安顺场仅十多里路的马鞍山顶。这时，大渡河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大渡河纵贯横断山脉，河水从崇山峻岭奔泻而下，白浪翻滚，涛声如雷，水深莫测，无数险滩构成无数巨大旋涡。在安顺场这一段河宽二百余米，流速每秒四米。由于水急、浪高、旋涡多，水势汹涌不羁，人一下水泅渡，就会被急流卷走，非熟悉水性的船工摆渡不能过河。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西征到这里，面对滔滔河水北渡未成，以至身陷重围而全军覆灭。红军到此时，蒋介石曾疯狂叫嚣：“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他一面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约十万人尾随追击，一面令四川军阀二刘一杨（刘湘、刘文辉、杨森）调部队扼守大渡河。那时驻守在安顺场渡口对岸的就是刘文辉所属的一个营。这些情况，在我们向安顺场挺进的途中就已经从群众那里了解到了。

当时，部队停下来隐蔽休息，刘伯承、杨得志同志和

我进到离安顺场几里地的山口上，用望远镜向两岸观察。只见左前方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这就是安顺场，右前方的河这边有两条船。在对岸几十公尺高的峭壁上有三间小房子，分立在三处，由半人高的围墙围着，围墙外有四个碉堡和一些散兵壕俯视着河面和上山的石阶，但未发现有敌人活动。经我们几个人研究，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夺取河边那两只船。因此，立即派通信员把一营营长孙继先和二连的连长、排长、班长都叫来，先让他们用望远镜看好小船停靠的位置，然后令他们带着部队轻装分几路直奔河边，目的就是夺船。刹时间，战士们如猛虎下岗，连跑带蹦地窜到了河边，只响了几枪，就把船夺到手了。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红军到来之前，安顺场对岸守敌已经估计到我们可能到这里来，所以撤走了全部渡船，并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烧光。这一天，对岸守敌的营长认为我军距离安顺场还远，因而仍带着十几个兵乘船到安顺场，有的说他是来喝酒的，有的说他是来搬家的。河边这两只船就是他乘坐过来的。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先遣队像天兵似的当天就来到了安顺场。他在慌乱中翻墙逃走了。

夺得了敌人的船，我们如获至宝，这可是关系到全军北上的成败啊！因此，如何使用好这两条船，就事关重大了。如果冒险起渡万一遭到损失，后果就不堪设想。于是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决定，今晚做好一切准备，明天一早

起渡。当即我们分头去找船夫。安顺场的群众因为受了刘文辉的种种剥削压迫，对刘非常仇恨，这次刘文辉要烧房子，群众更加气愤，我们一动员，不到一小时，就有二十多名船夫自告奋勇，愿意帮助红军摆渡。

部队的情绪更高。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刚把组织渡河奋勇队的任务交给二连，二连的战士一下就围住了孙继先同志，争先恐后地报名要参加。杨得志同志回忆那个动人的情景时说：营长问我怎么办，我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最后决定由营长下命令宣布名单。这样才把奋勇队组织起来。其中有连长一名，排长一名，正副班长四名，战士十一名。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八颗手榴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第二天一早，奋勇队在连长熊长林同志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与此同时，杨得志同志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向对岸射击！”对岸敌人虽然从工事里向我军的渡船进行火力封锁，但由于我方火力打得猛，射得准，密集度高，把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来。

船靠岸了，十七名勇士飞身下船，占领了滩头阵地，并利用崖上石阶的死角，一步一步地向敌人的碉堡靠近。敌人从碉堡和散兵壕钻出来反冲锋，我们又立即在这边组织火力进行猛烈射击，敌人伤亡很大，龟缩了回去。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残敌向后溃退。随后，他

们掩护我后续部队一船一船的渡河。先是一营长孙继先同志带着全营部队过了河，接着是二营、三营，一团、二团、三团，都陆续到达对岸。我是在渡过一个团以后过的河。这次渡河，全师都是轻装；骡马和行李担子是后来随军团直属队从泸定桥过的河。

我军强渡大渡河成功了！这一胜利首先要归功于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当时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到对岸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但富林是敌人防守的重点地段，我军如从此处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另一条是经冕宁，通过彝民区到安顺场，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但守敌力量薄弱，且出敌意外。据此，军委除命令第二师五团佯攻大树堡，借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外，决定红军主力经冕宁、安顺场北进。

这一胜利，还要归功于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的正确指挥。他们两人，当时是军委指定的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的司令、政委。一路上，他们在疏导彝民的对立情绪，部署安顺场的强渡，以及组织部队，动员船工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决策作用。

这一胜利，还要归功于一团的全体指战员。一团接受先遣队的任务后，逢敌开路，遇河搭桥，决心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在组织强渡奋勇队时，虽然大家都明白这是九死一生的战斗，但却你争我抢，都要争坐第一船。二连通信员陈万清同志，开始宣布名单时没有他，但他却

哭喊着硬要参加第一船渡河。这种精神就是红军之不可战胜的秘密所在。

这一胜利还要归功于安顺场船工的支援。没有这批熟悉水性、通谳河情、冒着生命危险的船工为红军摆渡，要治服这礁石错列、水深流急的大渡河，把几千人的部队一船一船地运到对岸，也是难以想象的。

我师一团轻装过河并迅速扫清了对岸的守敌后，五月二十七日我带二、三团也过了河。这时，中央军委鉴于我几万大军如果只靠小船来渡，必然旷日持久，且后面追兵将到，不宜久留，遂命令我师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二师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两支部队分别沿大渡河左右两岸北上，同向泸定桥急进。一路上，我师左边是大河，右边是高山。敌人凭据隘口，节节抗退。我们背水仰攻，不顾一切往前冲。第一天，在瓦坝附近，打跨敌人的一个团。第二天在德妥消灭民团约百余人。第三天，我们在铁丝沟附近遇上守敌一个旅，部队由山腰绕至敌人侧后，一举攻占了铁丝沟隘口，把敌人那个旅击溃了。从而，既为我们的前进扫清了道路，又保证了在河对岸行进的二师部队不受敌人隔河的阻击。五月二十九日，红二师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冒着枪林弹雨，首先夺取了泸定桥。

随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带着红一方面军的大部队从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蒋介石“要朱、毛成

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红一方面军大部队渡过大渡河以后，中央军委除命令红九军团接替我一军团坚守泸定桥，以防后面中央军薛岳、周浑元的追兵从这里通过外，其余红军主力继续北上。五月三十一日，我师部队进抵二郎山下。

二郎山在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西连大雪山，北接夹金山，海拔三千二百多公尺。有一首《歌唱二郎山》的歌词唱道：

二郎山，高万丈，
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

二郎山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但那时正值初夏，远远望去，除山巅被云雾笼罩着看不清外，山腰以下却是一片青翠碧绿，倒也生机勃勃，令人喜爱。

二郎山有一个隘口，叫飞越岭，是我们北上必经之道。头一天，我们就了解到，这里有川敌刘文辉部一个团把守。我们到达后，即乘夜色组织部队正面仰攻，但由于地形狭窄，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兵力展不开，所以是夜仰攻受阻，被挡在山前。第二天一早，我们令一个连，从敌人阵地左翼攀援而上，然后向下滑，袭击敌军。同时令担负仰攻的部队从正面猛冲。这时，从化林坪赶来的二师部队，又袭击了敌人的右翼，一时间，喊杀声、枪声、手榴

弹爆炸声震撼整个山谷。敌人支撑不住了，扭头就跑。我们占领了整个阵地，大部队通过了二郎山。

翻过二郎山后，我师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条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铁索桥相比，距离短得多，离河面也近得多。可是，这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经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结果林彪第一次也没有过去。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一队队的人员就这样陆续地过去了。

我师到达芦山时，敌人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芦山城在这一带是一个好地方，城里大约有两万多人，四周有城墙，街上商店里有由成都运来的货物，晚上还有电灯。城里的老百姓虽然一下搞不清红军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军队，但他们见红军不拿群众的东西，不拉民伕，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因此，对我们不仅不惧怕，还主动给我们送柴火，送蔬菜。我们师在这里得到了自过大渡河以来最

好的一次休息。

翻过夹金山会合四方面军

我师占领芦山县城后，一军团二师担任前卫，经宝兴向夹金山进发。我师随后跟进。夹金山是一座海拔四千二百多公尺的大雪山，山上终年积雪，人称“神仙山”，意思是说只有神仙才能过得去。红军从云南进入四川时，正是炎热的夏天，部队指战员都是南方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冰天雪地”，更料想不到六月天气山上还有雪。可是，当我们进入宝兴境内时，只见前面山峰高耸入云，团团云雾在它的四周盘旋，满山白雪皑皑，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这一奇异的景色使大家惊叹不已。这时，不断传来先头部队红二师从当地群众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据当地居民讲，山上大雪纷飞，气候变幻无常，要想过山，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滑倒。居民还说，在山上不要大声讲话和哈笑，不要坐下；如果大声讲话、哈笑或坐下，山神就会把你打死。在山上不要大声讲话、哈笑或坐下，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在那种气候条件下，讲话、哈笑，消耗人的气力，坐下不活动，会把人冻僵。但居民把这些现象说成是山神的惩罚，则是由于对此现象不能作科学解释的缘故。

当时，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

部队从芦山出发时，每人准备了足够的干粮，各级指挥员向部队作了过雪山的动员，并不断把在雪山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及注意事项向部队作了交代。同时，组织了强帮弱，大助小，争取不掉一个人，不失一匹马。一路上，部队的情绪很高。“翻越夹金山，气死活神仙！”“制服大雪山，会合四方面军！”的口号声彼伏此起。

六月十三日九时，我师部队浩浩荡荡向夹金山进发。刚到山下，便觉寒冷透骨，像赤身进入冰窖一般。开始路还好走，也不太陡，但走了不久，只见左右雪崖陡立，道路辟于其间，晶亮溜滑，稍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崖，掉进雪堆、深渊。越往上爬，越觉奇寒袭身，浑身哆嗦，牙齿战栗，不少战士虽然把被子、毯子披在身上，也无济于事。到了山顶，气候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呼啸，雪花飞扬，天地混沌一片；时而阳光喷薄，四外炽白，刺得人眼难睁。同时，越到高处，空气也越稀薄，使人呼吸困难，头晕腿软，喘不过气，大家只能闷着头往前走。这时，有的同志累极了，想坐下来休息。我和各级干部连忙前后招呼：“同志们，赶紧走！快到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去，这里不能停呀！”一些想坐下休息的同志，听到呼喊，咬紧牙关坚持着向前走；一些已经坐下的同志，也马上站立了起来。在别人的搀扶下前进了。但也有些体弱患病的同志，任你怎么呼喊也起不来，待我们到跟前一看，已经停止呼吸，牺牲在雪山上了。

约摸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大家终于爬到了山顶。该下坡了，下坡比上坡好走得更多。这时大家的劲头更大了，精神特别抖擞，步子迈得特别快。当天傍晚，我师翻过了夹金山。

翻过夹金山以后，部队进入了藏民游牧区。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每个圩镇都有建得富丽堂皇的喇嘛寺，晚上一家人均团聚在一起烤火念经；生活简单，牛、羊肉和青稞为主要食品；民性甚强，为人讲义气，重信用。四川一些商人，经常出入这一带做生意。他们用一些日用品换取藏民的牛羊、皮毛，运往四川成都出卖。但交换是很不合理的，据说四川商人用一盒火柴（当时叫洋火）就可以向藏民换到一只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等价交换。可是当时藏民都很乐意，认为这是给他们带来了“光明”。有的商人换到牛、羊以后，一时带不走，就寄养在卖主家。藏民不但无代价地代为饲养，而且连从寄养的牛、羊中产下的仔子，都如数交给买主。

我们来到这个地区，开始大家很高兴，以为到了游牧区，吃肉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由于当时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不但把牛、羊赶走了，而且人也跑光了，粮食也被埋藏起来了。这时我们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顿时部队的口粮无以为继，饥饿成了严重的问题。

部队这时已经断炊两天了，个人带的一点干粮也用完了，怎么办呢？有的同志提出：地里有豌豆苗，可以采

摘来吃。师政治委员黄甦同志觉得这是违犯群众纪律，不同意。经大家研究，认为总不能饿着肚子行军。最后，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出了个主意。他说，为了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可以在摘采群众的豌豆苗后，在地头上放上几块银元作为赔偿，并插上木牌说明。大家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就这样做了。

我师越过懋功（没有进入懋功城）直抵两河口。在这里，我师终于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合了。两师相会，都象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的情景，真是无法形容。

那时八十八师已在两河口驻扎多时了。我们部队到达后，我和师里的其他领导同志即会见了八十八师的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同志。熊厚发同志那时才二十一岁，身材不高，圆盘脸上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举止文雅，初看去，很象一个大姑娘。郑维山同志那时也不过二十四、五岁，也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一见面，熊师长操着满口的湖北口音说：“欢迎！欢迎！我们早就盼望着会合红一方面军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当时，我们对八十八师给予我们的物质支援，很为感动。但更为高兴的是两军会合了，今后红军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因此，双方都很高兴，很激动，一直谈了几个小时才离开。

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来到两河口，

欢迎政治局委员、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那天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与中央领导同志会晤。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会见时，部队还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欢迎仪式。欢迎仪式由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主持，朱德同志和张国焘讲话。接着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两河口会议以后，我师在军团首长的率领下，继续向北前进。之后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等不亚于夹金山的大雪山，但由于大家有了经验，所以没有象过夹金山那样紧张了。七月中旬，部队到了毛儿盖，在那里驻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此后，我调出红一师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九月中旬，红一师编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十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胜利地到达陕北。

(林华明整理)

对我国改造资本主义 工商业历程的回忆

许 涤 新

一、加工订货的斗争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之后，党分配我去协助曾山同志搞接管工作；同时，处理在接管中与资本家有争议的问题。大约在那一年夏末，陈毅、曾山同志要我兼管市场和私营工商业的工作，因为那时负责工商行政管理的石瑛同志跟着部队到福建去了。

对市场的管理，主要是打击、取缔投机活动。经过几次较量，投机家的活动被压下去了；而收购和加工订货的工作，则越来越重要、越复杂。上海轻工业的名牌货相当多，西北、西南各地都来上海购货。国营百货公司更要控制货源，而资本家不干。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在收购和加工订货中尖锐地表现出来了。

一九五〇年国家实行财经统一之后，通过抓紧税收与发行公债，由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而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下子解决了。但是，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所形成的虚假繁荣，也忽然破灭了。商品的销路突然下降，许多资本

家由于商品卖不出去，无钱发工人的工资，都在大声叫苦。陈云同志负责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向中央建议召开八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我以上海工商局长的资格，参加了这个会议。陈云同志在党组会议上，指示我要把上海工商业的困难情况如实说出，以免在政治上陷于被动。那次参加会议的并不仅是八大城市的工商局长，而且有代表资产阶级的高级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周叔弢等人。大家畅所欲言，滔滔不绝。但总括起来，不外是“商品卖不出去，怎么办？”这么一句话。会议开了半个月，陈云同志焦心考虑，在向中央汇报之后，在总结会议上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情况，并宣布：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消息一经传到上海，资本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这样，上海的加工订货的工作，就顺利地扩大了。

但是到下半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抗美援朝需要许多军需物资，同时还由于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对工业日用品需要量的增加，国内市场，顿然活跃起来。资本家就改变了态度，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或者不按合同完成任务，宁愿按合同的规定罚款，而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高价。在上半年，资本家感谢国家给他们的加工订货；到下半年，资本家却认为加工订货是一根捆住他们手足的绳子了，因而千方百计要脱去这根绳子。斗争怎能不日趋尖锐呢？直到“五反”运动之后，资本家才低头接受加工订货。一九五二年，全国各大城市接受加工订货、收购、包

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私营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占当地私营工业产品总值的比重，上海为百分之五十八，武汉为百分之六十五点五，西安为百分之七十三点三，杭州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七。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这里，上海的加工订货的百分比，虽然不大，但是，在绝对数上，上海的加工订货总额，是全国之冠。

加工订货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但是当我在上海工作时候，并没有明确地把它提高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去认识；当时，我的认识只是支持国营商业，掌握货源，保证军需和民用的需要。

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 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 限制、改造政策的提出

一九五二年冬，我调到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当时称私营企业局，次年初才改为此名称）工作。统战部是不搞具体经济业务的；而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业务相当多，其中处理加工订货的问题，在整个工商局的业务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

一九五三年春，李维汉同志带领一个调查组到武汉、上海、南京和济南等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查。回来后向中央提出两个报告：一个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问题的报

告；另一个是如何处理劳资关系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同志首先听取调查组的汇报。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和其他副部长都参加了。记得那天下午的汇报，突出了加工订货的问题。调查组的同志指出，各个部门需要时就向资本家加工订货，不需要时就拉倒；有的资本家形容说，“来时急如星火，去时无影无踪”。另外，还谈到工缴费、税收等标准也不统一的问题。李维汉同志提出，这些问题有必要提到党的统一领导上来解决。

这次调查的结果，不仅发觉了加工订货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有所突破。李维汉同志提出，收购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级形式；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形式。

同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议，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问题。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都同意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并认为收购在当时已经日益缩小，不必再列为一个形式。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就只包括低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两种形式了。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在讨论中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应限于加工订货，而应逐步扩大为公私合营。毛泽东同志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指出这个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认为，要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要有一个机关来统一负责。陈云同志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业务太多，如要负担对资改造的工作，恐怕搞不好。讨论结果，决定由中央统战部来管理此事，由李维汉同志兼任中财委副主任。中财委下面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任办公室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三同志任副主任。次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中财委第六办公室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由李维汉任主任；许涤新和孙起孟任副主任；大约一年之后，张执一也参加了“八办”，任副主任。

中央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大家都同意，只有高岗反对。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言不发。毛主席要李维汉找高谈谈。散会后，李问高有何意见。高说：“你读过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李说：“读过。”高立即用尖苛的语调说：“布哈林不也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吗？”

会上的另一个分歧点，是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什么人。李维汉同志提出，把资本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林伯渠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要把资本家改造成工人，否则，改造成为什么人呢？难道改造成

地主吗？不能。难道改造成农民吗？也不能。只能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工人。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定由李维汉给中央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政策性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法，原是“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报告”（“改组”的提法是根据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经济改组”而来的）。在政治局讨论时，胡乔木同志提出，把“改组”改为“改造”更为确切、更为科学些。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都同意胡的意见，于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提法，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提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同时，李维汉同志提出“双重改造”。那就是不仅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商企业；而且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政策上，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

三、从“吃苹果”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中财委“六办”的主要任务，就是有计划地扩大公私合营企业。在解放初期，我们没收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全部企业。但是还有一部分企业，既有民族资本也有官僚资本，对于这种企业，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而保存民族资本的私股，这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公私合营企业（据全国当时

六百九十五户公私合营的企业材料统计，其中没收官僚资本的公股占百分之五十三，没收反革命分子财产的公股占百分之九点一八，公股共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一八）。但是其他纯民族资本企业，则不存在可以没收的官僚资本，因而，要扩展公私合营企业，要把民族资本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国家必须对民族资本的企业投入适当的资金。为了这件事，李维汉同志同我一道去找过邓小平同志。那时，小平同志兼任政务院的财政部长。小平同志很干脆，他说：

“‘六办’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少钱？”维汉同志说：

“要使民族资本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投资，并不需要大量资金，因而‘六办’也不需要财政部拨出巨款。但到底需要几个亿，现在也算不出来。”小平同志笑着说道：

“就拨五个亿吧，不够，再拨；用不完，归还财政部，反正‘六办’的钱是存在人民银行的。”这样，中财委“六办”就掌握了一笔进行合营的必要的资金了。

中财委“六办”成立之初，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之下，起草了一个《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这个文件是经陈云同志研究之后送中共中央，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批准的。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就是“稳步前进，依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条件、供产销平衡的可能、干部和资金的准备以及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一批较重要的较大的企业，并把它们办好。”这就是

当时简称的“需要、可能与自愿”的原则。

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对我们来说，是一项缺乏经验的工作。因此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摸摸私营工业企业的底子。经陈云同志同意，一九五四年春，由中财委“六办”带头，轻工业部、重工业部、交通部和商业部各派干部参加，组成一个约二百人的调查小组。由许涤新任组长，沙千里任副组长，到上海去调查。调查组在上海大约住了半年，把几个重要行业，基本上摸清楚了。在调查过程中，已经发觉一个行业的大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后，小企业在加工订货上很难得到任务的矛盾。但，我那时只忙于整理调查所得的材料，没有及时把这个矛盾，向陈云和李维汉两同志报告。直到现在，我还在责备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敏感，不负责！

当时把大企业实现公私合营称为“吃苹果”；而把余下的小企业的合营称为“吃葡萄”。各地党委对于“吃苹果”是做了不少准备工作的，主要是开办干部训练班，把企业中的秘密党员和工会干部都找来训练。合营一个厂要好几个月，工作做得相当细，把准备合营的工厂的机器设备、资金、原材料，甚至桌子、板凳，都调查得清清楚楚。一九五四年搞了一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只有二千多家，加上解放初期由于没收官僚资本而变成公私合营的一千家，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共有三千多家。

进行“吃苹果”的工作，不是没有矛盾的。首先是大

资本家不干。上海有一个大资本家说：“我的十几家工厂都是我的伯父和父亲挣得来的。我欠国家的钱，可以拿出一个厂来抵偿国家的债务，但若要把所有纱厂和面粉厂都拿出来公私合营，死后怎样去见伯父和父亲？”但是，后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高潮冲击之下，他也就没法再坚持他原来的主张了。其次，我们有一些同志认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对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有利的；留少数几个大厂继续搞加工订货，在国际上有较好的作用。潘汉年同志就是这种主张的。一九五四年秋，有一天下午他从上海给我打长途电话，详细地说明上述意见。我告诉他，按已定计划扩展公私合营，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把“苹果”和“葡萄”都吃完。他说：“事实上，公私合营的计划是先要把苹果吃光的，矛盾不少。”他希望我把他的意见反映给中央。再其次，就是先“吃苹果”后“吃葡萄”之间在加工订货上的矛盾。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了。

一九五四年冬天，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召开了扩展公私合营会议，讨论一九五五年全国合营计划。那时，李维汉同志因耳癌到莫斯科治疗，周总理指定陈毅同志兼管“八办”工作，遇到大问题仍向陈云同志请示。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一到北京，就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吃苹果”和“吃葡萄”的问题。他们说：“现在光‘吃苹果’不‘吃葡萄’，把一大堆‘小葡萄’、‘烂葡萄’，甩给地方。地方没有财力给它们

加工订货的任务，资本家发不出工资，推动工人到党委请愿怎么办？”吵得一塌糊涂。我同起孟两人首当其冲。我们去找陈总，陈总说：“‘葡萄’也是可以吃的嘛！何必吵得那么厉害。你们找各有关部派负责人来听听地方意见。”费好大力量，总算把有关的部长或副部长请来了。他们了解了问题之后，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有黎玉同志说得相当尖锐，他说：“‘葡萄’是酸的，俺不吃。”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办国营企业才是搞社会主义经济；什么加工订货，什么公私合营，都是邪门歪道，都是在搞资本主义。甚至把我称为“资方代理人”。实在使人啼笑皆非。那一段时间，陈毅同志兼任外交部长，外事活动很忙，我们只好直接去找陈云同志。他听了汇报之后大笑起来说：“你们的这个扩展公私合营会议，实质就是国家计委要召开的计划会议。应该在计划会议开过后再开这个会议，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你们不弄清楚就来抢先，却抢出麻烦来了，是不是？现在，只好把计划会议的这一部分内容，放在你们这个会议上解决了。”陈云同志在国务院会议上，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问题。我也出席了国务院的这次会议（当时各办的主任或副主任都要出席国务院会议）。周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们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只好请陈云同志给你们解围。”隔了几天，总理又召开国务院常委会，由陈云同志提出处理“吃苹果”和“吃葡萄”问题的意见。陈云同志在分析了工业生产中的

矛盾之后，提出了“通过逐行逐业分配原料、分配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来进行逐行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央工业部门必须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工业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搞五年计划时将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潜力充分估计进去”。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陈云同志并且指出“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顾国营，不管私营的倾向；另一种是私营工业自己不想办法，坐待国家给办法的倾向”。周总理同意陈云同志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并且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工人以及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他们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决不能把工人阶级分成几个待遇不同的部分。国营工厂的工人有生产任务，公私合营工厂的工人有生产任务，为什么私营工厂的工人得不到任务呢？会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同志听后笑着说：“对，不看僧面要看佛面啊！”几天之后，陈云同志在“八办”召开的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上，作了《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报告。拖了两个月的扩展公私合营会议，到此时才宣告结束。经过这次会议，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地展开了。

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到来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

潮。七月间，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扩大的中执委会议。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通知我到中南海去。主席问我：“资本家在开会吗？”我说：“是，他们正在开会。”主席又问：“资本家头头都出席吗？”我说：“差不多都来了。”主席告诉我：“明天下午约他们的头头到中南海来见面。”

第二天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陈叔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盛丕华、李烛尘、周叔弢、胡厥文、荣毅仁、胡子昂和郭述活几个人。在陈叔通简单地汇报了全国工商联的会议情况之后，毛主席就和风细雨地对他们说：现在农业合作化的浪头正在席卷全国。工商界面对这种情况，一定是心中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在坐的除资本家代表人物外，还有恩来、少奇、陈云、陆定一几个领导同志和统战部的徐冰、平杰三和我。散会后周总理向主席建议再谈一次，参加的资本家的人数要增加，这样可以扩大影响。毛主席同意周总理的意见。

两天之后，把各地来京参加全国工商联扩大会议的一百多名资本家，都邀到怀仁堂来座谈。毛主席又把上次的内容，更生动地讲了一次。那时，李维汉同志早已回到北京，住北京医院继续治疗。颐年堂那次座谈会，我们没有

通知他，事后我们即向他作了汇报。怀仁堂的会，我们为了他的健康也没通知他，但他却偷偷从医院出来，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听了毛主席的讲话。

在毛主席同资本家代表谈了两次之后，陈云和陈毅两同志也先后在全国工商联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陈毅同志的报告，主要是推动资本家接受改造。陈云同志的报告，除了分析经济形势的发展之外，还提出两点：（一）为了解决“吃苹果”与“吃葡萄”的矛盾，今后公私合营将有计划地按全行业进行；（二）在利润的分配上，从“四马分肥”改为按资本每年给予定息。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扩大的中执委会议结束后，各地资本家一回去，便把毛主席、陈云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传达了。在党内，在工会系统也同时传达了毛主席和陈云同志的讲话。这样，全国的职工和资本家都轰动起来了。

在毛泽东同志同工商界代表谈话之后几天，陈叔通到我的宿舍来看我，提出要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告工商界宣言，号召工商界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说，现在全国总工会已经发表告全国工人同志的宣言了，如果工商界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宣言，对工作的进展不是很有利么？我把此事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并送上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告全国工商界宣言的文稿。陈云同志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必须提交政治局讨论。当夜，即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会议。因毛主席已离京休

息，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统战部列席会议的，除李维汉和徐冰两同志外，还有我。少奇同志先要我把事情经过和文稿内容作一扼要的汇报。我汇报后，即展开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不可以让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宣言。有几位同志坚持反对，理由是：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怎能容许资本家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表宣言呢？持反对意见的人越来越多，空气也就越来越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问我：“问题是你提出来的，你的主张是什么？”我那时被那种反对的意见所动摇，于是说：“既然问题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关系到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问题，那么，就让我明天去说服陈叔老吧！”恩来同志听到我这么说，就很严肃而亲切地对我说：“你是一个老党员，在中央统战部中，你又是分工主管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副部长。像这样大的事情，难道你没有反复考虑？没有考虑工商联发表宣言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害？一听到反对的意见，不作进一步反复思考，就动摇起来，收回自己的意见，难道这是对党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吗？工商联告全国工商界的稿件，我已经看过，内容是要求全国资本家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这样一篇对工商界的宣言，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什么害处呢？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什么害处呢？为了社会主义改造，我认为可

以同意陈叔老的要求，让全国工商联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这个宣言。”陈云和陈毅两同志也同意总理的意见。少奇同志深思之后，决定同意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表推动工商界接受改造的宣言。

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扩大的中执委会议结束的时候，不但发表了《告全国工商界书》，而且发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隔了两三天，毛主席从内地回到北京，叫我去汇报资本家开会情况，总理、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都在座。主席问我“致敬电和告工商界书是谁写的？是不是共产党员写的？如果出自党员的手，就不好。不要自己吹捧自己。”我作了回答之后，周总理说：“这两篇都写得不错，致敬电写得颇有感情。”毛主席指示，把由胡乔木同志执笔，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和全国工商联的“告工商界书”及“致敬电”，印成小册子，作为基层干部和资本家学习的教材。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会议。会前周总理抓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并准备了一个党内文件。会上周总理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次会议，为党内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思想上作了准备。

一九五六年一月，工商界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这首先是在首都北京发动起来的，接着上海、天津等城市也纷纷行动起来。资本家在敲锣打鼓、放鞭炮声中，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为什么会进行得这么顺利？首先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资本家做了大量教育工作，使许多资本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必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资本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党中央的带动之下，各省、市委和地委都大力地在做这项工作。其次，各地工人群众在党的教育和全国总工会的推动下，纷纷起来推动资本家实现公私合营。资本家之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从多数人来说，是迫于形势的。这就是当时所流传的“大势所趋，不得不走”。再次，资本家中的进步分子，在这次运动中也起了作用。他们认为，与其后合营，就不如早合营。当时天津有这么一句话，“先买船票，可以先坐好船位。”刘少奇同志很重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现公私合营，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一工作作了估价。他说：“资本家之接受公私合营，是从被迫到自觉的表现。”

五、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几个重要政策问题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需要解决一系列的具体政策。现在把几个重要的政策述之于下：

第一，企业的清产核资问题。在这里，有两个相当突出的问题：（一）私营时期的公积金如何处理？国务院八办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志，主张公积金归国家所有。理由是，私营企业的公积金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国家所有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样，在清产核资的时候，公积金就不能作为资本家的资本，不能作为以后领取定息的资本。如果要让步的话，顶多把公积金的一半算作他们的资本。（二）私营企业、工厂的地皮如何对待？“八办”和中央工商局的同志认为，土地是没有价值的自然赐与，也不应作价算入资本。我当时认为同志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主张是有理由的，因而加以支持。当我向陈云同志汇报时，他考虑了一下后对我说：“你们的算盘，看来是打得紧了。这两个问题，需要慎重处理。”有一天晚上，陈云同志叫我同他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哈哈大笑，接着说道：“你真是学过经济学的，算盘打得这么精！私营时期的公积金，是资本家没有把利润拿走而留下来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怎能不在核资时算入资本呢？至于盖工厂的地皮，一般说，也是资本家用钱购买的，因而，地价也应该在核资时算进资本中。”毛主席又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资本家既然交出了生产资料，我们在合营后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应该从宽处理，不应斤斤计较，专打小算盘。陈云同志提出‘从宽’的方针是正确的。”另外，在

清产核资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企业是“资本不能抵债”的“倒挂户”。因为他们在私营时期，欠税、欠工资，而所欠债务又超过资产。李维汉同志提出对“倒挂户”不必追赔，予以“了结”。陈云同志同意这个主张。因而“从宽从了”便成为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时的政策。这个政策，使清产核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大大地加快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进度。

第二，定息问题。一九五五年十月间，陈云同志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扩大会议上宣布，把“四马分肥”改为“定息”。这是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解放初期，中央私营企业局起草并经政务院批准公布的《私营企业条例》，其中规定资本家每年从企业盈余中，先拿当年股息八厘，然后再分红利。照那种办法，资本家对企业盈余每年几乎要拿走一半。大约是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宣布了“四马分肥”的原则，把资本家的股息红利，限制在百分之二十五以内。扩展公私合营企业之后，合营企业得到的加工定货的任务特别多，企业每年的利润也增加得很快。如果让资本家继续拿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那就太多了。“八办”向陈云同志反映了这一情况后，陈云同志提出定息的办法，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但是，定息的息率定在什么百分比上呢？陈云同志要我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我便找中央工商局和“八办”的几位同志商量。商量结果，认为行业不同，息率也应不同，因而提出几个不同的息率，

即四厘、五厘或六厘。陈云同志认为息率太多难于处理，决定一般五厘，个别企业可以提至六厘。陈云同志把这件事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得到了主席的同意。毛主席在批准这个方案之后，由他的秘书通知我，陪陈叔通到颐年堂去见主席。主席向陈叔通询问了工商界的情况之后，就向他宣布：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定息为五厘，个别可以高于五厘；时间是七年，如有必要还可延长时间。当时资本家对于定息息率的估计是“坐三望四”，即是说三厘不成问题，四厘只能是希望。陈叔通听到毛主席的指示之后，高兴得无法形容，急忙到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去传达了。

一九六二年秋，陈云同志找我去谈资本家的生活和定息问题，我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之后，陈云同志认为，如在一九六三年就停付定息，恐条件还不成熟。于是他同周总理商量，向毛主席建议对资本家的定息延长三年，即从一九六三年延至一九六六年。主席同意这个建议。到一九六五年的时候，总理同陈云同志又向毛主席建议，再延长定息两年，主席也批准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再延长定息两年的决定，在实际上被取消了。

第三，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全国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企业核定资产在两千元以下的资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都应按照本企业中职工的待遇同样办理；同时，企业核定资产

虽然超过了两千元而有困难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也可以参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陈云同志所指的两千元，是指私方人员的个人股金，而不是指一个企业的整个私股的股金。有的资本家要求把范围扩大，有的主张取消两千元的界线，有的主张把两千元提高到五千元。对此问题，“八办”的同志作了比较周详的研究。研究结果认为，资本家的一部分人中，确实是存在着困难的；但是如果取消两千元的界线，从当时的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考虑，将会给国家带来困难。而且，那时资本家都有定息，如果全部资本家都同职工享受一样待遇，是很难得到职工群众的同意的。事实上按陈云同志所提的办法，以两千元以下资产为标准，享受职工医疗待遇的私方人员已差不多占全部私方人员的百分之九十；而两千元以上资产的私方人员（不仅限于五千元，而且可以在五千元以上）如有困难，其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也可参照本企业职工待遇，这对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是相当宽大的。因此，公私合营后我们执行这个办法，资本家并没有反对。

第四，实现全行业合营以后，对企业的裁、并、转、合问题，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是集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是分散，就是无政府状态。因此，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就着手对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裁、并、转、合。无论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实

践上来说，对实现公私合营以后的工商企业，适当地加以调整是必要的。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是，只考虑管理的方便，只考虑企业的精简，而忽略了对广大居民在生活上是否方便的问题，因而就出现了裁并过多、转合过多的片面现象。陈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叫我到天津去看一看。天津有一条马路，路旁的商店由于合并都搬到其他马路上去了，于是这条马路就变成了空荡荡的马路。我回京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说：“这种做过头的裁、并、转、合，其他城市也必然出现。”所以，在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召开的几次“全国八办座谈会”上，陈云同志都要各省同志改正这种做法。但是，各城市有关各业主管部门的同志，并不热心，总认为集中便于管理，有利于精简机构。至于便利居民这个问题，并未能提到他们的议事日程上去。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有些城市在大力搞高级合作商店时，把一九五六年还没有并掉的小商店也合并了，原则是企业越大越好，并得越多越好。事实证明，这种不顾广大人民生活方便的片面做法，是我们对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在具体做法上的一个缺陷。

第五，陈云同志对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的使用，十分重视。他在几次全国八办座谈会上反复提出这个问题。他指出：“几十万个私营工商企业一下子实现了公私合营，我们哪里能一下子就派出几十万对工商业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干部？有不少城市，只好派出一批两条辫子的大姑娘去做

政治工作；但是，业务呢？她们并不懂，这当然不能怪她们。我们必须善于团结教育资本家，必须善于调动资本家对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只有这样，企业的业务，才能搞得更好。”早在一九五三年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时，工商界提出一个“爱国公约”。我向陈云同志汇报这个问题时，他很同意搞“爱国公约”，并对我说：“资本家的爱国公约，必须加上一条‘贡献才能’。”资本家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的，但他们懂得生产经营，懂得精打细算，懂得保护企业的信誉，懂得保证商品质量和制造具有特点的品种（名牌货）。这些，对于办好公私合营企业，都是有用的。可惜的是，许多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在合营之后便靠边站了。要他们“贡献才能”，只能成为一种很难办到的希望。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成为国营企业。许多资本家在领取定息的十年内，除了每年领取定息之外，在企业内便无事可干了。这个问题，也可以算是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我们在工作上的另一个缺陷。

第六，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记得是要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完成；而实际上，不到四年便提早完成改造资本主义这一历史任务。工作量如此之大，而时间又提早得如此之多，使各地党委和有关部门感到紧张，使工作本身不能不陷于粗糙。如果按原计划进行，工作可能做得更加周到；对我国国民经

济的发展，可能会更好。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从加工订货到公私合营，实现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阶级关系）相结合的成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这是我国的创举！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便宣布“作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存在了。”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过程中，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在工作上，我们也遇到不少曲折并存在一些缺陷，但是总的说，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科学论断！

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 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

刘 晓

一、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 的分歧与争论

一九三〇年八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同志和同年四月前往共产国际的周恩来同志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为纠正李立三同志推行的“左”倾错误，相继由莫斯科回国。他们回国后，立即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并着手筹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

九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批判了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并作出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纠正以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它纠正了立三等人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停止了组织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和全国总起义，以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取消了合并党、团、工会的各级行动委

员会，恢复了它们的各自独立组织和正常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会上李立三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三中全会后，他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便被共产国际召去莫斯科。

一九三〇年秋，我刚刚出狱，经过审查恢复了组织生活，就听到关于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错误批判的传达。听后我很高兴，在党的支部会上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并就自己在松浦特委工作期间所受盲动主义的影响作了自我批评。不久，我被调到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外县工作委员会任秘书。外县工作委员会原由省委书记李维汉（罗迈）同志兼任书记，后来先后由陈云、夏曦、蒋云同志担任，刘瑞龙同志任秘书长。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省委决定派人到外县去停止执行立三路线的暴动计划。我被派去常州、宜兴、镇江、苏州一带传达。我跑了几个地方后，更感到李立三盲动主义对全国形势的估计和组织暴动、总起义是没有客观基础的，是错误的。我遇到几位县委书记，都表示赞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他们说，敌人控制很严，暴动本来就搞不起来，也应该吸取教训。

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对立三路线还未能进行彻底的批判，这是和当时共产国际的看法一致的。六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以下

简称《决议》)认为：“政治局在六月十一号的政治决议案（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作者注）之中，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仅是策略上的错误）。”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以下简称《议决案》）还肯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在思想上，《议决案》错误地认为“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在反对“左”倾的同时，“尤其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在组织上，错误地打击了一些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使党内矛盾进一步加剧。

由于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对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加以彻底清算和纠正，因此，党内的“左”倾思想仍然浓厚地存在着。

一九三〇年底，我调任江苏省委秘书长。我除了管秘书处的的工作外，也和中央特科经常联系。中央特科派来联系省委的是刘鼎同志。在这个期间，我对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斗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由于推行立三路线，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在白区，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如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但受到了李立三为首的中央的错误打击。

何孟雄同志当时是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上海沪东区委

书记。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先后在江苏省党代会、五月中召开的全国苏区代表会、九月初召开的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起来反对立三的错误。他批评了李立三同志和中央政治局不承认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对形势的极左估计；盲目推行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否定工会和其它群众团体进行合法斗争；取消工会和青年团的独立组织等。何孟雄同志的这些意见，在当时处于少数地位，但他态度很坚决，力排众议，不怕打击。九月初在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何孟雄同志批评立三路线的发言，被李立三同志当场禁止，剥夺了他继续发表意见的权利，并被扣上了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派暗探”的帽子。会后，何被撤销了沪东区委书记的职务。随后又被撤销江苏省委候补委员的职务。这样他便被取消了参加党的会议和活动的权利。但是何孟雄同志坚持真理，没有屈服。九月八日，他又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长篇的《政治意见书》，再次系统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

六届三中全会期间，何孟雄同志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代表，认为他的活动是有意利用中央的某些错误，来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客观上不能不也成为取消派埋伏在党里面的奸细。”（见《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

此后，何孟雄同志又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先后四次向中央政治局写信或递交意见书，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

批判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并对给予他的组织处分进行申辩，要求公布他的意见书和发言记录。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在立三路线时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在党的会议上或写的文章中，也提出过反对立三一些“左”的错误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是以“左”的观点来反对立三的“左”倾。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国内形势和党内主要危险等问题上，他们和立三的看法基本上差不多。在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人发言中，批评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当场进行了压制，接着给了他们四人以党内处分。

六届三中全会后，王明在向中央政治局提的意见书中，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认为反立三主义的斗争应予停止，采取了对立三路线的和解态度。王明等人还要求中央撤销对他们四人的处分。

二、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 党内矛盾的激化

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是十一月中旬传到中国的。中央政治局接到信后，立即进行了传达讨论。随即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九日和十二月下旬连续发了《中央政治局关于

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和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并发表了为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告同志书。在上述决议中指出：自一九三〇年六月至八月期间，由李立三主持的政治局的工作是犯了路线错误，这一错误主要由立三负责。同时又指出：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斗争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在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中，号召全党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主张采取紧急办法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

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逐步传达后，党内许多同志知道了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看法有重大变化。因此，围绕着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党内意见产生严重分歧。

当十一月中旬，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传到中国时，王明等人的态度就起了重大变化。王明一方面立即根据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赶写和修改《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同时以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为名，进行了反对党中央的宗派活动。他们号召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并要求以所谓积极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干部，来改造和充实中央及各级领导机构

另一方面，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为代表的苏准会^①办事处、互济会总党团以及江苏省委的一部分干部

^① “苏准会”全称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

也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他们大都是较早起来反对立三路线，并受到错误打击的。代表他们观点的是何孟雄的十一、十二月给中央的意见书，林育南十二月给中央政治局的信和次年一月上旬通过的苏准会办事处工作人员决议案。何孟雄的意见书，提出了召开紧急会议，改选中央领导机构等主张；苏准会的决议案提出：由国际代表直接召集类似“八七会议”性质的紧急会议或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彻底改选中央机构。林育南的信建议：中央应有一个更郑重的决议，要明确指出中央六月十一日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后的路线是立三路线；要指出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并修正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信中还指出：立三路线不只是立三同志个人的错误，各省党部的错误程度较中央还厉害，必须彻底纠正这些错误。信中建议召开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林育南等同志对于党内斗争的态度还是比较正确的，观点也是有见地的。

还有一部分人，是以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为首的全总党团、上海工联党团系统和江苏省委部分省、区委委员。他们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初发表了《全总党团决议案》的行动纲领，提出“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补充决议是立三主义的变本加厉”，“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根本缺乏领导革命的能力与对于阶级的忠诚”，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

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肃清自中央到各级党部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他们主张打倒一切，取而代之。他们利用各自的工作关系，以全总党团为阵地，自成系统，进行了频繁的宗派活动。

这样，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在米夫插手的情况下，使党内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何孟雄同志的意见一般是正确的，取消了对他的错误的组织处分，并公布了他的意见书。这个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又作出了关于取消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人的处分决议。认为王明等人的观点是合乎共产国际路线的。这一处理提高了王明等人的政治身价。十二月下旬，王明并担任江苏省委（一九三〇年九月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改为江南省委，管辖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地。但在习惯上大家仍称江苏省委——编者）书记，秦邦宪任团中央宣传部长，这样便为王明等人后来夺取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条件。

三、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宗派集团上台 和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大体上包括有：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国

留学生，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和工会系统的代表，共三十七人。会议由向忠发主持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与向忠发报告内容相一致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它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集中开展反右倾的斗争，并要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坚决转变。它主要的不是批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而是批判立三路线“不过是‘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和对于实际上真正革命的去组织群众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批评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右倾，并告诫全党“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这就使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思想不仅不能克服，反而更加扩大了。二是打着坚决实行“国际路线”、反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旗帜，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得以夺取了党的领导权。

会议最后由共产国际代表作结论，并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的候选人名单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拟定的，共有十六人。为了扶持王明等人上台，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吹嘘了王明等人是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的。说四中全会就是要引进在反立三主义斗争中拥护国际路线的人到中央委员会中来，并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份，以保证党的领导。但是，许多与会代表不同意王明等人参加中央领导机构，米夫即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强调共产国际的

组织纪律，坚持要把王明等人选入中央领导机构。在激烈的争论中，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名单被通过。选举的结果，瞿秋白、李立三、罗迈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罗迈、贺昌的中央委员资格也被取消。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被选进中央政治局。中央的职能部门，除周恩来仍任军事部长外（由于王明宗派集团的重要骨干都是些根本不懂军事的教条主义的书生，军事工作只好仍由周恩来同志继任），组织部长是赵容（康生），宣传部长是沈泽民。四中全会后不久，青年团中央也进行了改造，秦邦宪由团中央宣传部长接任团中央总书记职务。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九月又建立了以秦邦宪（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和会议内容的安排，同何孟雄等人的主张是相矛盾的；与罗章龙等人计划通过召集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以取得领导权的打算也是相违背的。所以会议一开始，就围绕会议的性质、议程和改造中央机构等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会议的性质上，何孟雄和罗章龙等人都主张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认为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至今没有转到“国际路线”上来，不能领导全党进行战斗，必须召集类似“八七会议”的紧急会议才能解决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国际代表米夫等人则认为：召开四中全会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是可以解决“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等急待解决的问题的，不必

召开紧急会议。接着罗章龙等人又在会议的议程和时间上提出不同意见，也被米夫否决了。最后在改造中央机构问题上，斗争发展到了高峰，也可以说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所在。与国际代表提出的十六人政治局名单相对抗，罗章龙等人提出了一个打倒一切、彻底换班的九人政治局的名单。在米夫的坚持和压力下，罗章龙等人的名单也被否决了。罗章龙一派的人虽然大闹会场，但大局已定。王明等人从此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是在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把持操纵下进行的。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全党长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六届四中全会并没有解决党内的矛盾，相反，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并激化了。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人并不甘心失败。会议刚刚结束，他们就加紧了反对四中全会的非组织活动。他们打着为召集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而斗争的旗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们召集了一部分对六届四中全会不满的代表和非代表十人，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推举了罗章龙、徐锡

根、王克全、王凤飞等五人组成一个临时中央干事会，由徐锡根任书记。这实际上就是另立中央，也就是人们通称的“第二中央”。

临时中央干事会成立后，罗章龙等人分裂党的活动就更有组织地进行了。一月中旬，当王明宣布改组江苏省委时，王克全声明退出，并召集了第二次江苏省党代表大会选出的部分省委委员，成立了以王克全为首的第二江苏省委，形成了在一段时期内，两个省委并存的局面。随后，江苏省委的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外县来沪的干部中进行活动并宣告外县工作脱离新省委的领导。与此同时，王凤飞在上海的闸北区，蔡博真、彭泽湘在上海的沪中区，也成立了第二区委，参加第二省委的分裂活动。

在江苏省委改组以后，王克全还纠集了一些人闹了一场占领省委机关的闹剧。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王克全带了几个闯到老靶子路十号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要接收省委文件。负责省委财务工作的彭休士和我都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就吵吵嚷嚷不肯罢休。后来，管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同志赶来，他说，这样争吵，会引起敌人注意的，可不行。王克全他们怕出事情，就溜走了。

除了成立第二江苏省委等活动之外，他们还派人到各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罗章龙等人这样肆无忌惮地违反党的组织纪律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严重地威胁着在白区险恶环境下的党组织的安全。在对他们进行劝阻无效之后，一九

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

四、王明宗派集团排斥异己， 控制上海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还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前，王明宗派集团就集中力量企图控制上海的党组织。王明等人以江苏省委为据点，进行了一系列排斥异己、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中央政治局的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下达以后，十二月间，江苏省委作出了在上海党组织中对这两个文件进行广泛讨论的决定。王明等人即借此机会，在上海党组织中公开攻击中央，并进行夺取上海党组织领导权的活动。王明派出他的亲信到上海各区委参加讨论，并授权给这些人必要时可以改组区委。这样，上海各区委都召开了会议，攻击中央这两个文件是以调和主义反对调和主义等等。同时，王明把他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印发给各级党组织，以新的“左”倾纲领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相对抗。

王明采取这种公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对抗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各区的许多党员干部的反对和抵制。王明宗派集团就采取撤销工作，停发生活费，强迫迁移居处等卑鄙手段，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在生活上受到折

磨，陷于厄境。然后，王明再对他们进行分化、拉拢。如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同志（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当时是坚决反对王明的。王明在打击他之后，又亲自两次找他谈话，强要他改变观点，甚至还让人向蔡博真同志传话，说蔡如能改变立场，王明就可以提名蔡为江苏省委委员。但遭到蔡博真同志的怒斥。王明见蔡博真同志不肯就范，便撤掉蔡的区委书记职务。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底，王明又以讨论九十六号通告为名，由江苏省委出面，召开了一个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进行他的反党宗派活动。王明集团布置召开这个会议的意图，是要公开打击以何孟雄为首的一批反对他们的干部。会前，王明集团预先组织好了发言内容，会上王明作报告，除几个省委和区委的干部作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之外，主要是由沈泽民和陈昌浩发言。陈昌浩的发言，主要是以他在上海搜集到的所谓材料来吹捧王明的报告的正确，攻击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某些干部（实际是指何孟雄等同志）是在“反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煽动到会者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陈昌浩还指名攻击了何孟雄等同志，并对有人要求改组中央的意见表示支持。在他们之后的发言，都把矛头指向了何孟雄等同志，实际上是对何孟雄同志进行围攻。

王明还利用他主持会议的权力，几次阻止何孟雄等同志的发言，直到何孟雄、蔡博真等同志严正地提出抗议，

他才不得不作让步。

何孟雄同志的发言，以立三路线使上海工作受到损害的实际教训为据，有力地驳斥了王明一伙的错误主张，指出他们的纲领是“新的立三路线”，并指责他们在上海党组织内进行宗派分裂活动，是破坏党的团结的；号召上海各区委的党员干部起来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错误主张和分裂党的活动。

这样，在会上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种意见一经交锋，有的原来站在王明一边的转过来反对王明了，有的采取沉默态度了，王明看到会议的发展对他不利，就马上宣布休会，并急忙密商对策。当会议继续进行时，王明集团就更加猛烈地围攻何孟雄同志，诬蔑何孟雄等同志是“右派”，帽子满天飞；并且限制何孟雄等同志的发言，后来便匆匆结束了会议。最后王明作结论说：会议通过对九十六号通告的意见和对中央的建议。何孟雄等同志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更不同意王明对他们的批评。王明就借口“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蛮横地宣称：谁不遵守这个原则，将按组织纪律处理，以此来压制反对他们的同志。这次会议以后，反对王明的干部反而增加了，何孟雄等同志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王明并没有达到完全控制上海党组织的目的。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江苏省委在王明的操纵下，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部署，就是进一步排斥异己，孤

立和迫害打击何孟雄同志。

王明直接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由省委使用。事先，陈昌浩、李竹声在王明家里和王明密商人选，后来向中央点名要这批干部。陈昌浩、李竹声、殷鉴、朱阿根、潘问友等都是王明向中央要来的。这些人到省委后，王明就将上海各区的区委书记作了一番调整，不听话的撤职、调动，由这些人接任，如陈昌浩到沪东区委，朱阿根到沪西区委，殷鉴到沪中区委，焦明之到闸北区委，夏采曦到法南区委。原来的区委书记或调动或担任区委委员。凡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他就一律加以无情打击，从批评直到撤职，有的还不发给生活费。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接着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会上王明宣布：上海党组织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时，首先要集中力量开展反对何孟雄等人的斗争；要把这一斗争与反对罗章龙的斗争结合起来。

1. 他强调何孟雄等反对四中全会，不服从新的中央，是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障碍。他诬蔑攻击何孟雄同志是“老机会主义”，者“长期对党不满”，“有个人野心”，“与罗章龙右派同流合污”等等，把何孟雄同志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当前的主要危险，

强令大家对何孟雄等同志要“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

2. 他要求各区委紧急布置上述工作，把这一斗争从党内扩大到赤色群众组织和党的外围团体中去。他宣称何孟雄等同志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他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同志组织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和区一级干部就有二十余人之多。

3. 他要检查各级组织、各级干部与何孟雄等人之间的关系。宣称对那些坚持不与何孟雄等划清界限的干部要清洗出党。对于那些一时不能与何孟雄割断联系的组织，要省委主动与这些组织切断关系。

4. 他还派人对何孟雄等同志进行“分化”工作，并密切注意他们的动态。王明决定：江苏省委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等发生联系；江苏省委还停发何等一切生活费和工资。

不久，王明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由他一手操纵，没有通知何孟雄等同志出席。会上，王明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攻击何孟雄等内容的报告；其他发言都是事先布置好的，因此，这次会议顺利地通过了王明的报告、拥护六届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等人

的决议。这以后，王明在江苏省委还经常散布流言蜚语，中伤何孟雄等同志，经常主持讨论如何对付何孟雄等同志的办法。他曾经布置过：

1. 在反对何孟雄的斗争中，最主要的是要揭露何孟雄和罗章龙的同伙关系，这才能打中“何孟雄的要害”。要采取一切措施争取一九三一年四月底前结束这场斗争，使中央能在四、五月的会议上对何等作出政治上、组织上的结论；

2. 中央经过调查，认为何“政治情况复杂”，历史上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分子；

3. 和何孟雄在一起的蔡博真等几个老资格的区委书记，对上海工作“威胁最大”。对这些人，必须进行重点批判。省委应争取及早对他们的问题作出政治上、组织上的结论，将他们开除出党；他们的问题，不一定要与何孟雄的问题一起解决；

4. 追随何孟雄的人中有一些是文化人，这是薄弱环节。省委要派人大力加强工作，对他们进行争取分化工作，并了解他们的动态。王明指定省委宣传部去进行这项工作，并要宣传部负责人直接向他汇报；

王明在江苏省委不只一次地诬陷何孟雄同志，说根据中央特科的消息，国民党特务已打进何孟雄等人的内部。他还说，国民党特务也是通过文化人的关系混到何等人中间去。他布置省委和区委都要提高警惕，采取预防措施，

防止牵连。记得有一次在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还一再声称何等人情况复杂，活动暴露，有可能遭到敌人破坏，要省委和各级组织都提高警惕；并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江苏省委、苏准会办事处等单位反对四中全会的一部分干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人，在东方旅社开会时和会后，相继被敌人逮捕。党中央政治局曾指示特科于押往龙华与租界交界之处准备劫车，抢救被捕同志。但由于时间差错，劫车未成。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好象是潘汉年或李竹声来会上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只说，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后来，他又幸灾乐祸地分析：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什么“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等。接着就布置兼管特科的潘汉年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

当大家提到如何处理善后，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解决，叫省委不要管。在以后的省委会议上，王明没有主持过如何营救这些被捕同志的讨论，也没有详

细地提到这批同志被捕的原因以及中央准备如何营救他们。只是在有人问起时，他回答说：“正在了解中。”有一次他说：根据现有材料，这次大破坏的原因，一个可能是由于被捕者中间出了叛徒；另一个可能是由于文化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主义习气，使得国民党特务有机可乘。关于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王明的冷淡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出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地，还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继续攻击诬蔑他们。他胡说什么他们的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并提出要以此为教训来警告、争取那些何孟雄的支持者们，乘此时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恶狠狠地布置：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并罗织了何孟雄的若干条错误，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他还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和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

在江苏省委会议上，王明嘱咐大家：对下面一定要讲清楚中央、省委虽然采取了营救被捕同志的种种措施，但毕竟无效。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王明不仅是一个个人野心家，也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人。

何孟雄等同志在王明宗派集团排斥异己、无情打击下壮烈牺牲了。

从山东到太行

肖 华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许多根据地孤悬敌后，处在敌伪势力的分割包围之中，相互间的往来极其困难。广大地下党员和游击区的干部，凭着党的群众路线和统战政策，在这些根据地之间迎送各级领导同志，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我曾从山东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横跨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的敌占区。沿途那充满传奇色彩的日日夜夜，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一九四二年秋天，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机关研究决定，由我前往太行山，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山东分局对敌斗争的形势和五年来的工作情况；在前往太行山的途中，就便检查一下湖西、鲁西的工作，传达刘少奇同志当年春天对山东抗战工作的指示精神。

我们处于敌后的敌后，穿越鲁西等游击区和敌占区进入太行，其间要跨越封锁严密的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在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大规模的疯狂扫荡之后，特别是在华北

我军百团大战之后，敌人仅在山东地区就安了二千四百多个据点，在主要城镇及铁路干线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建立维持会，扶植伪政权，到处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加紧巡逻和盘查，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游击根据地的蚕食和经济封锁。这一路敌情紧张，要经过许多关口。与我同行的有一个警卫员和两个秘书，警卫员叫徐登坤，秘书一个是康茅召同志，一个是我的夫人王新兰同志。

(一)

当时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关住营南县十字路。我们从十字路上马启程，秋高气爽，马疾如飞，渡过沂河，便迅速进入了鲁南的抱犊崮山区。

在费县的一个小村庄里，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王麓水向我们详细汇报了鲁南的斗争情况。由于日本侵略者采用“分进合击”、“清剿剔抉”、“铁壁合围”等各种毒辣手段频繁地进行“扫荡”和“蚕食”，我们的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碎块。我鲁南基本区被压缩在东西长四十华里的狭窄地带，当时仅占有村庄一千七百三十四个，人口六万四千六百二十人，土地面积二千二百五十五平方公里，而敌顽占据的村庄却有五千五百八十三个，人口二百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人，土地面积七千三百一十二平方公里。我们根据地南北最宽的地方十余里，窄处仅仅一、二华里，对面打枪，这边能听到清晰的枪声。面对这

样的局面，我概括了一句话：“鲁南的党政军民是站在一条线上”，把张光中、王麓水给逗笑了。

艰苦沉重的战争重担，也压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肩上。我们住在庄子里，老乡只好用掺子煎饼来款待。在一般群众家里，妇女们先一天晚上将糠皮、红薯根和小小的山梨泡进水里，到鸡叫时分就爬起来推转着沉重的石磨，在小油灯下把它磨成稀浆，然后用柴禾烧起鏊子，烙成一张张又酸又涩，难以下咽的煎饼来充饥。大清早起来，辛苦了半宵的女人形容憔悴，眉眼也被柴烟熏黑了。生活是艰难的，辛酸的，但人们的意志是坚定的，神色是严峻的。

我们下一步就要越过津浦线，进入湖西地区。因为沿途的枣庄及铁路沿线是日本侵略者重点控制的地区，所以铁道游击队政委杜继伟便带了十多名武工队队员，亲自赶到鲁南来迎接我们。他们身着便衣，腰插驳壳枪，一个个精悍、利落，他们大都是铁路工人和枣庄的煤矿工人，对津浦线韩庄至滕县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非常熟悉。

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我们换上了便衣，经过一晚上的夜行军，在拂晓时分赶到了枣庄、峯城之间的丘陵地带。这里离枣庄只有七、八里地，因为天亮了，不能走了，必须隐蔽下来，静等天黑。杜继伟同志将我们四人安排在一间麦秸搭的看庄稼的小窝棚里，叮嘱了注意事宜，便和游击队员们分散到远远的公路边上警戒去了。小窝棚底部是凹下去的，尽管铺着麦草，仍然湿乎乎的。窝棚低

矮，周围又远离村庄，十分僻静。中午饿了，我们就啃几口自带的包谷面饼子，喝几口凉水。为了隐蔽目标，在野地里，我们是不能起烟火的。

天黑下来了，游击队带领我们继续前进，在曲曲折折的小路上奔波一宵，赶到了南沙河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这儿离津浦铁路只有五、六里地，不时听得到火车奔驰的声音。进村后，我们住进了伪村长的家里。村长四十岁上下，瘦瘦的，他名义上是伪村长，实际上是铁道游击队安排下的我们的情报员。他见我们接连走了两个晚上，忙烧水让我们洗脚。为了给我们让出地方，村长自个儿到村公所去了。趁此机会，杜继伟同志详细汇报了铁道游击队在这一带的活动情况：他们主要活动在兖州、枣庄、滕县一带。车站上的职工，经常给游击队送情报，如火车几点到，开往何处，装载的是什么货物及数量多少，游击队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准确无误。开火车的司机也有游击队的内线。他们时常将运载军火弹药的车厢，开到预定的两个车站之间时，故意放慢速度，卸开车厢挂钩，让埋伏着的游击队以闪电般的速度全数搬走，或者炸掉。武工队员们主要是当地工人，他们化整为零，分布在附近的大小村庄，机智勇敢地活动在铁路沿线，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敌伪汉奸，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袭击。搅得铁路沿线的敌人心惊胆战，寸步难行。在鲁南，在铁道游击队的家乡，老百姓是大海里的水，游击队员们就是水里的蛟龙……听了杜继伟

同志的介绍，联想到路上的所见所闻，事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为铁道游击队的战士们写下了一首诗歌：

神出鬼没铁道旁，袭敌破路毁沟墙。
深入兽穴斩虎豹，飞越日丰夺械粮。
汪洋大海游击队，怒火熊熊敌后方。
条条铁轨成绞索，寇灰满载运东洋。

后半夜，乘着茫茫夜色，我们疾速越过了津浦线。身后不断传来维持会派人巡逻的梆子声及“没有事哟”的报平安的唤声。一行人摸黑走了十余里，与微山湖游击队派来迎接我们的张队长（张新华同志）接上了头。杜继伟带领的游击队完成了护送任务，与我们分手。黎明时分，来到了微山湖畔，张队长领着我们跨上了预先准备好的渔船。渔船在密如墙堵的芦苇荡里折来转去，载着我们进入了水气弥漫的微山湖里。天放亮了，水青苇碧，看得见七、八里外湖中的小山，山上有敌人的碉堡。回看湖岸，周围也是碉堡林立。日本侵略者用他们的魔掌，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了多少罪恶的标志呀！张队长他们从小渔船的篷子里端出事先预备好的早餐，有干粮，有热水，有烧好了的鲜鱼。这时候，我们才感到又渴又饿，饱餐了一顿。船隐在芦荡之中，我们必须在船里隐蔽上一天。碉堡上那罪恶的“眼睛”，象秃鹫一样，整天搜索着湖上的动静。张队长告诉我们：“放心休息，周围的群众都是我们的人，湖上的敌人有我们游击队监视哩，芦荡中水路复杂，深浅不

一，敌人不熟悉水道，是不敢轻易往进闯的。”其实，在斗争的初期并不是这样。那时，湖上游击队公开活动，敌人动不动就开着汽船进行清剿，甚至狡猾地化装成渔民袭击我们。从斗争中吸取教训，我们把游击队分成小股，分散开来进行隐蔽的斗争，加之又做了大量瓦解敌人争取维持会的工作以后，日本侵略者就无能为力了。我们的游击队员都是本地渔民，如张队长就是沛县人，对微山湖上下的情况十分了解，依靠群众，行动自如，可以不断主动地袭击敌人。敌人只好龟缩在据点里，反而不敢轻举妄动了。

夜幕降临了，小渔船拐出芦苇荡，将我们很顺利地送上了微山湖西岸。弃舟登陆，走了七、八里地，在沛县以北，湖西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和政委张国华派了一个骑兵排来迎接我们。无风无月，一派漆黑，三十多骑马在弯弯的小道上鱼贯而进。因为走得急，天又黑，迷失方向，撞到了敌人的一个据点附近。望着据点上鬼火一样的灯光，我们急忙拨转马头，向回折去。领头的张队长，夜暗之中，在路旁看到了斗大一块卧着的石头，跳下马辨了辨方位，很快就弄清了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定了我们该去的方向。在他的带领下，鸡叫时分，我们顺利地赶到了丰县、单县之间的湖西军区司令部。

铁道游击队和湖上游击队是连接山东根据地和太行山根据地的重要枢纽，少奇同志三月从苏北进入山东，在山

东工作了四个月后，返回延安时，也是从这条交通线上秘密通过的。从表面上看，敌人是凶恶的、强大的，它们控制了交通干线和重要村镇，建立了伪政权、维持会，到处设置了密如蜘蛛网的封锁沟、封锁墙，严密盘查，耀武扬威。实际上，他们是空架子，当地的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八路军在根据地群众中影响很大，群众衷心拥护八路军，信任八路军，想尽各种办法保护它、支持它，这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这一次，我们能够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安然通过，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民怀抱的温暖，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坚不可摧的。

在湖西，我们驻了一个星期。邓克明同志、张国华同志和我们一起东奔西走，听取各单位的工作汇报；同时，又由我传达了少奇同志对山东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一九三九年，湖西地区出现过令人痛心的“肃托”扩大化的现象，一次就抓了一百多人，许多好干部和统战人士受到了无情的打击。罗荣桓同志得知情况后，亲自赶到湖西进行处理，果断地撤换了领导，才从危难中挽救了湖西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根据地。当我传达少奇同志的《党内斗争问题》的报告时，同志们联系亲身的经历，对湖西在抗战初期发生过的“左”倾错误及其严重危害，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天气一天天凉了，我们身上也都换上了棉衣。在湖西的工作告一段落后，邓克明和张国华同志又派骑兵连护送

我们向北行进。不久，赶到了郛城以南的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区党委书记黄敬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冀鲁豫军区是以原来鲁西军区为基础扩大起来的。鲁西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党政军各部门里，都有许多我所熟悉的战友和同志。这里的山山水水，我觉得分外亲切。在这里，我们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工作情况，传达少奇同志的指示，大约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二)

我们下一步是要从晋、冀、鲁、豫四省的交界处，越过敌占区，跨过平汉线而进入太行山。可以说这是最困难、最艰苦的一段行程了。通过敌占区，当然也可以采取武装通过的方式，眼下要经过平汉线，起码要一个团以上的兵力掩护，才能突得过去。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决定采取经过内线工作、隐蔽通过的方式。我们人少目标小，这样通过也是很安全的。从范县出发前，组织上就派来了给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带过路的敌工部部长王乐亭同志。他是河南安阳人，个儿不高，生就的圆脸，白白的，年纪三十岁上下，神态安详、文雅，象个教书的，又象是个经商的。

动身前，我们将携带的有关文件全数交给了王乐亭，由他从另外一条更隐蔽的地下交通线送走了。我们清理了身上的物品，连常用的钢笔也留下了。头两天，我们乘马

而行，经清丰，过南乐，顺利地赶到了内黄的大沙窝。大沙窝是蔓延三十余里的干旱区，到处丛生着灌木，人们的生活是艰苦的。这里离平汉铁路只有百把里地了，属于游击区和敌占区的交界处。我和王乐亭、康矛召、徐登坤都脱下军装，换上了可体的便衣。王新兰也换了装束，下面扎上了黑腿带，头上扎起了红头绳，骑一头小毛驴，乔装成回娘家的新媳妇。王乐亭同志叮嘱我们，一路上要尽量少开口，少说话。因为我和康矛召、王新兰都不是本地人，口音南腔北调，说话多了就容易引起怀疑，容易出事。

我们以商人的身份进入敌占区了。这里在敌人的严密控制之下，老百姓很少往来，路上行人也很稀少，加上经常有土匪绑票、抢劫，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村庄里，田野上到处是一派凋敝荒凉、民不聊生的景象。与解放区、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气氛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走在路上，我们感到心情很压抑。

进入敌占区前，我们隐了真名，各人起了个化名。我的化名叫“春涛”。进入敌占区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在离内黄不远的的一个房屋零散的小村落里。村里住着伪军一个小队，王乐亭通过内线，将王新兰同志安排在伪军小队长（这个伪军小队长是我们的内线）太太的屋里。我们四人在村里没法住，被安排在村外一间看场的小土房里。房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土炕，炕上铺垫着麦秸。王乐亭买来几个馍馍，带来一壶凉开水，我们胡乱填饱了肚子，将

棉袄裹在身上，准备在麦草上过夜。正在这时，又来了两位往来于游击区和敌占区之间做生意的商人和一个从外地来的伪军士兵。小土炕上要挤七个人，只好横成一排儿睡，我们每人寻了一块砖当枕头。那两个商人问我们：“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王乐亭笑着答：“做小买卖嘛。这年月，胡乱混一口饭吃。”他怕那两个商人寻我搭讪，放砖头时给我施了个眼色，让我靠墙，睡在最里边。王乐亭自个儿睡在我们和那三个陌生人的交界处。那两个商人转过头又问那个伪军士兵：“你老兄是从哪儿来呀？有公干么？”那个伪军唉地叹了一口气：“这儿有个排长是我的朋友，我是从冀南到这儿来找他帮忙，投靠来啦。”

上炕以后，两个商人旁若无人地谈开生意经啦，谈这一带的出产，谈什么最赚钱，谈怎么样和日本人及当地的地痞、土匪进行周旋，从中渔利……那个伪军翻了几个身，一下子睡不着，又觉得无聊的不行，也就和两个商人掺和在一起，有一句没一句地扯起来了。扯到热火处，两个商人问伪军：“你在冀南当兵吃粮，有啥不好，干吗跑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伪军说：“唉，别提了。我们在冀南是配属皇军扫荡陈再道、宋任穷的八路军的。八路军可厉害啦，我们一千多人马路八路军一接火，眨眼间，他们的手榴弹、刺刀就闪到眼前了，我们的人兵败如山倒，被人家打了个稀里糊涂。幸亏我丢了枪，跑得快，才保住了这

一条活命。如今在冀南是呆不成了，我只好到这儿来投朋友，寻碗饭吃。”两个商人补充着说：“嗨！日本人那么厉害，也不是八路军的对手，你们算什么？”

我们四人静静地躺着，听着，不敢笑，也不敢吱声。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条土炕上，与他们一块睡着三个共产党员，一个共青团员呀！

夜深了，王新兰同志不放心，特地从村里赶出来，悄悄地敲了敲土房的门板，唤了声“春涛”。听我答应了一声，她知道我们安然无事，才放心地回村去了。为这事，第二天早晨，王乐亭同志特别告诉新兰：“往后，晚上你一个人不能随便走动，这里是敌占区，伪军很不讲理，最容易出事的。”从这个小村庄出发之前，王乐亭同志又作了新的安排：“下一步要出大沙窝了，为了缩小目标，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五个人得分成两路走。”在他的指点下，康矛召和徐登坤同志从北面一条交通线上走了，我们三人仍按原定路线行进。

黄昏时分，我们赶到了一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村边上是一个姓程的土围子，这家地主兼商人，是个开明士绅。为了保住产业，他虽然表面上应酬着日本人，但毕竟是具有爱国心的。我们八路军主动地争取他、团结他，做了许多工作。这天晚上，地主本人外出了，由一个同我们有内线关系的管事，安排接待我们。

王新兰同志进了土围子，准备和七姨太一块住一个晚

上。进围子之前，王乐亭悄悄地叮嘱她：“进围子后不要大意，说话要小心。七姨太有文化，见过世面，现在又是掌家的，与她接触，手脚放大方点儿，千万别露出什么破绽来。”王乐亭和我就在围子外面的另一个管事的家里过夜。他家里房子不大，桌凳齐备，炉火暖烘烘的，热气扑人，比起昨天晚上那个冷落的小土炕，好得多了。

在敌占区的这第二个夜晚，最让人担心的是在围子里的王新兰同志的处境。

进了围子，有人领着王新兰向七姨太的住屋走去。

屋子建筑是新式的，锃亮的玻璃窗，挂着十分阔绰的金丝绒窗帘，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从这房屋就可以想见，这个地主走南闯北兼做生意，经常出入北京城，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不是一般的土老财。在静悄悄的屋子里，王新兰见到了七姨太，她年纪二十上下，穿着镶金边的紧身旗袍，烫头发，穿丝袜，着半高跟黑布鞋，秀眉秀眼，人样儿也挺俊气的。方才从院里经过，王新兰也偶而看到过的几个姨太太，满身绫罗绸缎，表面上是富贵气象，但与七姨太比较起来，反而显得有点土气。因为王乐亭事先已经打通了关系，七姨太对王新兰倒很热情。她将王新兰让进屋里，笑着说：“今夜晚给我做个伴儿，咱俩就睡一个床吧。”说着指了指干净整齐的大双人床。接着又问王新兰从什么地方来，到哪里去。王新兰说：“我先生是个买卖人，到处经商，我顺便随他出来走走。”七姨

太又问王新兰：“这样说你先生从前读过书喽，看样儿，你从前也念过书吧？”王新兰点点头。“你从前在哪儿上学呀？”王新兰答：“在北京一个女子中学。”其实，王新兰根本就没有去过北京城。在部队时，因为有两个医生是从北京的学校出来的，经常在闲谈中提说起北京的学校，在这儿，王新兰随机应变，就胡诌了一句。谁知这么一说，七姨太反而大大地高兴起来了：“好呢！我也是从北京的学校出来的，今日个算是逢见老同学了。”

七姨太这一高兴，反叫王新兰心吃一惊。她生怕七姨太刨根问底，察出破绽来，就连忙主动应酬：“在家靠亲戚，出门靠朋友。我们在外做生意，路上不安宁，不好带什么东西。第一次见面，就给你添麻烦了，我这儿有点钱，你留着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一面说，一面迅速从兜里抓出十块银元塞给七姨太。七姨太推辞了半天，推让不开，就感慨地说道：“唉！你倘若不是念过书的人，在钱财上也不会这么大方的。这里的人哪，眼皮儿浅，见一个铜板就眼红。还是咱读书人想的开，明白一些。”

正说着，女佣人提来木制的大食盒，摆晚饭来了。王新兰觉得身上发热，额角上沁出了细汗，这时她才留意到，屋正中有一个明亮亮的可以照见人影儿的黄铜火盆，盆里架着红艳艳的木炭火。晚餐十分丰盛，有鸡有鱼有肉，就她们两个人，桌上满满地摆了七八个菜。七姨太屋里是很严格的，除了贴身女佣，别人是不敢随便进入的。女佣摆好

饭，悄悄地退出去了。

她俩一面吃饭，一面拉家常。七姨太似乎是难得逢见个可以倾诉心事的人。话也显得特别多。她说道：“我原来在北京是个中学生，当家的看上我有文化，讨我来给她管家务。可业这么大，头绪这么多，他经常在外面跑，而别的太太们见我年轻、貌美，又有文化，嘴里不说，心里嫉妒我，暗地里有意与我为难。说是管家，实际上是受不完的窝囊气……唉！回想我当学生的时候，多自在啊！”说到伤心处，七姨太眼圈儿都红了。

七姨太抬起头来，忽然望着王新兰：“你多好呀！你先生是读书人，志同道合，跟着他到处走，又自在又自由，哪儿象我们，命运不好，落到了这步田地……”临睡前，七姨太又悄悄地对王新兰说：“一回生，二回熟，咱俩都是学生出身，又都是中国人，现在这年月，中国人的心还是向着咱中国人的，谁都不愿意当亡国奴。咱俩交个朋友，下次回来从这儿路过，还是住到我的屋里来吧……”

在抗日战争那最艰苦的年月里，国内的阶级压迫、阶级矛盾依然存在着，可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民族矛盾毕竟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了。国内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个爱国人士，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而抗日战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民族的统一战线，才能夺得伟大胜利。在敌占区所经历的这一不寻常的夜晚，加深了我们对这一重大问题的

思考与理解。

翌日清晨，吃过早饭，我们三人又上路了。这一次不同既往，我们坐进了程家的轿车。轿车上有帘子，帘子上有明镜，三个骡子，几串铜铃，由一个专门赶车的车夫挥鞭吆喝。我望着坐在身边的敌工部部长王乐亭，暗暗钦佩他的精明和能干，佩服敌工部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出色。

夕阳西下，在敌占区的第三个夜晚快要降临了。

天黑时分，车子进了安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离平汉线已经很近了，可以清晰地听到火车的奔驰声，鸣叫声。车子三拐两拐，停在一个收拾得挺漂亮的小院里。王乐亭悄声告诉我，这是一个伪政人员的家庭。

这家两口子很热情，给我和王新兰同志专门腾出了一间屋子，炕上的新棉被花色艳丽，靠里墙整整齐齐横叠了七、八床。八点多，天黑严了，村外的公路上一阵响声，突然出现了一束汽车的灯光。那位伪政人员即拔出驳壳枪，镇静地说：“万一是鬼子进来了，你们迅速从窗子跳到后院躲藏起来。这儿有我应付，你们放心好了。”汽车没有进村，沿公路向远处驶去了。他收起了驳壳枪，蔑视地说：“别看日本人飞扬跋扈，实际上他们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八路军和老百姓才是天罗地网。在我们这儿，日本人是瞎子、聋子，只有挨打的份儿。”这话说得多好呀！

他的太太忙着为我们收拾晚饭。王新兰上去帮忙，正拉风箱时，那太太忽然凑近王新兰的耳根，悄声说道：

“你大概是刚学会梳头的吧？看看，头发没裹好，掉下来了，要是在外面，这该多危险！”王新兰感激地点点头。这位太太又补充道：“下半夜动身时，我来帮你梳头吧。”吃完了饭，我们忙去休息了。

鸡叫时动身，那位伪政人员亲自带路，拂晓前赶到了临近铁路的一个村子里。铁路边有丈把深的封锁沟。他打算带我们到村公所去，村公所可以放下吊桥，使我们尽快通过。我们几个人转过几条街，快要走到村公所门口时，突然从一堵土墙的角上伸出一只巴掌，惊得他倒退一步，赶忙拔枪。墙后转出一个汉子，一面将我们往边上的一户门里推，一面急惶惶地说：“快躲起来！日本小队长刚进村公所，正到这里查路哪！”好险呀，转过墙角就是村公所，再差上几秒钟，或者我们几个人的响动大一点，就非出事不可。我们捏了一把汗，静静地躲进老乡家里，度过了这最危险的时刻。

等这一小队鬼子走后，村公所的人才偷偷地摸出来放下吊桥。在迷蒙的晓色里，我们从安阳和磁县之间顺利地越过了平汉铁路。过铁路不久，就进入了游击区。天亮了，秋末冬初的朝阳格外暖人，照得迎面的太行山清晰如画。

在敌占区的三天三夜终于结束了！这是惊心动魄的三天三夜，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三天三夜。我们踏着阳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三)

当我们赶到涉县的一个主管敌战区统战工作的办事处时，从大沙窝与我们分头行动、走另一条交通线的康矛召、徐登坤同志已经提前赶到了，正在等我们。战友重逢，分外高兴。办事处主任王伯屏，胖胖的，四十多岁，安排我们休息了一天一夜。我们脱下便衣，重新换上了军装戴上了军帽，一下子找不到合体的新衣，我就穿了一身炊事员同志换下的旧衣，大伙围着我笑，说我象个很地道的伙夫。

换上军装骑上马，我们当天就赶到了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黎城。邓小平同志听说我们来了，十分热情。我问怎么不见刘伯承同志，小平同志说到麻田八路军总部开会去了。紧接着，小平同志就关切地询问罗荣桓同志的身体情况，而且问到了从上海赶来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为罗荣桓同志治病的情景。革命战友是心心相连的，千里关山，战争烽火，隔不断革命的情谊。我向小平同志详细报告了罗荣桓同志的身体状况，同时又汇报了山东根据地斗争的情况。在黎城，我们停留了两天，小平同志让政治部主任柴树藩同志亲自招待我们，并向我们仔细地介绍了一二九师及当地的有关情况。

第三天，告别了黎城，师部派几匹马护送我们到了总部。过清漳河时，在河滩上有七、八个人随着一匹马迎面

而来，马上那人腰扎皮带，背着手枪，愈走愈近了，啊，是刘伯承同志！刘伯承同志也认出了我，立即跳下马来，热情地迎上来：“肖华，你们来了呀！山东是敌后的敌后，你们远道而来，辛苦啦！”刘伯承同志那时候才五十岁上下，身体结实，满面喜悦。长征路上，我随他一起翻越大凉山，一块渡过大渡河，相互间是很熟悉的。从那时分手，天南地北，我俩有七年没有见面了，在太行山突然相逢，我们心情很是激动。刘伯承同志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们漫步在河滩上；简直有说不完的话儿。我北去麻田，他南返黎城，总不能不分手喽。我问他：“这儿到总部还有多远？”刘伯承同志望着我，风趣地说道：“难走的路还在前边，渡过这一段困难后，就是宽板大道了！”分手之后，他上了马，从马上还回过头来说道：“从总部回来，到我这里来住，我们好好谈谈。”……弹指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相逢于清漳河河滩上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麻田是太行山里的普通小镇，座落在长年流水的清漳河畔。我们八路军总部司令部住在麻田，政治部住在离麻田五、六里地的桐峪。那一天，我们赶到了桐峪。一到那里，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和他的夫人郝治平同志在村口迎接我们，并想办法拿出最好的饭食来招待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每天都准备有小米干饭，肉炒山药蛋。我们在桐峪住了四天，第五天又搬到了麻田，在一个

村长的家里住。总部的负责同志彭德怀、滕代远、张际春、周桓、刘锡武等同志经常来看望我们。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路军总部在麻田召开了北方局会议。在会上，由我详细汇报了山东地区敌顽我斗争的形势，根据地的建设情况，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敌占区工作的情况，也汇报了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和整个山东军区部队的建设以及刘少奇同志对山东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我记得，我向与会同志汇报了三个半天，同志们讨论了两个半天。会议期间，彭总与到会的领导同志对山东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了许多宝贵的指示。会后，又由北方局起草发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给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信》。

在麻田工作的日子里，我永远忘不了彭德怀同志所留给我的亲切印象。

在那艰苦的年月里，总部的同志们吃的是黑豆、包谷、洋芋，彭总优待我们，特别给我们匀出小米来。他经常到老乡家里来看望我们，进门找不到坐的，他就坐在门槛上与我们交谈。老乡见到他，就象见到自家人一样，总是“老彭”长，“老彭”短的。丝毫看不出副总司令的架子。

有一次，彭总请我们吃饭，浦安修同志外出了，由滕代远与他的夫人林一同志作陪。那天吃的是二米饭，搞了个小火锅。彭总拿出一个别人送给他的从日本侵略者手里

缴获的牛肉罐头，平时舍不得动的，因为我们是远道而来，彭总一定要打开它。山里没有开罐头的工具，彭总拿起了一把刀子又砍又撬，一不小心，刀子将手划破了，弄得鲜血直流，赶忙找纱布包扎了起来。那一天，彭总的兴致很高，我们在座的也都很高兴，大伙一边吃饭，一边说笑。

我抽暇也到彭总的小屋里去过，这是他和浦安修同志的住室，同时又兼作他的办公室。

屋里陈设极其简朴。书籍只有一套，是中华书局出的万有文库。墙上挂着一幅铅笔素描，是别人为浦安修同志画的肖像。屋里摆着一桌一床，就是当地老百姓的家常什物。就在这样的小屋里，彭总穿着洗得发白的打着好几块补丁的衣服，脚蹬一双布鞋，象拉家常那样，和我细聊了两个半天。谈了他童年、少年时代的遭遇，谈了他十八岁入湘军当兵，杀了恶霸地主，躲在船上渡过湘江，还谈到了参加北伐战争，谈他怎样组织平江起义，又怎样率领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他谈得很细，很深情。从他身上所闪耀出来的那种正直、顽强，不畏强暴、不怕艰难与挫折的革命精神，对我教育很大，是终生难忘的。

后来，彭总又要我们在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参观。我们参观了兵工厂和农场，尝了自制的饼干，同时又在附近的乡村进行了访问和调查。在清漳河里，总部的同志们堆石垒坝，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发电厂，司令部用上了电灯来照

明。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电灯，打开了眼界。

时隔不久，中央太行分局在黎城附近召开地委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分局书记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他的这个报告非常精辟，分析总结了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历年来的工作情况，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政策转移之后的新的局势，提出了许多方针政策性问题。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刘伯承同志、罗瑞卿同志又让我用两个小时讲了讲山东的形势和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在太行山参加了这个盛会，听了首长们的谈话，收获是很多的，对我个人的教育、启发也是很大的。会议期间，我还见到了陈赓、波一薄等许多老战友。

会后，我们又回到了黎城，刘伯承同志详细地询问了我们在敌后的工作情况，罗瑞卿同志还专门就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在太行山工作期间，由于各级首长的亲切关怀，我们顺利地、圆满地完成了汇报山东工作，听取北方局和总部首长对山东工作的意见和指示的任务。

一九四三年二月，寒冷的北方大地上已经有了早春的消息，我们四人告别了巍巍的太行山，告辞了总部和一二九师的各位首长，分作三路，以急迫的心情踏上了返回山东的里程。我们要把从太行山取来的“经”带回去，推动山东抗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山东根据地在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要作出更大的贡献。

长征中的彭德怀同志

蒋 宝 华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为纪念这一光辉历程，本文谨向读者介绍彭德怀同志对长征的卓越贡献；他作为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与一军团等紧密配合，为粉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组织和指挥了多次重大的战役；他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同“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他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为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探索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值此纪念长征五十周年之际，缅怀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功勋，对于学习和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业绩和思想，鼓舞我们向新的历史目标前进，有重要意义。

开 始 长 征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

飞机，向各苏区根据地同时进攻，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采用“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逐步压缩中央苏区，妄图消耗红军有生力量，最后寻求决战，以实现其消灭红军的目的是。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下简称中央红军）和苏区广大工农群众虽经一年英勇奋战，但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形势日趋严重，党中央被迫决定项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率地方武装（约三万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以掩护主力红军西进。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机关共八万余人，由福建长汀、江西瑞金向雩都集结，从南线突破陈济棠部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命令：军委总司令部和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军纵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野战军。为了保持军事机密，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必须隐蔽原来番号，一律使用代名：军委为“红星”，一军团为“南昌”，三军团为“福州”，五军团为“长安”，八军团为“济南”，九军团为“汉口”，各部代名由十月十五日实施。一、九军团为左翼，三、八军团为右翼，五军团为后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西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是时，彭德怀任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任军团政治委员，袁国平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三军团是一九三〇年六月由平江起义创建的红五军扩编的，下辖红五军、红八军和红十六军。第三次反“围剿”后，在会昌禾丰地区整编，三军团取消八军番号，五军直辖一、三、六三个师；第四次反“围剿”后，在大湖坪整编，三军团取消军的建制，直辖四、五、六师。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彭德怀奉中革军委命令，率三军团从石城开向雩都第一集中地富社地区集结，整顿部队，补充弹药、人员，进行战术进攻演习。十四日，率部由富社地区向雩都东北车头圩、石溪等第二集中地集结。十七日，指挥三军团乘迷漫大雾渡过雩都河，开始踏上了征途。

突破四道封锁线

当时，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突围转移，调陈济棠粤军、何键湘军等几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途中，设置几道封锁线进行阻截。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这几道封锁线，相继被突破。

十月二十日，彭德怀指挥三军团先头部队攻占白室，消灭固守堡垒的土匪二中队百余人，缴获百余支枪。当日晚，三军团推进到曹家庄、温村、鸡公寨地区。二十二日，六师与四师一部在坪石歼灭了粤军余汉谋部陈伯英

团；五师攻占了固陂。于是，三军团冲破了粤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经过九渡水，渡过大庾河，占领新城，分左右两个纵队进入湖南。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第四师师长洪超英勇牺牲。

十一月三日，三军团左纵队迫近汝城，占领城东南制高点，右纵队经益将、穿风坳亦接近汝城，形成对汝城的包围。五日晚，六师暂留汝城北进行佯攻，钳制汝城敌人。三军团主力开始西进，六日从左边道路突破湘军何键在汝城至思村间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九日，军委命令三军团占领宜章，彭德怀收到命令后，立即与军团政委杨尚昆分析敌情，作出行动部署：第五师向良田以攻占万会桥为主要目标；第六师主要目标夺取宜章；第四师主力集结于两湾洞准备截击郴州南援之敌。遂即向宜章发动进攻。三军团广大指战员克服雨天泥泞、路险道窄的困难，英勇奋战。十一日，六师首先攻占宜章城，突破粤汉铁路沿线湘粤军共同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扫清了中央红军进军的又一道障碍。

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作战英勇、顽强，连续完成了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的任务，保证了中央红军的胜利前进。十一月十一日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表扬：“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发觉了红军西进的意图，为阻截红军西进渡湘江又急调近四十万大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妄图在湘江东岸围歼红军。其部署是：一路为何键湘军和中央军薛岳所部，集中于零陵、东安和全州一带沿江布防；一路为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他们采用既防共、又防蒋的对策，将部队集中在兴安、灌阳之间，形成袋状阵地，以阻击红军南下进入广西腹地；另部中央军周浑元和湖南李云杰、李韞珩等部在红军后面追击，黔军布防于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入境。

在上述情况下，红军突破湘江，继续向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实际上已经很难实现，就是渡过湘江，也要付出相当代价。彭德怀根据他在沙场上与敌征战多年的经验，考虑红军在敌四十万大军密集布阵阻截下，簇拥着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的队伍作甬道式的前进，后果不堪设想。他向中央提出关于今后军事行动的建议：三军团应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吸引牵制敌主力，迫使敌军改变部署；中央应率一、五、八、九军团进占溆浦，并以溆浦为中心，于沅陵、新化、武冈等一带发动群众，准备战场，创建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当时，由于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又来不及调援军助战，如果能够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甩掉笨重辎重，轻装前进，在运动战中

调动敌人，予以歼灭，是可以甩掉敌人，变被动为主动的。但“左”倾机会主义者既丧失了有利时机，又对彭德怀的这项正确建议不加理采，仍坚持向湘西转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并命令红军全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根据敌人最后的部署，决定中央红军在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迅速坚决消灭敌之第一、第二路军及与我接触的桂系军队，分四个纵队前进，其具体部署：

（一）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

（二）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

（三）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相机占领该城，以后向兴安前进。

（四）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十一月二十六日，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从左翼急速行军进入广西，到达文市。于当晚连夜在伍家渡、水车两处架设浮桥，渡过湘江，向灌阳逼进。为粉碎敌人妄图利用湘江阻截，并从两翼夹击红军的阴谋，争取在敌人之前到达湘江地区，抢夺湘江渡河点，迅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以四师为前锋，经全州县的石塘圩、麻子渡，直插到

兴安县，向湘江东岸界首奔进。桂军廖磊第七军独立团见红军来势甚猛，慌忙放弃界首，撤到湘江西岸光华铺据守。四师占领界首后，立即迅速过湘江追击敌人，在光华铺与该敌对峙，牢牢地控制了背后的界首渡河点。第五师主力进到新圩以南地区，巩固马渡桥，注视灌阳敌人的动态，第六师及军团部跟随前进。此时，红军右翼部队一军团也沿着石头圩、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驻守湘江东岸的敌民团早已闻风而逃，第二师涉水渡过湘江，进至在脚山铺、鲁板桥一带，阻击驻在全州的敌人。这时，中央红军如果利用桂系军阀害怕红军进入广西腹地，而主动放弃防守阵地的有利时机，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第四道封锁线。但“左”倾机会主义者，仍然舍不得丢掉那些笨重的辎重和坛坛罐罐，庞大的中央纵队行动十分迟缓，一百多里路竟走了四天，贻误了战机。敌人从四面八方压了过来，桂军三个师向红军左翼进攻，还调一个师的兵力增援光华铺七军独立团；驻在全州到黄沙河的刘建绪四个师也向右翼发动进攻；周浑元纵队、李云杰、李韞珩等部也从后面加紧攻击红军后卫部队；吴奇伟率四个师亦从北面追来，形势十分紧迫、险恶。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湘江，三军团进行了十分英勇顽强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七日，彭德怀命第五师急速前往新圩。新圩距湘江一百二十里，是灌阳至全州公路的必经之地。第五师的任务是：阻击桂军向红军左翼三军团进攻，并掩护

红军大队人马前往湘江，以备渡江。五师到达新圩，首先观察地形，部署阵地。二十八日，桂军两个师向五师阵地发动猛烈进攻。敌人在机枪、排炮掩护下，整连整营地发起冲锋。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五师虽仅两个团坚守在没有坚固工事的十余里宽阔的阵地上，武器、弹药又不足，但全体指战员都知道如果敌人攻占了新圩，红军将被拦腰斩断，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红军更加英勇地与敌人拚杀、肉搏，在阵地上足足坚守了二天，五师参谋长胡震、十四团团团长黄冕昌在战斗中牺牲，指战员伤亡也很惨重。彭德怀不得不命令五师撤出新圩，继续在城外与敌人拚杀，争夺山头要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直坚持到三十日，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的任务。当日晚渡过湘江，归还建制。

六师留下一个团作掩护，随五师之后急渡湘江。留下的这个担负掩护主力撤退任务的团，在与敌人力量相差十分悬殊条件下，经过浴血奋战，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

十一月二十九日，位于兴安县界首南十里的光华铺阻击战打响。光华铺地处兴安与界首之间，为一片较为宽广的开阔地，距界首只有几里路。

为了阻击由全州、灌阳出击之敌，保证红军大队人马继续和适时地渡过湘江，中革军委命令三军团“于唐江市、石玉村、光华铺地域消灭由兴安出击之敌”，务必把

“唐家市道路”控制在红军手中。彭德怀遵照中革军委命令，作了部署。他首先将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几百米远的一座祠堂里，指挥这场关系重大，且异常艰巨、残酷的阻击战；同时命令已与敌对峙的四师做好迎战桂敌第七军独立团和前来增援的桂军夏威第十五军四十五师的准备。二十九日晚，敌向红军第四师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四师十团首当其冲，红军战士在团长沈述清、团政委杨勇的带领下，给敌人以坚决的回击，四师阵地岿然不动，敌人未能前进一步。翌日清晨，敌人见从正面进攻无效，就沿湘江西岸向界首逼进，妄图迂回红军。这时，团长沈述清指挥二营向来敌发起反击，与敌冲杀几个回合，正在战斗进行激烈之际，不幸中弹牺牲。为了坚决阻击敌人，彭德怀即命杜中美接任十团团长。当日下午，杜中美到十团任职，同时布置再次反击敌人，当他向三营交代任务后，前去二营阵地，刚刚爬上山头，不幸又中弹牺牲。一日之内，连续牺牲两位团长，不难想象此战是何等的激烈！四师在界首光华铺血战三昼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

十二月一日五时，彭德怀收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三军团应集合自己所有部队以保持界首地区，主力应在界首西南地区”，同时要不顾一切牺牲将“邓家塘至路江圩之道路控制在自己手中”。即果断地命令三军团各部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坚决阻击住敌人。三军团经过浴血奋

战，于当日下午终于掩护除三十四师之外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从而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妄图将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的阴谋。但红军亦蒙受重大损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随后，彭德怀率三军团跟主力西进，在石京河口、马提河口指挥四师与敌又激战两昼夜，掩护红军主力通过少数民族龙胜地区，进抵湘南通道。这时，蒋介石为了堵截红军北出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急调何键湘军及中央军薛岳部十几个师的兵力，在通道以北地区——新宁、武冈、绥宁、靖县、会同、芷江、黔阳一带布成一个袋形阵地，等待红军。同时，又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跟踪追击，桂军廖部侧击，妄图于湘江以西区域围歼红军。

正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军大量集结，阻击红军去湘西，而红军又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出现大量减员的情况，力排“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顽固坚持原订计划的错误主张，力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以甩掉敌人，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有个休整补充的机会。这一正确主张，得到军委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中央红军在通道继续向西，进入黔境，奔向黎平，从而使蒋介石妄图在湘江以西围歼红军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

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十二月十四日，三军团先头部队六团一营首占黎平县

城。黎平位于黔东南，邻接湖南、广西两省，原有黔敌一个团驻守。一营因兵力较少，又退至城外。一军团二师前往占领。随后，彭德怀率三军团主力向黎平前进，于十七日到鳌鱼嘴，四师进至黎平，稍事休整，继续向黎平西北台洪（今台江）、黄平进发。

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关于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十二月十九日，军委根据政治局决议作出关于红军最近行动的决议。彭德怀当时在前方指挥作战，收到政治局决议后，立即向师、团作了传达，并对如何执行军委的决议提了自己的建议。他提出：野战军到黔中新的战略地区后，在川、湘、黔敌人中，四川敌军在蒋敌直接组织下，可能成为正面的主要敌人。蒋介石的八至十八个师入川，并在重庆、泸州沿长江上游构成重点，以綦江、印江、赤水等为战略进攻出发地，阻隔我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湘敌将在保靖、永绥、秀山、松桃、铜仁、玉屏、天柱构成封

锁线，向乌江威胁我右翼；黔敌钳制我左后方。根据敌人疲惫、冬荒和我重新变更了战略部署等情况，目前敌人不会有'大举进攻'的动作。为能迅速创造新根据地与休养生息，形成有利形势，野战军首先应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岗、思南六县。以乌江为我右支撑点，保持娄山关在我方，以娄山山脉、乌江地势扼制敌人，我主力在绥阳、桐梓、遵义间机动，争取首先给黔敌以痛击。同时四方面军应向南充、合川沿嘉陵江向重庆方面发展与我们在茶江隔河呼应；二、六军团应迅速占领龙山、酉阳，封锁乌江中上游，对湘敌及中央军入川均有威胁，并使新老苏区联成一片。这一建议显示出彭德怀综观全局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他作为一个军团的领导人，不仅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作战部署，领导和夺取具体战役的胜利，还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明确地指出应予全力打击的主要敌人和整个红军的战略配合，使军委的作战部署更加具体和丰富。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纵队，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连克十余座县城，直抵乌江南岸的猴场。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党中央于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决定迅速渡过乌江，向黔北进军，号召全党同志为实现这一任务而坚决斗争。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彭德怀收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

关于三军团速渡乌江取得遵义的急电。电报指出：薛岳兵团正向贵阳、贵定一线前进，刘建绪兵团三个师向瓮安、施秉前进，而黔敌犹（国才）、何（知重）五个团正向开阳、清江流域布防，企图控制乌江北岸，固守遵义。三军团迅速渡过乌江，控制茶山关、镇南关，阻敌北进，亦掩护和协助中央纵队攻取遵义。三军团急开到渡江点，迅速架桥，在渡江前如遭遇到黔敌向我侧击或堵击时，应坚决将其消灭。

乌江是黔中一条大水，流域甚广，支流较多，沿江两岸，大都山脉纵横，且多悬崖峭壁，水流湍急，又多滩险，非在渡口，绝不能渡。因此，乌江在黔中号称天险，为兵家必争之地。

一月五日，彭德怀、杨尚昆根据军委指示，向全体指战员作渡江准备动员，并命令四师、六师急行军跑步前往乌江，从桃子台渡江，军团部由茶山关附近渡江，进驻遵义南边之尚嵇场。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继续北进。右纵队一军团（缺二师）、九军团速取湄潭后，主力向虾子场集中；中央纵队以第二师和干部团直取遵义，消灭黔敌，军委纵队向团溪进发；五军团集中猪场；左路纵队三军团截断遵义、贵阳交通，扼守乌江北岸，以一个师向老君关开进，再以一个师向遵义追击，协同二师和干部团进攻遵义，暂受刘伯承统一指挥。

一月七日，中央红军乘胜追击前进，二师和干部团未费一弹智取了黔北重镇遵义城。随后红军主力入城。为维持城市秩序，执行和宣传党的政策，三军团立即将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署的为进遵义城颁发的口号和八项注意下达连队，要求指战员严格遵照执行。口号是：红军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创建川、黔、滇新苏区；打倒无恶不作的王家烈；消灭卖国贼蒋介石的主力；消灭警察队和民团；消灭一切苛捐杂税。八项注意是：整齐武装、服装；不掉队伍；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到宿营地后，外出要请假；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不乱买东西；无事不进群众家去；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同时，彭德怀于懒板凳（即南白镇）军团部就三军团行动致电中革军委，提出意见。他说：遵义地形不利敌守，必为我得，二师应乘胜取得桐梓，桐梓与綦江之间有三座大山，利我集中主力钳制川敌。我三军团以六师控制尚嵇场，警戒茶山关、桃子台、南木渡；四师到遵义附近；五师扼制镇南关。还指出：现在赤水、习水、仁怀等县旱灾严重，群众无法生活，对我扩红很有利。

此间，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决议精神，三军团各部于所在各地发动群众，着手帮助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游击队，从而开辟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新根据地。

一月十五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和杨尚昆从前线一起赶到遵义参加会议，同住在会址（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住宅）堂房的楼下。这是彭德怀入党、率部举行平江起义、参加红军后，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他非常激动，深感任重而道远，决心为把革命战争引向彻底胜利而奋斗。

会议期间，彭德怀经毛泽东介绍认识了刘少奇。毛泽东说：“这是刘少奇同志，很早的党员，中央委员，党内著名的工运领袖。”

彭德怀对这次能够见到在党内深受爱戴的刘少奇感到由衷的高兴。

与会期间，彭德怀态度明确，旗帜鲜明，严肃地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和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他衷心拥护和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会议正在进行中，三军团六师在遵义城南刀耙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敌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敌机轰炸，形势十分急迫。彭德怀遂即中途离席奔回刀耙水前线军团司令部，亲自指挥战斗。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指挥权，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总结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突围中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一致同意改变黎平会议通过的以遵义为中心创建川黔边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并作出在川、黔、滇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

的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会议还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常委分工，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不久，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活动。这次会议的最大功绩：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亲到三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当彭德怀得知会议最后决定撤换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毛泽东负责军委工作，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等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完全拥护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寻求有利战机粉碎“围剿”，在川、黔、滇地区创建新根据地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取得密切联系，以求得全国红军互相配合，一致行动等的决定。

当时，彭德怀和党内、红军内许多同志一样，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毛泽东能够担任党的总书记，领导全党、全军战胜敌人，扭转战局，争取革命胜利。

争夺娄山关，二占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彭德怀从遵义赶到前线，遵照军委指示，命令四师留在刀耙水以北地区迟阻正面敌人，亲率三军团主力迅速转至懒板凳地区集中。十八日，黔敌

松辉章部六个团的兵力，在飞机轰炸配合下向懒板凳、黄泥堡一带发动猛烈进攻，鉴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彭德怀当即决断三军团主力从懒板凳向遵义撤去。

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期间，敌情已经发生变化。蒋介石纠集嫡系中央军和湘、川、滇等省敌军百余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逼近包围：薛岳兵团周浑元、吴奇伟部八个师已进入黔境，经三穗、施秉、黄平向贵阳推进，先头部队进至乌江南岸；湘军刘建绪兵团四个师开到湘东，沿乌江东岸布防；川军以潘文华为总指挥率十二个旅向川南集中，先头部队已抵川黔边界；滇军以参谋长孙渡为行营主任率三个旅开到黔西威宁、毕节；桂军廖磊率三个师也进抵黔南榕江、独山地区；黔军王家烈的三个师也一并向遵义急进。敌企图力阻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与二、六军团靠拢，计划在乌江西北、长江以南的川黔地区围歼红军。

在重敌云集，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形势下，若按原计划在黔北地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已不可能。而且红军必须及早摆脱众敌的围追堵截，跳出合围圈，才能夺得战略上的主动。所以中央、中革军委于十九日果断地决定主动放弃遵义，分三路纵队向习水、赤水方面进发。三军团（缺四师）任左路纵队，经仁怀向赤水方面前进。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顺利撤离遵义，彭德怀命四师任后卫，迟阻从懒板凳向遵义进攻的黔敌。在他的命令下，

四师于遵义城垣周围构筑防御工事和警戒阵地，伪装拟长期防守遵义，以迷惑和迟滞敌人。当日十四时，黔敌六个团向遵义发动进攻，四师给敌先头部队以打击后，遂即撤出战斗，开往仁怀大道，跟主力前进。

一月二十日，红军总司令部在四渡水颁发《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目前作战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执行这一基本方针，还指出：中央红军应向西北经土城，渡赤水，乘机迅速北渡长江，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的黔、川敌人，并摆脱尾追与侧击之敌。不得过江时，红军进入川南，待机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过长江。争取在蒋介石嫡系军队未入川以前，三个方面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川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

为了猛追并消灭黔敌侯之担部，迅速占领土城、赤水，一月二十三日，朱德总司令命：一军团应占领习水，一师由东皇店向土城警戒，如土城为侯敌残部，应消灭该敌，占领土城。如土城确有川敌在二团左右，一师应候三军团五师到，于二十五日晨协同消灭该敌，统归彭、杨指挥。三军团应进至东皇店及其以西地域向临江场及二郎坝两方面警戒，五师应向土城靠近，以便策应一师。

中革军委十分重视攻打土城。土城位于黔西北，赤水

河北岸，黔川公路从城东北通过。中央认为夺取土城，对于实现中央“赤化四川”的战略计划具有关键意义，而且这是遵义会议以后的第一仗，关系到全军的士气。为了打好这仗，中央特派吴亮平到三军团协助作动员鼓动工作。战前，三军团召开了干部会议，说明攻占土城的重要意义，号召指挥员以模范行动率领红军战士打好这一仗。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军团一师向土城攻击前进，与土城守敌黔军侯之担部发生战斗，仅接触半小时，敌主力便向古蔺方向溃去，一小部退往赤水。一师主力向赤水方向追击。随后，一军团开进土城地区，三军团在后面跟进。

这时，川军根据蒋介石命令，封锁长江，同时进入黔境，自赤水、习水、温水分进合击。章安中旅先头团到达赤水对岸，郭勋祺师攻占习水县城，正向土城逼进。为了迅速、果断消灭川敌，给北上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五军团进入土城阵地。彭德怀携参谋人员首先观察了土城周围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为山谷地带，可以利用山谷，合围夹击歼灭敌人。遂作了具体部署：五军团主力在石羔嘴、水石坝地域吸引当面之敌，再一部坚守青杠坡，三军团四师占领该地南端高地，余部秘密集结该地两侧，准备总攻。一、九军团则分别对赤水、习水方面警戒打援。

战斗在一月二十七日打响，川敌郭勋祺部由三元坝、风树坝尾追五军团，于当日下午抢占土城北面青杠坡和石

羔嘴东南端，截断五军团在凤凰嘴与四师十一团对峙。为发动总攻，坚决消灭该敌，彭德怀于当日二十时下达命令：三军团五师于二十八日晨向青杠坡敌右侧突击，一部向石羔嘴以东高地突击；四师以一小部钳制凤凰嘴之敌，主力由鼎新场北端向青杠坡背后迅猛突击，五军团附三军团教导营于现阵地协同三军团向石羔嘴以东青杠坡突击，再一部向敌外翼包围。二十八日，彭德怀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向敌发起总攻，战果没有扩展。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激烈，红军在石羔嘴、凤凰嘴、青杠坡与敌反复争夺，冲锋达十数次，红军遭受很大伤亡。敌步步向土城镇进逼，若顶不住敌人，背水作战，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时，干部团参加了战斗，连续反击，郭敌虽受重创，仍固守阵地。这时，川敌廖泽旅亦开到习水，正向土城驰援；穆（肃中）、达（凤岗）、章（安平）三个旅也在向土城靠拢，妄图合围红军。

为突破敌人合围，红军总司令部于一月二十九日晨，命令停止攻击，各部立即与敌脱离接触，西渡赤水河，分三路纵队向古蔺方面南进。一军团、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猿猴渡河；军委纵队、干部团、五师为中央纵队由土城下游浮桥过河，向角子头、塘头场前进；三军团（缺五师）、五军团为左纵队由土城上游浮桥过河，向太平渡前进。彭德怀、杨尚昆根据军委指示，命令三、五军团各部迅速撤出战斗。四师十一团在土城东南赤水河岸构筑简单

工事，架设浮桥，并担任后卫，掩护左路纵队渡过赤水河。随后，迅将浮桥焚毁，跟主力南进。

从土城撤出后的第九天，三军团在天堂坝附近又与川敌郭勋祺部遭遇，彭德怀亲自指挥，向敌人发动进攻。经数小时战斗，敌被击溃，逃跑。

土城战斗虽然失利，未能赢得过江的机会，但这次战斗却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阻止了敌人的追击，为红军转至扎西整训和回师遵义奠定了基础。因此，土城之战仍有其一定的意义。

二月十六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指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布防、拦阻，更由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愿因地区问题牺牲红军有生力量，所以停止向川北发展，决定在滇黔川三省地区中创建根据地。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短暂休整和缩编后，即出敌不意，从扎西回师古蔺以南地区，二渡赤水河，向黔北地区进发。

三军团在扎西缩编，取消了师的番号，按新编制军团直辖四个团，为十团、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为了夺取迅速渡过赤水河东岸的先机，十四日，彭德怀放弃袭击古蔺城，率部急向太平渡出发。十七日，彭德怀命十三团团长沙雪枫、政委李干辉指挥十三团、十团侦察顺江场至太平渡的渡河点及道路，对二郎滩、仁怀方面警戒；十二团团长沙嵩、政委钟赤兵指挥十二团及教导营对太平渡

顺江场警戒，封锁消息，并侦察顺江场、太平渡上游的渡河点。十九日，派出一支先遣队先到二郎滩顺江场渡口，急速架设浮桥，并担任向仁怀警戒的任务。当日晚，彭德怀亲率三军团主力渡过赤水河。一军团、五军团、九军团、军委也先后于太平渡涉过赤水，向东急进。

为攻取桐梓，并防遭遇黔敌和受其侧击、截击，中央红军分两路纵队前进。三军团为右纵队，由临江、回龙场经沙坝场、兴隆场向桐梓西南地区前进；一、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经东皇殿、图书坝等地区向桐梓西北地区前进。二月二十三日，彭德怀根据黔敌何知重、侯之担部配合川敌攻占土城并向红军尾追，而桐梓、遵义的黔敌又有向红军迎击的动向，对三军团各部行动，作了具体部署：十三团为先遣队，经花图坝进到花秋坝，对桐梓和李子关警戒；十团、十一团为右翼队，由张宗逊、黄克诚统一指挥；十二团及军团直属队为左翼队，派前卫营进至九岭岗，再派侦察部队逼近桐梓城。二十四日，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城，三军团跟进桐梓附近地区。这时尾追而来的敌军由土城林滩过河，被五军团阻住；另部敌军由太平渡过河，为九军团拦截。

二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在关于中央红军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城的指示中决定：以一部红军阻滞四川追敌，集中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决定此次战役一、三军团和干部团统归彭德

怀、杨尚昆指挥。翌日拂晓，一、三军团在彭、杨指挥下发起进攻，一军团从长岗、大银厂出发向点灯山进攻；三军团除以十三团作正面钳制外，主力应由洗脚溪、赵家湾、石笋向黑神庙、七层岩攻击，干部团作预备队。彭德怀命令三军团跑步向娄山关疾进，抢占有利地形，以取得有利态势，歼灭敌人。

娄山关位于大娄山脉的主峰，海拔一千四百多公尺，四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娄山关北接桐梓县，南临遵义城，在群山中，只有一条险要环山公路贯通川、黔两省，为川、黔两省交通来往的孔道，黔北的门户，素以军事要隘闻名，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红军只有拿下娄山关，才能进占遵义城，实现赤化黔北的计划。战前，三军团作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广大指战员认识到此役关系到红军能否立足黔北的关键，所以士气高涨，斗志昂扬。

娄山关守敌为黔军柏辉章师杜肇华旅。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三军团先头部队十三团靠近娄山关红花园，战斗打响。敌人仓惶应战，且战且退，最后退守到关口，抢占了关口东侧的制高点——点灯山。红军猛烈进攻，激战终日，不克。彭德怀命令十、十一、十二团同时投入战斗。其部署是：十二团、十三团担任主攻，从正面攻击，力求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十团、十一团从东面迂回板桥之敌，以断敌后路，阻其增援，配合十二团、十三团围歼敌

人。二十六日，大雾迷漫，十三团在关上继续与敌争夺点灯山；十二团在关下两山间沟底公路上与敌军酣战。红军一鼓作气攻下点灯山，敌人疯狂向红军反扑，一度把点灯山夺回。为夺回此制高点，红军又一次发起强攻，在点灯山一带上、下山梁上，与敌开展了异常激烈、反复争夺的肉搏战。在十团、十一团的配合下，于当日，十三团再次攻下点灯山，占领娄山关关口；十二团在沟底也给敌人以重创，将敌压了下去。在与敌冲杀中，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负伤。这时，敌人发觉红军十一团、十团的迂回活动，见势不妙，被迫撤兵向黑神庙方向逃跑。至此，三军团完全控制了黔北门户娄山关，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

一军团以一部占领炭关后，主力亦向南进发。五、九军团在温水、习水一带迟阻川敌。使该敌于二月二十九日以前不能逼近桐梓，从而配合了一、三军团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

攻占娄山关后，彭德怀奉中革军委关于乘胜夺取遵义的命令，指挥一、三军团沿溃敌撤退之路跟踪追击，以消灭黔敌和打击增援的吴奇伟部韩（汉英）、唐（云山）二敌。

二月二十七日，彭德怀根据黔敌溃败，向南逃跑，薛岳援遵义各部尚未赶来，红军乘胜追击，士气高昂的情况，于泗渡站军团部下达攻打遵义的行动部署：三军团于三时由泗渡站下坝之线出发，沿马路前进，直逼遵义城。如敌顽守，

十一团、十团、十二团由城东北分向新、老城攻击；十三团集结在老城西北，对牛蹄塘、毛石坎方向警戒；十一团以一部占领老城南端之红花岗、碧云峰，并向鸭溪场方向警戒。一军团集结主力打击增援之敌，尾三军团进至遵义城东南水师坝，必要时以一部由新城东门协同三军团攻城，对懒板凳及湄潭方向警戒。如遵义城得手后，三军团的十一团在红花岗、碧云峰及以西高地布置阵地，十三团向毛石坎方向警戒，准备突击由懒板凳或鸭溪来敌的左侧翼；一军团主力仍在水师坝及以东地区，准备突击由懒板凳及鸭溪来敌的右侧翼。

三军团各部遵照彭德怀命令继续追击敌人，直向遵义城逼进。距离遵义城约十里路的董公寺有敌人驻守，前卫十一团与敌打响，经过一阵激战，后面部队赶到，十三团从右翼迂回过来，配合十一团，攻下董公寺。溃敌退往遵义城，三军团各部疾追至城边。

这时，彭德怀在遵义城外山地上，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四周的地形。恰在这时，有一侦察员跑来报告：从敌人的长途电话中听到王家烈向吴奇伟说，“共‘匪’已逼到城下，我们守不住了”。吴回答说：“你必须死守，今晚以后我一定赶到。”彭德怀得知这个情报后，立即下令，务必在当晚夺下遵义城。遵义城有新城和老城，新城在东，没有城墙，老城在西有城墙。一军团进入新城，黔敌从南门退却，三军团攻打老城，在观察地形、敌情时，军

团参谋长邓萍不幸中弹牺牲。

彭德怀得知此不幸消息，十分悲伤，流下了热泪，痛惜失去了这位从平江起义同他朝夕相与、并肩征战的战友，英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

遵义老城有两套城墙，不易攻克。十一团迂回到城北，抢占了老鸦山制高点，居高临下，用火力控制了老城，守敌弃城逃跑，残敌被红军消灭。二十七日晚，红军攻占老城，第二次解放遵义城。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薛敌吴奇伟部韩（汉英）、唐（云山）两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向遵义南门外老鸭山之红花岗、碧云峰发动猛烈进攻。蒋介石调中央军增援，本在预料之中，但未估计到此敌来得如此迅速。三军团主力在城西老鸭山与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打得十分艰苦，在坚守老鸭山战斗中，十三团参谋长钟伟剑牺牲。三军团从侧翼突击，给敌人以急速而猛烈的打击，干部团也参加了战斗，经数小时激战，将敌击败，溃敌向鸭溪方面撤去；一军团从左翼出击，一举突进敌人指挥所，在两面夹击下，敌全线崩溃，急向乌江方面溃逃。一军团尾追不放，一直追到乌江北岸，一部敌人逃过江去，大部被歼。至此，中央红军连克桐梓、遵义两城，击溃黔军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俘敌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给蒋介石的追剿部队以严重打击，为中央红军西进北上争取了主动。

遵义大捷后，彭德怀于三月二日以极其沉重的心情，给中革军委写了关于三军团部队编制的报告。他说：三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鸦山诸战役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四个团的编制。还说：第十团、十一团团团长负伤；营长伤亡八人，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到，三军团在夺取娄山关、二占遵义城的战役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不久，中革军委即派红军名将叶剑英到三军团任军团参谋长。

出席会理会议

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慌忙飞抵重庆，亲自出马“督剿”，急调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纵队进到鲁班场，吴奇伟纵队进到枫香坝；黔军王家烈部进到泮水、打鼓新场地区；川军和其他黔军进抵遵义以北地区，妄图一举将红军围歼在遵义、鸭溪狭窄地带。中革军委决定于遵义、仁怀之间寻求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扩大战果，以粉碎蒋介石军队的新围攻。中央红军向平桥、鲁班场黔敌和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后，出敌不意，突然挥

戈北上。三月十六日经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深恐红军渡江，急调重兵阻截。中央红军又神速回师东进，返回黔省。三月二十一日，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调头南下，将众敌远远甩在赤水河两岸。彭德怀于三月二十日向军委提出了在运动中歼敌的建议。他说，应以一部向西急进至扎西地区，以迷引滇敌；其余各部继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吸引川敌向古永移动，然后脱离该敌，速往赤水河掌握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渡过赤水河，从毕节以东打回到黔西、大方；再寻战机，打击王家烈和周（浑元）吴（奇伟）二部。同时提出，目前红军应“避免与相等兵力决战”，一定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更不要“攻坚、乱碰”。这项建议虽未具体指出应立即回渡赤水，甩掉敌人，但却体现了彭德怀善于在敌情十分复杂的形势中综观战局，灵活转移兵力和变换战术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提出的机动灵活，集中优势兵力，争取主动，以少胜多的主张，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中央红军把众敌甩在赤水河两岸，急速南进至遵（义）、仁（怀）公路北侧，以九军团牵制敌人，主力穿过鸭溪、枫香坝敌人的封锁线，南渡乌江。为了实现向云南进军，从金沙江北渡长江入川的战略目标，中央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派一部向瓮安、黄平方向佯动，作出东进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而主力则通过息烽、

扎佐，以脱离敌人，向东南机动。四月三日，三军团为右纵队，分两路从宋家渡、苦竹塘渡河，进到贵阳地区。这时，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企图以三路纵队堵截红军。其具体部署：湘敌李抱冰从正面布防，截阻红军东出；中央军周浑元部在石洞、扎佐设防，吴奇伟部欧（震）、梁（华盛）两师尾随追击；桂敌到马场坪防守；黔敌何知重师进到对门寨；滇军出援贵阳保驾。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方面开进。

为阻滞蒋介石向贵阳纠集之敌，控制西进道路，彭德怀和杨尚昆奉军委命令指挥三军团以一个团在黎儿关向贵阳作佯攻，主力经高坡坝向青岩地区开进，在贵阳附近掩护中央纵队通过。继而一军团也从龙里挤到右路，路窄人多，簇拥前进，其它部队也从这里通过。三军团掩护各部通过贵阳，同敌苦战三昼夜，终于战胜了长途行军的疲劳、给养不足、大量减员和在众敌包围中穿来穿去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中央红军从贵阳、龙里之间，穿过湘黔公路，南下后向西疾进，相继攻下贵州省惠水、长顺。彭德怀和杨尚昆于四月十三日向军委提出了关于红军目前行动的建议。他们指出：北盘江两岸石山耸立，居民多为苗族，地形和环境对我作战不利。因此应乘敌未到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占平彝、盘县，向滇急进，打击滇军，这样可使我机动区域更大，也能争取时间，争取群众。这是一项正确的建

议。四月十七日，中央红军跨过北盘江，乘滇军东调境内空虚，突进云南，连取沾益、曲靖、白水数城，直逼昆明，在其附近虚晃一枪，即向西北迅速前进，直奔金沙江。

金沙江奔流在川藏边境，进云南省境急转北下，谷深水急，两岸悬崖飞瀑，地形险要。红军如不能迅速过江，有被敌人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中革军委四月二十九日果断地作出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红军已取得西进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现在已有实现红军进入川西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为实现军委的战略部署，中央红军分三路向金沙江急进。三军团为右路纵队，分两路向禄劝以北地区前进。四月三十日，经思力坝、马鹿塘，抢占洪门渡，但因江水流速湍急，无法架桥，抢渡未成功。此时，中路纵队先遣队干部团在刘伯承参谋长的指挥下，于绞平渡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守敌和前来增援的川敌，完全控制了渡口。五月五日，彭德怀奉命除留十三团在洪门渡渡江外，率三军团赶往绞平渡渡江，至九日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国民党蒋介石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把敌人抛在金沙江以南，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阴谋，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抢渡金沙江胜利后，为扼阻追敌，打击出援敌人，争取红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后，得到必要的休息和补充，中革军委决定攻打会理。

会理城地处四川省最南部，金沙江北岸，三面临接云南，交通闭塞。该城有内、外两个城，内城大，外城小，城墙完整，厚而高，四面有城门，城上筑有城门楼，利守不易攻。五月八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我军渡江后摸清会理敌情的指示》，部署：三军团和干部团主攻会理城，消灭守敌刘元塘；一、三军团主力由金爪塘开往塘官窑、石头河地区；干部团由通安开往张冠冲，统受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各兵团今日到达指定地点后，迅速弄清会理敌情，加强两侧警戒，准备好攻城器具。

彭德怀和杨尚昆根据军委指示，对会理地势、守敌情况作了分析研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拟定攻城作战计划。与会者一致认为，会理城垣虽小，但不易接近，何况没有炮火掩护，就是步枪子弹每人也只有几发，因此，攻城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坑道爆破。当日，彭德怀将会理环城敌军布置的情况上报军委，他说：守会理敌军先有四个营，一手枪营，四、五两日陆续由西昌增加两个营，加上民团共有三千人，机枪六挺，迫击炮三门，城内大小碉堡二十余个。顷获刘元璋旅将于十日赶到会理增援的消息。据此，决定明日（九日）各部进至下列位置，做好攻城的准备：三军团主力进到城东、南两面（十三团本日黄昏逼

城侦察，相机袭城)；干部团九日上午进到城南适当位置作攻城第二梯队；十一团取隐蔽小道到城北十五里处适当地点，断绝会理、西昌间一切交通，并派出一部前往西昌三十里处游击侦察；其余各部立即进行扒城准备。

五月九日，三军团开始围攻会理城。守敌刘元塘纵火焚烧城南大片民房，为坑道作业带来许多不便。于是，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三军团战士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奋战五昼夜，完成了坑道作业。十四晚，爆破会理城，但只将城东北角炸塌，敌人用数挺机枪，交叉射击，阻红军于城下。一军团集结在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打击从西昌来援之敌。

五月十二日，彭德怀出席党中央在会理城外铁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以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纠正当时在红军内部存在的一种由于对毛泽东战略意图不理解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为摆脱敌军的重重包围，实现战略转移，指挥中央红军与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频繁战斗和大踏步的转移。这些军事行动，使红军指战员感到极端疲惫，因而对中央领导产生某些消极埋怨情绪。这种思想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也妨碍红军的团结。特别是当林彪利用红军指战员的这种情绪，给中革军委写信，竟然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的

领导职务，使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因此，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认识，解决这个问题。

会议批评了林彪的严重错误，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是不行的，应当解除指挥权，让彭德怀指挥一方面军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还在会议以前，就背着中央搞非组织活动，但遭到彭德怀的拒绝。林彪在一次电话中对彭德怀说：

“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是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截，后面追兵又要赶上，只在这一块狭小地区，是很不利的。”

“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正是当年石达开走过的，孔明渡泸深入不毛之地走的也是这条路。但我们和孔明不同，他渡泸南征是为了镇压少数民族，我们北上是为了革命。今天困难虽多，但历史不会重演。”彭德怀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林彪消极悲观思想。

“我军不能在此久停。”“请你指挥迅速北进吧！”林彪仍然坚持他的观点。

“我怎么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彭德怀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林彪的挑拨离间。

会议还根据刘少奇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与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反映的意见，批评彭德怀的

意见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和右倾情绪的反映”。指责他在电报上不署名，是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刘少奇的电报反映了彭德怀同他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对于会议的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他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遂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习水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并表示：“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他还明确地批评了林彪的信，指出：“这封信是错误的，遵义会议才改换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领导是不妥当的，尤其提我来指挥更不恰当，我也不能胜任。”同时，他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又重提此事，林彪在一次常委会上声明：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是在彭德怀不知道的情况下写的。

关于刘少奇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问题，彭德怀向刘少奇反映指战员情绪和自己对中央军委指挥的意见和建议，是完全正常的。至于彭德怀未署名，只有刘少奇和杨尚昆签名，则因为彭德怀对电报的内容不尽同意，而且考虑到他过去提过两次带有战略性的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非出于隐

瞒自己的观点，这同样是无可非议的。

这次会议主要是林彪挑起的，但却严厉地批评了未参与林彪活动的彭德怀。彭德怀顾全大局，严格要求自己，检查和批判了自己的错误，从而维护和增加了党的团结。但这次会议通过批判林彪的信，通过批判刘少奇的电报所反映的问题，纠正了当时在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的对中央领导的某些怀疑和埋怨情绪，加深了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领会，从而统一了全军的思想 and 行动，保证了长征这一伟大的战略转移的胜利。

同张国焘的斗争

根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苏区的战略方针，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分两路直向大渡河前进，途中占领了冕宁、越嶲（今越西）两县，打击了川敌，为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五月二十四日晚，一军团先头部队占领了大渡河南岸安顺场。翌日，强行渡河成功，但因水流湍急，缺少船只，红军不能迅速渡河。于是军委决定以一部红军继续由安顺场渡河，然后沿左岸前进，主力红军由右岸北进，两路同时夹河而上，直取泸定桥。五月二十九日，一军团二师四团攻占泸定桥，继克泸定县，保证了红军得以迅速渡河。三军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撤离会理，跟主力北进，三十一日飞渡泸定桥，至六月二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天险大渡河。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进，击溃在天全河堵截的杨森部，攻占了天全、宝兴、芦花。接着，翻越了长征经过的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道路险阻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六月十二日，一军团二师占领懋功，先头部队四团在达维附近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会师。十六日，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这时，彭德怀率三军团于先头部队之后也到达懋功地区。为解决红军给养问题，三军团于老营至达维一带筹粮。此间，张国焘派他的秘书黄超来达维看望彭德怀，还带来几斤牛肉干，少许大米和二、三百块银元。黄超表示：

“这地方给养困难，张主席（张国焘）派我来看你，表示慰问。”他接着问：

“会理会议情况怎样？”

“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彭德怀觉察到问得有些奇怪，张国焘怎么知道会理会议的？

“张主席很了解你。”

“我们没有见过面。”

“张主席认为，当前的战略方针应当是欲北伐必先南征。”

“那是孔明用来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我们一不是孔明，二无后方，怎么能采用呢？”

黄超接着说明北伐怎样不利，马家骑兵如何厉害，等

等。

这位不速之客，言语诡谲，使彭德怀感到“来意非善”，引起了对张国焘的警惕。

两大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万多。这时党中央根据全国的政治形势和红军所处战略地位，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根据这一决策，六月十六日军委致电四方面军，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计划，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但张国焘反对向北发展的方针，于六月十七日，给军委回电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并提出了“集中主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的退却方针。

为了统一思想，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央于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就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作战指挥问题作了报告。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而创建的。他主张集中兵力迅速攻打松潘，消灭敌胡宗南部，继续北上，同时强调红军需要统一指挥。其他与会者，也都一一发言。彭德怀同意周恩来关于战略方针等问题的报告和毛泽东重要发言的正确主张，他说：中央决定的

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向北向东进，遇到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嫡系，在战术上须根据情况临时决定。他批评了张国焘的右倾退却逃跑的错误主张。

会议于六月二十八日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还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同时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向川、康发展的错误方针。最后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

六月二十九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拟定《松潘战役计划》，要求坚决消灭胡敌，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规定两个方面军分别从黑水、芦花、懋功等地向北开进。

正当松潘战役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张国焘又起来反对中央的方针。六月二十九日，他致电中央，反对北上，还借口“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有意拖延北上的时间。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北上的时间已被延误，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敌胡宗南主力已集结于松潘，薛岳部也进抵文县、平武与胡宗南相策应。这样，不仅松潘战役计划流产，而且红军也处于危险境地。

七月八日，彭德怀奉军委命令，率三军团抵达黑水芦花。九日，率主力两个团前往石碉楼配合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所率的五个团夹攻石碉楼。他命令一部携带工兵和炸药，前去准备爆炸；另两个团以一部接三十军八十九师的二六五团担负的从康猫寺至芦花一线沿途的警戒任务，并负责修补道路，看守桥梁；再以一部留在芦花守卫和维护芦花至石碉楼的交通。十四日，彭德怀率三军团沿黑水河右岸南下到维古，主力十团首先过河与四方面军二七九团夹攻麻窝。二七四团在维古对岸协助三军团选择架桥点和架桥，以便从大村子打出麻窝，开辟黑水河左岸大路。

七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军，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

中革军委为执行北上抗日方针，依据当时的敌情变化，八月三日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要求红军迅速占领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右侧背，以期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人，形成在甘南广大地区的有利局势。

为实现夏洮战役计划，军委于八月十一日命令左右两路军分别北进。左路军（有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从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有一方面军的一军、

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前进。在人迹罕见的茫茫大草原上,整整行军了七昼夜,历尽了千辛万苦,战胜了各种困难,终于在八月二十七日进到班佑、巴西地区。途中在包座歼灭了堵截红军的胡宗南的四十九师,前卫部队一军继续向俄界地区前进;后卫部队三军比右路军其他各部晚三天到达巴西地区,宿营在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住地的附近。

这时,三军政治委员杨尚昆调军委任职,李富春接任三军政治委员。

九月二日上午,彭德怀在前敌总指挥部觉察到陈昌浩说话的语气、腔调与前不同,陈公开散布反对北上的言论,说什么阿坝地区比通、南、巴好得多等,更加引起警惕。彭德怀当即命令杨勇任团长的第十团负责暗中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旋即得知张国焘企图将红军南调和危害党中央的情报,彭德怀觉得事态极其严重。这时,前卫部队一军已进到俄界地区,只有三军几个团的兵力驻扎在巴西。而中央领导同志又都住在前敌总指挥部那里,如果张国焘强行解散三军,毛泽东等同志的安全无法保证,就会危及中国革命的前途。于是,他亲自前往毛泽东的住处请示办法。

“如果四方面军用武力解散我们,或挟持中央南进时,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好呢?”

“在他们用武力解散我们的时候，我们从防御出发，可不可以扣押人质？这样可以避免武装冲突。”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不可。”

但怎样才能使毛泽东等得以离开前敌总指挥部，从而摆脱张国焘的羁绊呢？于是，毛泽东亲自到陈昌浩住处，提议军队即要行动，中央应召开一次会议，作些部署，说周（恩来）、王（稼祥）病重（住在三军司令部）不能前来参加，我们是否到三军司令部去开会？陈等表示：同意。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才得以离开前敌总指挥部。

九月二日晚，党中央在川北巴西三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何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出席了会议。为使中央领导同志尽快脱险，避免出现不幸和冲突，毛泽东在会议上仅就一方面军工作方针作了报告，回避了其他有关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他说：自八月五日政治局会议后，一方面军的工作主要是整顿部队，由于长途行军的疲劳、衰弱，还需要相当时间的“整顿”、“休息”；并着重说明当前一、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统一行动的重要意义。在讨论工作方针时，彭德怀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个部队的团结、休整、教育以及党的纪律等问题作了发言。他说：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各军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彼此应互相学习。他还说：一、三军在黑水芦

花驻扎时期得到四方面军的帮助，补充了一些人，有些进步。但体力仍然很差，所以现在恢复身体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会议结束后，党中央决定立即率三军先行北上，向俄界进发。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后和十团一起行军，彭问：

“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毛泽东这种坚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相信群众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在这时，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突然带一些人赶到，态度十分蛮横，甚至指着鼻子谩骂。彭德怀十分恼火，大声命令：“把他捆起来。”毛泽东制止了这一行动，诚挚地同志式地向李特说明党中央先率部北上的目的意义，并放他回去。

陈昌浩还企图争取彭德怀支持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送来亲笔信，希望三军停止北进。彭德怀经向毛泽东请示，给陈昌浩写了复信，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指责陈执行南下逃跑方针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希望他能改正错误，并言明“后会有期”。陈昌浩不接受劝告继续执行张国焘南逃方针，还要派兵追击一方面军，就在这关键时刻，徐向前阻拦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迫使陈昌浩放弃了原主张，拉着队伍南进了。

党中央为争取、挽救张国焘，一再电令他率左路军向

北开进，靠拢右路军。九月九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北上，晓之以理，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中央的“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接着于九月十一日，中央再一次电令张国焘即行北上，严肃地指出：“为贯彻中央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但张国焘仍顽固地违抗党中央的指示，继续坚持南下逃跑方针。

彭德怀、李富春于九月十日致电林彪、聂荣臻，通报张国焘违背中央战略方针，已经擅令左路军南退，中央率三军全部和军委纵队单独北进，于今日开抵拿界，明日到俄界。

九月十二日，党中央于川甘边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及与张国焘争论的报告，明确指出：红军今后总的战略方针是北进，但目前党中央只率一、三军单独北上，力量不够，可以考虑首先打到甘东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得到国际帮助，整顿、休养，扩大红军，创建根据地。还点名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指出目前还是党内斗争，现在不一定就作组织结论，还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接着，彭德怀作了关于军队组织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根据目前实际状况和战略任务，军队的编制需要改变，因为战斗人员减少，团下不能设营，只能直辖四个步兵连。在

进攻战术上，一个团必须绝对能对付敌人一个营；在战略防御上，一个团必须保证对付敌人一个团，有这两个特点，既能使政治工作加强，也能保存团的基础。他还指出：为了加强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必须缩编上层机关人员，以充实基层战斗单位，继续战斗。这个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红军整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从而保证了红军的战斗力，对继续北上，胜利到达陕北起了一定的作用。会议决定将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会议最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公开对抗中央的指示，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的统一。

俄界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从实际出发，适时地改变了战略行动方针，整编了红军，作出对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他犯错误的事实及犯错误的历史根源，表明了党的原则立场，从而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任陕甘支队司令员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率一方面军继续北上，渡过白龙江，沿江在残缺危险的栈道上前进，直奔腊

子口。腊子口（是两山相间的一条沟，约三、四里）位于甘南，是四川通往甘肃的要口，两边全是悬崖峭壁，形势险要，只有左边一条路直通岷州城（即岷县），敌鲁大昌部为了守住甘南和岷州的天然屏障腊子口，在此口筑有碉堡，派兵把守。九月十七日，一军先头部队夺占了腊子口，翻越岷山，共击溃鲁大昌第五团两营及另两个团各一个营，十八日占领哈达铺。同日，彭德怀同李富春等为继续争取左路军北上，实现中央战略方针，致电左路军负责人。电报说：右路军在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连日击溃了敌鲁大昌部，缴获甚多，昨十七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此地物产丰富，汉回族各半，对红军十分热情。希望左路军能即刻北进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建陕甘宁根据地，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接着，彭德怀、叶剑英率军委纵队和三军亦进至哈达铺。哈达铺在岷县（即岷州）南几十里，是藏、汉族居住交界地区。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斗争，按照俄界会议关于部队组织问题的决定，中央纵队和一、三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主任朱瑞；第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李富春，参谋长肖劲光；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参谋长蔡树藩。整编后，红军在

哈达铺休整两天，从报纸上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于是，在这里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决定继续北上，前往陕北。

为了迷惑敌人，扬言陕甘支队东行，攻取天水。敌人信以为真，将主力集结于天水，以待迎击；同时占领渭水河北岸武山、漳县以防红军北上。陕甘支队为取得先机，于九月二十三日从哈达铺出发经荔川、闫井、向新寺前进，沿途得到群众的欢迎和帮助。从新寺经鸳鸯嘴于二十六日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进抵榜罗镇。在这里红军休整三天，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红军前去陕北，以陕北为抗日基地，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战争。在会议上，毛泽东、彭德怀等都讲了话，大意是：我们经过了雪山、草地，受了自有红军以来从未有过的辛苦；现在又突过天险腊子口，渡过渭河，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同那里的红军会合到抗日前线去战斗。同时，向全体指战员进行政治动员和抓紧物质准备，检查群众纪律，整顿军风纪。接着毛泽东、彭德怀率陕甘支队先行出发，继续北上，攻占通渭城，突破西（安）兰（州）大路封锁线，到达清江益、界石堡、高家铺之线。

十月五日，为打击尾追红军之敌毛炳文部和固原马洪宾的两团骑兵，彭德怀命令：二、三纵队经常家集、将台铺进到马连山；第一纵队主力在常家集掩护二、三纵队通过后，取平行道路进到马连山东南端十字路回击尾追之

敌；一纵队派一部向平凉、固原之间前进，诱敌主力追击，以便歼灭敌人。是日，以一纵队为右路，二、三纵队为左路，两路同时向北进发，而敌人始终在后面尾追。沿途且战且走，经过了回民区，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和平凉、固原之间公路的封锁线，在青石嘴歼灭数百敌人，缴获数百马匹，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在胜利的鼓舞下，翻越了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进到环县。十月十二日，红军分两路经环县西北地区前进：一纵队经苗家庄、真家湾、何连湾向洪德城以东地区前进；二、三纵队经张家大庄、毛家川、何连湾向洪德城东南地区前进。为早日进入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一纵队从木瓜城经铁边城、吊儿庄、田背之线向吴起镇前进；二、三纵队向金汤镇前进。十月十九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随后彭德怀率二、三纵队也进抵该地区。二十日，彭德怀离开二、三纵队驻地，前往吴起镇，与毛泽东等商议红军的行动方针。

红军刚到陕北吴起镇，尾追的敌骑兵又来进犯。为了打击敌人，不让敌人进入根据地，红军指战员奋起战斗，九月二十一日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实行回击。东北军白凤翔部来进犯的骑兵先头团已被红军打垮，残部调头向回猛跑逃命，敌另三个团也同时被击溃。红军经过此次战斗，结束了敌人的追剿。从此，吴起镇威名大震，敌人再也不敢来进犯了。

陕甘支队自哈达铺整编东进北上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彭德怀指挥红军渡过白龙江天堑，突破腊子口，通过数道封锁线，越过六盘山，打垮了尾追、堵截的邓宝珊和毛炳文部，战胜了马家骑兵，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进入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落脚点，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就在这时，毛泽东为了赞扬彭德怀的杰出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表彰他同敌人作战的英勇无畏精神，特致电赠诗一首：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

红一方面军长征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彭德怀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但是，在长征中红军指战员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种无坚不摧、无所畏惧的坚强斗志，将激励着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新长征中，发扬百折不挠的精神，为开创新局面和夺取新的更大胜利而奋斗。彭德怀同志和他领导的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对长征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为后代所传诵。彭德怀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高贵品质；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敢于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坚强的党性原则；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又善于灵活地结合实际执行党的命令的领导艺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科

学态度，充分地说明，他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永远是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彭德怀同志的业绩将永垂青史！

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 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

钱之光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前夕，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通称八路军办事处）奉命迁往重庆。经过两个月的旅途辗转，一九三九年初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并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办事处从成立到一九四六年迁往南京，共计七年多。这一段时间，是抗战时期我党同国民党进行复杂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重庆办事处是我军设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个公开的合法机关，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南方局对外不公开，它就设在办事处。办事处一方面直接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办交涉，处理有关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各项事务；另一方面也办理南方局交办的一切工作。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在这里工作过的同志，包括在南方局工作的同志，前后不下数百人，他们都表现出英勇顽强、团结奋斗的革命精神，为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办事处设在红岩的由来

还是在武汉期间，我们遵循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长期抗战的战略思想，为了加强大后方的工作，为撤出武汉作准备，已先派周怡、张玉琴同志到重庆筹建办事处，建立据点。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租用了机房街七十号作为办公用房，以“十八集团军重庆通讯处”名义开展活动，周怡同志任通讯处处长。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日军逼近武汉，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部分同志分水陆两路开始撤退。一路是溯江而上，经宜昌、万县；一路经长沙、衡阳、桂林、贵阳等地，先后到达了重庆。我是从陆路到达的。重庆办事处成立后，原通讯处即行撤销。办事处由我担任处长，周怡负责南方局的情报科工作，对外称办事处副处长。

机房街的房子不大，我们到重庆后因人员增多，又在棉花街三十号租了一所房子。但两处办公，诸多不便，南方局组成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并预防日本飞机轰炸时有个退路，就决定在重庆近郊寻觅地址，设立机关。经我党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同志介绍，由党员刘圣化陪同周怡找到了红岩咀大有农场的女主人刘太太（本名饶国模，刘圣化是她的小儿子）。她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树木多，四周住户很少，既便于党的工作，又

便于防空。她正准备在这里盖房子，于是我们以办事处的名义同她商量，由我们给她三千元，将原计划建筑的两层楼房加为三层，由她负责兴建，建好后我们住用三年，以后付房租。她当即应允。为了早日建成办公楼，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发扬延安挖窑洞的精神，积极参加劳动。到嘉陵江边抬木头、竹竿，拌泥浆，夯土墙，一边劳动，一边歌唱，不仅感动了建筑工人，也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一九三九年“五·三”、“五·四”，日本侵略者对重庆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整个山城变成一片火海。办事处机房街七十号、棉花街三十号和《新华日报》苍坪街、西三街的房屋都被炸毁，我们就都迁到了红岩。当时因房屋尚未建成，就在下面的嘉陵江畔搭了竹棚临时办公。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大家仍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工作。后来我回到机房街，还发现有一枚未爆炸的炸弹。在大轰炸的那几天，刘太太曾腾出一部分房屋给秦邦宪、何凯丰、董必武等几对夫妇居住，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住在她的柴草屋里。由于我们同刘太太的关系处得好，所以从当年夏天红岩办公楼基本建成后，我们一直住到一九四六年春。这就是红岩办事处的由来。

我们另外还有一处地方是曾家岩五十号。一九三八年冬，邓颖超同志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原先住在机房街七十号；周恩来同志到重庆后，他俩便一起搬到曾家岩渔

村居住。后来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也是用办事处的名义，租下了曾家岩五十号这所房子的一部分。这里三楼原先住的是“战地服务团”，二楼东边住的是国民党官员刘瑶章（刘解放后曾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他的眷属。“战地服务团”迁出后，他们住的那部分房子也由我们租用。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住在楼下一侧。因为周恩来同志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所以这里对外也称“周公馆”，实际上是南方局在市区的工作机关。南方局下设的党派组、文化组、军事组、外事组、妇女组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大都住在这里。另外，《新华日报》则设在化龙桥虎头岩。

在一九三九年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曾家岩的“周公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和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中心，从这里传出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贯彻了党中央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瞩目和希望的所在。

（二）第一次反共高潮到 “皖南事变”前后

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发动了一系列的诱降攻势，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对抗战前途也丧失了信心。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

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并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国民党在方针政策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由片面抗战转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九三九年六月，我新四军在湖南平江的留守处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袭击，参谋涂正坤、副官罗梓铭等惨遭杀害，制造了“平江惨案”。在这前后，还制造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等反共事件。到年底，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向边区进攻，占领了边区五个县；同时，阎锡山也在山西袭击抗日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四〇年三月，蒋介石又令朱怀冰、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向太行山进犯，矛头直接指向八路军总部。

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策，我党中央在“七·七”抗战两周年发表了时局宣言，响亮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和妥协投降的阴谋。同时，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对来犯者给予了坚决的回击，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这个时期，在后方，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了对我党活动的限制。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宣传部就下令取缔我《新华日报》在桂林、西安等地设立的分社；国民党重

庆市长贺国光并命令重庆市警察局、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邮电新闻检查局等单位，扣留我报纸的纸型。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派遣军、警、特在成都制造了所谓“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并乘机查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同志；不久，被捕的朱亚凡、洪希宗同志便惨遭杀害。五月份，何应钦又向国防最高会议报告，诬指邹韬奋、沙千里、沈钧儒等，将领导军委会政治部举办的綦江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的学生，在七月七日举行暴动。为此，蒋介石又令军警机关和各地党部严加防范。除派武装特务监视邹韬奋等人的住宅和行动外，在“战干团”教育长桂永清的指使下，“战干团”的特务分子还严刑拷打团内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被杀害和致伤的青年多达四百人，制造了血腥的“綦江战干团惨案”。

一九四〇年春，南方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同国民党谈判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问题。当时因胡宗南部侵占了边区的几个县，我们坚持边区必须为完整的二十三个县；同时谈判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的问题。这时周恩来同志不在重庆，由博古、叶剑英同志进行谈判。不久，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迫害日益加剧，于是又按中央指示，把谈判重点转移到全面停止磨擦方面。三月间，叶剑英同志在军委会召集的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就国民党顽固派

长期以来制造磨擦，调动大军包围边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发动反共高潮问题，发表了讲话。对反动派为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而制造的各种无耻谣言，进行了严辞驳斥，并要求国民党全面停止磨擦。与此同时，我们在重庆的工作机关，加强了翻印和发行延安出版的党报、党刊的工作。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等有关人员，并组织各方面力量，采取铅印，刻腊版等方式，翻印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的社论，《共产党人》、《军政杂志》等刊物上登载的重要文件、材料，通过秘密网点和各种方式进行散发，以打破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限制和封锁。使后方广大群众能了解我党的立场和方针政策，了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磨擦的真相。

在所谓成都的“抢米事件”发生后，因为反动派的分裂活动有增无已，党中央指示要在党内外作广泛深入的教育和动员，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调动和隐蔽干部。记得六月初，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回重庆不久，南方局在重庆办事处召集了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五月初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关于《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恩来同志在会上就国民党制造磨擦事件和我党应采取的方针、策略等问题作了报告。中央的指示，除要求东南局要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外，还指出：我党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方针，应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指出：“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

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南方局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实行转变，认真实行“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反对急性暴露。要求学生党员努力学好功课，争取优异成绩；在各部门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搞好本身的业务；所有党员要广交朋友，要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广泛地进入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军事等团体，能取得较高的社会职业更好，一切言论、行动要和本身的职业和地位相称。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任务（其后又加上“勤调查研究”，但习惯仍称“三勤”），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的领导下，以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上层与下层紧密配合的斗争方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当时我党中央为顾全大局，于十一月九日以朱、彭、叶、项（英）名义发出“佳电”，一面驳斥了他们反动荒谬的电令，声明长江以北不能撤退的理由；一面也答应将江南正规军队移到江北，并要求解决国共之间若干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包括实行民主政治，各党派一律平等，边区问题，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问题等等。但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坚持要我军执行“皓电”的“军令”，拒绝谈判，所以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月七日，架设在办事处三楼的电台，收到中央发来的新四军总部在北上途中被围的急电。当时周恩来同志万分愤慨，立即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并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刘为章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国共关系破裂，将由国民党负全部责任。以后，刘为章、张冲先后向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转告蒋介石的答复，说茂林方面不继续进攻，已要贺耀组下了命令。新四军北开，中央绝不留难，望继续北开。

我们虽已得到皖南发生事变的消息，但尚未对外正式宣布。一月十一日晚《新华日报》举行成立三周年纪念庆祝会，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负责同志，都在化龙桥报馆参加了这个纪念会。会上，周恩来同志接到中央转来新四军被围惨遭袭击、损失严重的告急电报，便把皖南发生事变的事告诉了大家，强烈谴责了反动派的罪行，并遥祝新四军能突破重围与黑暗。他还指示《新华日报》在次日报上报导他的讲话，把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的消息透露出去。接着又召集了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了斗争形势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要大家积极准备各种应变措施。

第二天，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就致电蒋介石、国民党中执委和中监委，谴责破坏团结抗战、积极“剿共”的分裂政策。希望蒋介石慎守孙中山先生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这个通电，是对我党的有力声援。

十三日晨，叶剑英同志同我一道，打电话给顾祝同，要他停止这场血腥暴行，但顾祝同没有接。同日周恩来同志动员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干部，大家出动，利用关系四出向国民党抗战派、元老派、各民主党派以及文化、新闻、外交、青年、妇女各界人士，揭露反动派的反共罪行。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了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当天，周恩来同志打电话给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

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在讲完“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句话以后，愤怒地摔下了电话筒。当晚周恩来同志又在红岩办事处召开了南方局、办事处工作人员大会，报告了“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况，指出当时时局发展的两种可能：一方面，因为亲日派反共，国共关系可能破裂；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损失了新四军一个军部，但新四军还有几万人，更有几十万八路军，我们还有力量。蒋介石要破裂，就要全面反共，全面投降，他要这么做，英美也不会同意，所以国民党要反共，又不敢全面反共。在我们方面，是既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又不希望两党关系破裂，我们争取继续合作抗日，还是有可能的。但蒋介石是个流氓，也可能全面破裂，就是不全面破裂，我们也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反动派如袭击我们，并不在乎我们这几个人，主要是要搞我们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等，因此必要时我们要进行适当的抵抗。但党给我们的任务，不是直接用枪杆子同国民党打，而是要我们在国民党心脏里起哨兵、尖兵的作用，了解敌情，宣传和组织群众。我们要坚守岗位，保守党的机密。如果国民党来了，我们争取时间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争取让蒋介石把我们送回延安，全师而归。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他又说，现在我们的工作更困难了，我们共产

党员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我们就要坚持工作。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疏散一部分同志，要留的坚决留，要走的坚决走。

这一次，周恩来同志从晚上九点多钟讲起，大约讲了两个多小时。讲完后就题了著名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当晚，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都很紧张，油印了许多传单；《新华日报》的同志也连夜排印有周恩来同志题词的报纸。十八日凌晨，报馆和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冲破国民党封锁，把报纸抢先送到山城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手中。南方局军事组的同志编印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第二天早上由我用皮箱提到曾家岩，再派人散发，有一部分传单还巧妙地直接送到国民党高级官员手中。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那些天，我们处在很紧张的状态，常常通宵达旦地清理和销毁文件，加强了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如增加了岗哨，机关内部安装了报警设备，有的同志还携带了武器。我们准备如遇敌人袭击，马上发出警报，便于进行必要的抵抗和及时销毁文件；如果他们只来少数人，我们也不打，找几个人同他们周旋。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继续领导华中、华东的九万多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的敌后抗战。

这时，国民党更加加紧了新闻封锁。国民党中央特种

会报对《新华日报》作出“只准印、不准卖”的规定。二月六日，曾家岩的宪兵连扣留了当天的《新华日报》。周恩来同志知道后非常气愤，亲往宪兵连交涉。张冲随即赶来，劝他回曾家岩五十号休息，交涉由他去办。周恩来同志表示，报纸不退还就不走。最后宪兵连被迫发还了报纸。恩来同志将发还的部分报纸，亲手散发给周围群众。这时，报童夺回了报纸，情绪激昂，于是叫卖《新华日报》的声音，顷刻便响遍了山城。

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南方局领导下，把在重庆工作的一些未公开身份但已暴露和半公开身份的党员撤回延安，或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把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左翼文化人士，也从重庆、桂林转移到香港、南洋，由我们资助旅费和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到香港、南洋后，是在我党南方工作委员会方方和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帮助他们联系和开展工作的。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还要我们撤消除重庆、西安两地以外的办事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贵阳警备部队封闭了我驻贵阳的交通站，逮捕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并没收了一切资财，后经周恩来等同志及重庆办事处向国民党贵州省政府抗议和交涉，才将被捕人员释放。一月二十二日，我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全部撤到重庆转赴延安。有一次，我为返延安的同志到军委会去办

理“护照”，在那里碰到张冲，他向我试探性地问起对“皖南事变”的看法。我说：现在我前方将士群情激愤，如当局不能妥善处理，事态必然会进一步扩大，有打起来的可能。他只点了点头，没有作声。

这一段时间，我们撤退了不少同志和党外人士，对留在重庆工作的南方局、办事处和报馆的人员，都进行了应变和气节教育。

早在一九四〇年底国共两党关系已经十分紧张的时候，党中央就曾指示南方局，要在宣传中把国共合作正面临分裂的局面告诉国内外友好人士。指出这种局面只对日、德法西斯国家有利，对英、美、加拿大等国十分不利，要奔走呼号，以动员各方面的舆论，制止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为了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嘴脸，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曾将反动派半年来制造磨擦的有关材料汇集成册，密寄西安、桂林，由王安娜女士等经外国朋友带往香港散发。王安娜是德国人，当时在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和孙夫人宋庆龄那里工作。十二月，周恩来同志在沈钧儒先生寓所，又会见了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斯特朗，向她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希望斯特朗在适当的时候将材料公诸于世。“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又于二月十四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会晤。当时国民党当局十分

害怕，在他们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汇报时，竟有人提议“设法将周关闭一日，不让他同居里见面”，但又怕是居里邀请见面的，所以他们未敢采取行动。周恩来同志向居里提供了若干材料，说明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夭折，日本南进。美国政府得报后，立即要居里向蒋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这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宋庆龄、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和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先后发出呼吁后，我们得到了国民党中一些元老的同情以及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力量的广泛支持，加上国际舆论的谴责，这就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狼狈。

在我党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这时不能不力图制造和平假象，借以摆脱困境。二月下旬，张冲接连打电话给周恩来同志，要我党的参政员参加国民参政会。本来，我党已以七参政员名义发出公函，提出十二条解决办法，包括要求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取消“一·一七”反动命令，恢复叶挺自由；取消一党专政等条款，表示如对方不接受这些条件，我党就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张冲表示取消“一·一七”命令等实不可能，并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希望我们收回原发的公函，在条款上作些修改。于是我党又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但未被国民党接受，因此我党拒绝了出席这次参政会。在这次参政会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继续

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攻击，蒋介石也发表了色厉内荏的讲话，表示国共总要分裂，但他承认现在“政治上不许可”。这表明他已经陷于十分孤立、被动的境地。

（三）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的斗争

一九四三年六月，蒋介石乘第三国际解散之机，由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冒“群众团体”的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解散共产党”；并要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布了这一条消息。当时，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日军将北上进犯苏联，于是集结几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并进行了多次挑衅。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我党在政治上的及时揭露和在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使势态未进一步扩大。

本来，在国共关系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早已奉党中央指示准备回延安，但国民党借故拖延，不提供交通工具，以致迟迟未能成行。一九四三年六月，又接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电召，要他回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因此周恩来同志向国民党当局说明，因第三国际解散，有些事回延安商量，决定离渝返延。

这次随同周恩来同志撤回延安的有一大批同志和部分家属，共有一百一十四人（林彪于一九四二年九月来重庆参加谈判，也在这次同行）。当时大家的心情很复杂：一

方面因为反动派的反共活动变本加厉而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对大批同志撤离也感到留恋；特别是对周恩来同志这次回延安后，何时能再返渝很难预料，更感到有些怅惘。因此，大家都以沉重和惜别的心情，决定在他们临行前，在办事处举行一次聚餐会，为他们饯行。平时我们是不搞这种餐会的。这天下午，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都到齐了，饭菜也摆好了，但周恩来同志仍在楼上批阅文件，部署离渝后的各项工作，迟迟不见下来。于是邓大姐代表大家上楼去催。周恩来同志只是忙着处理工作，口里答应，并未起身，过了一会，邓大姐又上楼去催，周恩来同志抬头望了望，没有吱声，仍旧伏案忙着，大姐觉得为难，就不再催了。又过了一会，周恩来同志终于下楼来了。他先举杯向大家敬酒，对让大家久等表示歉意。然后又举酒到邓大姐面前，说：“我也敬你一杯，让我们喝一杯欢乐酒吧！”邓大姐和他碰杯而饮，引得大家都笑了，原来沉重的心情，这时轻松了许多。这次聚餐会，既表现了同志间深厚的战斗情谊，又表现出同志们身在虎穴的坚定的革命意志。

六月二十八日晨，周恩来同志一行一百多人分乘四辆汽车首途出发，我把他们送到青木关。那里有国民党在重庆附近设立的一个检查站，素来就对我往来人员竭尽刁难之能事。这次我们九点多钟到达，直到中午近一点钟才放行。他们一行人到达宝鸡后，得知国民党正准备向边区进

攻，于是周恩来同志一面告诉大家要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一面带人先到西安找胡宗南当面交涉。后由胡宗南派了战地服务总队队长，一直护送到与边区交界的重镇一一交道镇，才得以安抵延安。

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周恩来同志返延后，南方局工作由董必武同志负责。

长期以来，国共两党的关系就处于若即若离、时张时弛的状态，但实际上始终是外松内紧。“皖南事变”后，情况更加严重。我党领导同志住所曾家岩五十号周围，密布国民党的特务、暗哨；当时设在红岩办事处附近的国民参政会，也有特务在活动。我党工作人员出入或进步人士与我们的往来，都受到严密监视。在这样的环境里，南方局、办事处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领导下，为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精神，广泛开展交朋友的活动，也采取过一些“祝寿”活动等特殊方式，以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四一年三月间，在我党的支持下，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为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发起了“祝寿”活动。当时马寅初先生因公开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财而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于狱中，所以这种公开的祝寿活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民主逆流的一种群众性的抗议。

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新华日报》还出版祝贺冯玉祥

将军的六十寿辰的专页。十一月十六日，又为庆祝郭沫若同志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周恩来同志曾说：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一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这次纪念活动达到了发动和团结广大文化界人士、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目的。以后重庆的文化和戏剧演出活动十分活跃。如一九四三年四月在重庆国泰剧院公演郭沫若同志的《屈原》，轰动了整个山城。这个剧突出了屈原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控诉，实际上表达了大后方千百万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它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文艺和爱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重庆的文化界、妇女界、律师、上海法学院、育才学校师生以及各党派人士四百多人，又为庆祝沈钧儒先生的七十寿辰举行了茶会。董老到会祝贺。沈老也表示要尽自己的全力，促成民主宪政的实施。这一活动，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争取团结、民主而斗争，也起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除了为党外著名人士祝寿外，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党中央又发来祝贺董老六十寿辰的电报。董老生于一八八六年，按中国习惯计算，当时是五十九岁。为什么提前为他祝寿？也是为了开展工作。一九四三年九月下旬董老参加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会上何应钦又一次攻击我

党和八路军，董老当场提出质问，弄得何应钦无言以对。一些C. C. 分子则乘机起哄，以致会议无法进行，董老当即声明退出会议以示抗议。在这以后，国民党对红岩、曾家岩的包围和监视就更加严密，以至发展到公开进行盯梢，并在九月间公然封闭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合法电台。为了安全，从那时起，我们同外界关系人的联系就相对减少。一月三日由办事处、《新华日报》及各界友好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邓初民等为董老举行的祝寿活动与作诗酬和，就是借以举行集会。当时董老曾写了一首《谢寿》五言律诗：

“出生原有日，无定是周期，
巧历难为算，吾身不自知。
且欣仍健在，敢告莫奔驰，
殴寇亚乌碓外，何嫌痛饮迟。”

这首诗既对大家的祝贺表示了谢意，也表达了董老为革命奋斗不息的崇高精神。董老这时是我党驻渝的主要代表，又是参政会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常务委员。因为国民党并无谈判诚意，所以董老除应付谈判外多数时间是同许多民主人士一起，为积极推动民主宪政的实施，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开展斗争。

由于反动派的各种限制、阻挠，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同外界的公开接触少了，因而大家可以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一九四三年在南方局领导下，我们也开展了整风

运动，学习“整顿三风”的文件。当时大家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曾在重庆引起过一场风波的“王梓木事件”。

王梓木同志是我党的地下党员，曾在冯玉祥将军部下任过高级参议，后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身份就公开了。他因过去作战负伤，有一条假腿，行动不很方便，因此组织上指定一个服务人员，帮助照顾他。在当时，除周恩来、董老等领导同志外，一般不配备专职人员在身边工作。有一次王梓木同志生病，可能由于他对这个担任服务工作的同志的照顾不满意，发了脾气，因此在党的生活会上，有些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那时大家都读过苏联作家考涅楚克的《前线》，那里面对老红军将领戈尔洛夫的摆老资格有尖锐的批评，因此就被联系起来批评王梓木同志有军阀主义的残余，因他不服而引起了争论。事后，负责同志又批评了他。他一气之下，就自行跑到冯玉祥先生家里去了。当时组织上研究，认为他平时表现是好的，一时的过错，只要处理得当，还是可以劝他回办事处工作的。经过公开的联系和秘密党员的工作，他表示了愿意回来，但就在这时，此事被戴笠知道了，而且他正准备带人去把王控制起来。我们得到这消息，经请示董老后，即由我乘小汽车去冯宅接他，我的车到上清寺时，王梓木同志刚好已从冯宅走出来，于是我立刻停了下来，扶他上车，一同回到了曾家岩。

事后，国民党报纸就大肆造谣，说共产党绑架了王梓木，还点了我的名。因为这样，王已不宜留在重庆继续工作，所以在我们向国民党当局办理一批回延安人员的“护照”名单上，也列有王梓木的名字。后来我们得到消息，国民党准备在王返延途中对他加以扣留，因此这一次王没有动身。于是国民党又放风说王已被中共暗杀了。王梓木同志为此特地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九、十、十一日连续三天在《新华日报》一版广告栏内登出紧急启事^①加以驳斥。这样，他在重庆又继续留了一个时期后，才随同周恩来同志飞回延安。他到延安后给毛主席写信作了检讨。毛泽东同志还特地给他复信，鼓励他说：“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这封信现在已被收集在《毛泽东书信集》中。王梓木同志是位老同志，我们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保护了自己的同志，也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全国解放后，王梓木同志曾担任过黑龙江、吉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一九四四年冬，董老要回延安，中央来电，由王若飞同志留渝主持工作，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张明）、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七

① 启事全文为：本人奉命赴延，因老病复发未能成行，现在休养中。外间竟有人谣传我被人秘密杀害，绝非事实。特此声明。王梓木启。三十三年三月八日。

人为委员；许涤新、张友渔、章汉夫等列席。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沿平汉、粤汉、湘桂线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日军前锋一直打到贵州独山，使重庆受到很大的震动。国民党在中原和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军队已腐朽到不堪一击，再加上通货膨胀，财政困难，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及国内外舆论的批评，蒋介石被迫不得不继续同我党进行谈判。

五月初，林伯渠、王若飞同志到达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谈。五月中，他们同机到达重庆。二十二日林老将我党中央提出的谈判方案二十条要求提交王世杰和张治中，二十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我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承认边区政府及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地方自治等等。王、张认为我们提的条件太多，不肯接受，希望我们修改；中间经过多次谈判，由于国民党坚持它的所谓“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只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个师，拒绝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拒不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因此谈判没有进展。九月中旬，林伯渠同志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四个月的经过，以及一直未得结果的原因。指出只有立即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推动和团结全国力量，拯救民族灾难。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召集有各党各派、各抗

日部队、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我党中央也以“延安权威人士”发表评论的方式，提出：要挽救目前时局的危机，必须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我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和改组统帅部的主张，深得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拥护，这样，也就把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在重庆“特园”召开代表会议，将原来以党派团体为基础的政团同盟改组为以个人为基础的中国民主同盟；表示赞同我党提出的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时，昆明、成都学生群众性的示威运动不断发生。在重庆，要求取消特务统治，实行民主政治的群众运动也很活跃，工商界因物价飞涨而濒于破产，也经常请愿，发出呼吁和提出种种要求，弄得国民党政府穷于应付。

一九四四年九月，赫尔利作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已经到达重庆，他表示愿意为中国的内部团结而奔走。十一月，林伯渠同志和赫尔利一同飞往延安。毛泽东同志曾和赫尔利举行过两天会谈，提出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打败日本，复兴中国；建立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建立所有抗日军队联合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联合政府应成为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五条。赫尔利表示赞同，写成《五

点草案》，毛主席和赫尔利都签了字。十一月十日，周恩来同志与赫尔利同机飞渝，同国民党继续谈判。

对于美国来说，这时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海军虽已连遭惨败，但在中国大陆日军还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中国战场的战局如何，是对日作战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当时有一部分比较开明、公正的人士如史迪威等，看到国民党军队腐朽无能，已无作战能力，从减轻美国本身的军事压力出发，主张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但也有一部分人出于反共的偏见，又要同苏联抗衡，因此主张扶蒋反共，赫尔利就是持这种主张的。赫尔利回重庆后，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五点草案》，拒绝接受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他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主要是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派人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但要整编中共军队。周恩来同志表示我党参加政府和军委会只是挂名和做客，绝不是联合政府。指出这个方案表明了国民党当局毫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以后赫尔利采取偏袒国民党的立场，提出要中共参加政府，成立由国共和美方各一人参加的整编会议，整编中共部队，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军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则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个建议，周恩来同志当场表示不能同意。以后党中央也指出，这是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军队、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是我们绝不能同意的。因为谈判无结果，周恩来同志又返回延安。不久，赫尔利回国向美国政府提出反对援助中国

共产党的主张。他认为，在中国的民主政府没有组成以前，一切党派的武装部队都必须无例外地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管辖。于是这一反动的对华政策就在美国占了上风。后来赫尔利又回到中国，虽然谈判仍继续进行，但蒋介石坚持认为“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是推翻政府”。所以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谈判始终没有取得协议。

（四）毛主席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因为他的主力退缩在西南，当时要接收大片沦陷区夺取胜利果实，这需要时间；但又迫于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强大的舆论的压力，于是采纳了政学系官僚、当时任“文官长”的吴鼎昌的建议，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为了和平建国的大计，毛主席和党中央抱着真诚的愿望，作了英明的决策：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代表我党，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尽管我们估计到蒋介石在玩弄假和平的花招，借以欺骗国内外舆论，但我们仍准备认真谈判。谁真要和平，谁破坏和平，人民群众是会看清楚的。毛主席到重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震动中外的大事，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都感到极大的鼓舞。

毛主席到达重庆之前，周恩来同志便做了细致的安排。他从延安打电报给我，要我把办事处二楼东部的房子腾出来，作为毛主席及其随员的住房和办公之用，并要

我们为毛主席准备好衣服、鞋子等；对生活上的细节，也都考虑得很周到，并指定刘昂同志留在二楼照顾，李泽纯同志专为毛主席做饭。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多钟，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这天一清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刘少文、王炳南、徐冰、张晓梅、龚澎、陈家康、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和我共几十人就到机场迎候。到机场去迎接的民主人士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等多人；国民党方面，有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还有邵力子、雷震等；驻重庆的各国新闻记者也都几乎全部出动了。

毛主席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后，便乘车到上清寺张治中官邸“桂园”稍事休息，然后就来到红岩办事处，受到南方局、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的同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对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并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晚，毛主席参加了蒋介石在山洞的公馆“林园”举行的宴会，并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三十日回到红岩。原来计划把张治中的寓所“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同志居住，后来考虑到在那里有许多不便，就把那里只作为办公和接见中外来宾之用，住还是在红岩办事处。此外，解特生先生的“特园”也给毛主席备用。

当时对毛主席的保卫工作，是一件头等大事。毛主席

到达前，我和刘少文同志就对全体人员作了动员，务必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毛主席到渝后，我即向由延安派来做保卫工作的陈龙和龙飞虎、蒋泽民、颜太隆、贺青华、舒光才、齐吉树等同志介绍了重庆的情况，并一起商量的安全保卫的具体措施。我们决定设置三层岗哨：外层是流动哨，设在黄果树附近；第二层是大门门卫；第三层是住房门口，实行通宵值班。流动哨和房门口值班由办事处干部轮流担任。当时大门和后门的警卫有五个人，陈龙同志经常查岗。

因为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所以我們和国民党双方在保卫工作上有个分工：内部由我们负责，外部由他们负责。所谓内部，在红岩，是指离办事处大门约二十米距离的黄果树以内；在“桂园”，是指院围墙以内。这些区域以外，安全就由他们负责。毛主席出门，我们就通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由他们负责沿途的保卫工作。在“桂园”，我们派了几个同志，由朱友学负责警卫安全；伍全奎、宋福生、王东森负责招待来宾和为毛主席做饭。国民党在“桂园”也派驻宪兵保卫。他们对所有来客进行登记和监视，并不断调换负责人，每天还要向上司做报告。我们建议他们取消这些手续，他们说这样做不好交代。

九月一日，毛主席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这一天宾客很多，在重庆的各界知名人士和不少文艺界人士、国民党党政军要人都来

了，许多来宾都向毛主席敬酒。这一天，下着毛毛细雨，但许多群众纷纷聚集在门口和路边，等着瞻仰毛主席的风采。后来人越聚越多，挤得水泄不通。毛主席出门后，人群中的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这种场面，充分反映了大后方广大群众对我们党的强大的向心力。

毛主席在重庆四十多天，同蒋介石直接会谈六次，还广泛地会见了各方面的人士，其中有国民党当权的左、中、右派，还有大批民主党派著名人物以及工商、文化、妇女等各界人士。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则是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就和平建国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各党派合法地位、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问题进行多次谈判。九月十五日，毛主席在“特园”同张澜先生作长时间会谈，告诉他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问题已大致获得协议；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当前的症结在于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并说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正在运送兵员，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先生说，应当把两党已经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你们不便提，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出来。毛主席赞同他这个建议。

谈判进行到十月上旬，大体达成了协议。当时我军在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粉碎了阎锡山的进攻，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的气焰，这也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这个协议的签订，是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反对独裁统治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这期间，毛主席还接待了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接见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和各国友好人士。九月十六日还在办事处会见了三个美国士兵：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总部的霍德华·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毛主席倾听他们所谈的各种问题，向他们说明我党对国际、国内问题的立场。还同他们共进晚餐和一起照了像。

毛主席在重庆，尽管每天考虑的是关系中国命运和亿万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与各方面的接触和社交活动都很多，但他始终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好整以暇、从容不迫的风度。记得十月二日，柳亚子先生应约到红岩来见毛主席，谈话中柳先生请毛主席题赠《七律·长征》，毛主席答应写《沁园春·咏雪》相赠。那一天画家尹瘦石同来，表示愿意为毛主席画像，毛主席答应了，说另约时间。十月五日下午，周恩来、张友渔同志陪同尹瘦石来红岩村，由我把尹先生引进一间客厅。一会儿毛主席微笑走来，寒暄了几句之后，主席坐在一张藤椅上，尹先生便开始作画。毛主席神态安详地静坐着。过了几十分钟便画好了。毛主席问我画得像不像？我说画得很好。毛主席同尹先生紧紧地握手致谢，并留他吃饭，尹先生辞谢了。十月二十

五日，柳亚子先生和尹先生举行诗画联合展出，《新华日报》辟专栏进行宣传，刊头上是毛主席亲笔题的“柳诗尹画联展特刊”几个字。

十月八日双方会谈纪要定稿的那一天，张治中先生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主席。饭后我们正在看文艺表演，《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一个同志进来向周恩来同志报告。周恩来同志立即站起来，随即把我叫出去。原来是李少石同志当天下午陪柳亚子先生回寓所时在返回办事处的路上被国民党士兵枪击了。司机把李少石同志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后，就到《新华日报》营业部报告。周恩来同志要我马上到医院去看望，同时也把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找来，要他查明情况，缉拿凶手，并要张镇亲自护送毛主席回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当时因为真相不明，大家作过种种猜测，都同毛主席的安全联系起来；外面也有不少传说。随后周恩来同志来到医院，我也在场。为了慎重起见，我还参加了尸体解剖化验，取出弹片多块。事后经调查，这次枪击事件是由于李少石同志所乘汽车的司机开快车，撞伤了路上一名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国民党的一个排长见车未停，便向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打中了李少石同志的肺部，子弹是汤姆式的，中弹即爆炸，因此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去世。为了这件事，《新华日报》发表了澄清事实的声明；与此同时，我们还慰问了国民党士兵，并承担了他的医药费用。这充分表明我们共产党人

办事情是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

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半，毛泽东同志由张治中、王若飞和我护送，飞返延安。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毛主席在登机前向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说中国问题是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飞机在下午一点多钟到达延安，我于次日乘原机返回重庆。

（五）旧政协的召开和政协 决议遭到破坏

根据《双十协定》达成的协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我党正式派出代表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七位同志。当时，董老、王若飞同志都在重庆。周恩来等同志于十二月十六日到渝。不久，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到达重庆。这时，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我代表团在胜利大厦举行了盛大的新年鸡尾酒会，招待中外各界人士。到会的除有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的首脑外，还有各党派、各界人士，美、英、苏和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驻华使节、武官、国际援华团体代表，美、苏、英、法各大通讯社记者共约五百多人，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参加了。与会人员受到了我们的热烈欢迎。当时的气氛表

明，中外人士都极为关心中国的局势。

为了使政协会议能取得成功，团结各种民主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制止内战危机，在我党的推动下，重庆各界人士和人民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从一月十二日到二十七日举行过八次各界民众大会，由出席政协的各党派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每次到会的群众都十分踊跃。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件事很害怕，终于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沧白堂事件”。那次事件是由陈立夫亲自手令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花钱雇用了一批特务、打手，对大会进行捣乱和破坏的。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骚扰和设置各种障碍，但政协会议在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下，最后还是就改组政府、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项重大问题的原则达成了协议。消息传出后，重庆各界于二月十日上午在较场口举行庆祝集会。但国民党反动派却事先布置了所谓“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等打手七、八百人，抢先进入会场，霸占讲台，并打伤章乃器、李公朴、马寅初、施复亮、郭沫若等多人。这是继“沧白堂事件”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更大的破坏政协协议、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一场大血案。周恩来同志到达会场时，特务们已经打起来，他愤慨地说：“这是什么国家！”当晚，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等同志到医院对受伤的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慰问，并同董必武、王若飞、章伯钧、沈钧儒、张君勱、

梁漱溟、张申府、罗隆基、陈启天、李烛尘等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介石害怕当面受到责问，二月十一日飞往上海去了。

二月十二日有个以“冠英”为化名的特务，向周恩来同志写了附有一粒子弹的恐吓信，送到中山四路中共代表团住处。周恩来同志立即将原信交《新华日报》公布。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又借口“张辛夫事件”搞了一次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了《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打伤了营业部主任杨黎原等人；民盟机关报《民主报》也被捣毁。这一天，中山路中共代表团驻地为了防范他们挑衅，除了我和龙飞虎等几个同志留守外，代表团成员和许多工作人员都转移到别处。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在代表团驻地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声明我党始终坚决为和平民主建设而奋斗，绝不退却，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采取负责态度，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障民主秩序。

旧政协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民主的暴行，看起来其势汹汹，实际上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群众对他们的更大的不满，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的革命怒潮，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

旧政协以后，由于国民党不断破坏政协决议，在宪法草案问题上与我党发生严重分歧，我代表团派王若飞、秦邦宪同志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王若

飞、秦邦宪同志飞延，同行的有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夫妇及子女、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主任邓发同志和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等。叶挺是代表周恩来同志到延安参加整军会议的；邓发则是为职工联合会筹备工作向中央请示报告，并准备去莫斯科参加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和执委会的。他们在飞行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迷失方向，当日下午在山西兴县东南的黑茶山失事，他们和美国机组人员全体遇难。这就是“四·八烈士”事件。我记得这架飞机是我们向美国方面交涉来的。那天飞机起飞后就一直没有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四处探询也没有结果。我们一夜间同延安的电报往来不绝，次日才知道出了这个不幸事件。四月十九日上午九时，在青年馆举行了有重庆各界参加的追悼大会。那天清晨，工人、学生、教职员工、大学教授六千多人到达会场。因会场容纳不下，还有无数群众聚在场外。从会场到马路，摆满了花圈、挽联。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叶剑英同志，冯玉祥、李德全、何香凝、陈铭枢及民盟中央都送了花圈或挽联。追悼会由张澜先生主祭，郭沫若同志读祭文，悼念烈士“为民主而生，为民主而死”。他读祭文时，声音颤抖，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充满了感情。会上，周恩来同志以及孙科、邵力子、罗隆基等都讲了话。会场气氛庄严肃穆。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团、四川省委、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全体同志又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为“四·八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

会，由周恩来同志主祭，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同志陪祭。许多人都讲了话，有的同志还痛哭失声。

“四·八”烈士是为维护政协会议决议、为奔走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而献身的。他们的牺牲，激励了一切愿意为和平民主而尽力的人士继续奋斗的意志和决心。

（六）重庆办事处的经常工作

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根据工作需要，在组织机构上设有以下一些单位：经理科，负责管理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经费，科长是赖祖烈、梁隆泰、王华生；文书科，办理对内、对外文件，科长是刘士杰、朱语今、朱汉民；运输科，包括下设仓库、汽车修理厂，主要是向延安运送干部和物资（我们自己采购及国内外进步人士捐赠的物品），科长是刘恕、吴宗汉；总务科，下设招待所、休养所、托儿所、警卫班、勤务组、医务室、储藏室、传达室、炊事班等等，科长是史唯然、邱南章、陈宇文、朱爱牧；机要科，负责和延安等地的电台联络，这部分工作由南方局秘书处童小鹏领导，对外童是办事处的机要科长；电台台长是申光等。一九四三年九月，我们的电台虽被国民党封闭，但事实上电讯联系从未中断。曾家岩“周公馆”由陈远绍、祝华、龙飞虎等负责。

办事处的经常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领取军饷、弹药和通讯、卫生器材。

从一九三七年八、九月份开始，国民党政府每月给十八集团军军饷四、五十万元。新四军建立后，每月军饷是二十万元，由我们到国民党军需署领取，我们领到后就汇到十八集团军总部。当时军需署署长叫周骏彦，一九二七年他任两浙盐运使时，我曾在他那里工作过。有次我还陪同叶剑英同志见过他，向他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军需署里我有不少熟人，那时领款的手续繁琐，我们又不熟悉，这些人都曾帮过忙。有时还让我们提前领取，将款存入银行，可以得到一笔利息。后来军饷直接拨到第二战区，就不再由我们领取。“皖南事变”发生后，胡宗南的一个军需署署长叫汪维恒，是我的小同乡，他告诉我国国民党将不给我们发饷了。我知道后，立即向叶剑英同志汇报，他叫我拟个电报报告中央。果然，不久军饷就停发了。至于军械、弹药、通讯、卫生器材等，在南京和武汉期间，都还象征性地发过一些，到重庆后，也是直接拨到战区领取。“皖南事变”后，就什么也不给了。这时我八路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部队的给养和军械、弹药，除了靠边区与根据地群众供给和从敌人手中缴获外，重庆办事处也担负采购重要物资、器材的任务，

办事处的经费来源，在军饷停发后，就主要靠我们自己筹措。这时一是靠国际上的援助；二是英国援华总会经过宋庆龄给予的援助。还有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和华侨爱国人士，也为我们捐募了不少款

项和物资，如药品、器材、服装等等。这些物资都由香港经河内、友谊关、贵阳运到重庆交给我们，再由我们转运到延安。这两项援助本来就有，这时则已成为重要来源。三是我们自己也搞点贸易，因为当时重庆物价经常上涨，通货膨胀，货币不断贬值。我们便通过各种关系，想各种办法筹措款项来解决经济问题。比如新谷上市粮价要便宜一些，我们就买足一年食用的粮食，避免粮价上涨。我们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开了一个公司经营土产、食糖和代购油料。另外，还通过其他关系，从香港进口一些器材和重要物资。

这些款项和物资，除过去所领军饷全部汇往总部外，对于海内外捐赠的款项，则是汇到西安办事处转送延安。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往返于延安、重庆时，也亲自带过钱。有时，我们也托可靠的关系带送，并托过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带钱到延安。所有款项，大部分上缴中央；一部分留作地下党经费以及南方局、办事处工作人员生活费用的开支。此外，还要帮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工作与生活之用。对这些开支，一般是经过周恩来同志和董老审查后，定期报中央报销。对于革命烈属和干部家属的救济，也是由我们办事处统筹开支的。

我们的第二项经常工作是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等部门，报送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报和敌军动态。“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战报就不送了。这是一

些例行公事。

第三项是向延安输送物资和接送干部。

起初，我们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的交通工具只有运货卡车。这条路线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宝鸡、铜川、洛川等地到达延安。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八天到十天。如果遇到国民党检查站的刁难，有时就长达二十多天。那时我们的家当很小。在武汉时只有一辆旧卡车，后来马来亚华侨温康兰先生（以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捐赠了一辆救护车，加上新加坡华侨人士的捐赠，我们共有了三辆救护车和四辆卡车，其中两辆送到延安，其余的留在重庆，算是解决了运输工具问题。新加坡的王天茂先生还组织了一个“司机回国服务团”，连同香港的司机服务团，前后五批共有司机六十多人回国服务。这些同志有的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勇牺牲了，有的病故了；除个别人因不适应我们的艰苦生活而离去外，大多数留在我们队伍里，有些还成为各级领导干部。

“皖南事变”以前，我们和延安间往来的问题还不多，事变后的情况就复杂了。过去我们用自己的护照就可以通行，后来却要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申请护照。申请书的条目繁多，要填写申请去延安人员的姓名、籍贯、年龄，还要写明携带的物品，甚至书籍也要登记。沿途的检查站很多，其中以重庆附近的璧山县青木关和进入边区前的洛川站的检查为最严。除对我方人员盘问纠缠外，对所

有物品、行李都要翻箱倒篋，没有几个小时走不了。“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高级参谋李涛等同志返延安，在中部县（即今黄陵县）被国民党驻军扣留，经多方交涉才放出。不久，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军车两辆由延安返渝，在三原也遭到扣留，押车副官和司机五人被捕，也是数经交涉才获释。一九四三年夏，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撤退一大批干部回延安，行经褒城时，检查站如临大敌，竟在城门上架起机枪，先是扣留护照，然后把人集中到河边，并要检查我们警卫人员的枪支，随后又带到汉中司令部，刁难了很长时间，因为找不到任何借口，最后不得不放行。这一批干部足足走了二十多天才到达延安。

当时除把撤回的干部送到延安外，也还输送一些地下党员到其他地方去。

在历次运输中，我们年轻的押车副官，担任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他们要指挥行车，又要同国民党检查人员办交涉，进行必要的斗争；还要安排照顾乘车人员的生活和安全。为了保护车辆，他们晚上睡在驾驶室里，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在革命的斗争岁月里，他们经受了艰苦的磨砺，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办事处机关物质生活是艰苦、朴素的，而精神生活则是很充实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使机关真正成为一个革命大家庭。

南方局和办事处共有一百多人，由于办事处建造在山坡上，开始用水全靠厨房的同志从嘉陵江一担一担地往上挑，十分辛苦。后来有个同志在办事处西边山沟坡的岩缝里发现了一股山泉，便用粗竹竿制成水槽，把水引进厨房，减轻了挑水的劳动，大家说是“土自来水”。之后，又在防空洞附近打了一口井，这才解决了吃水问题。

当时大家生活的供给标准，最初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三元五角，以后物价上涨，改为实物，都吃一样的伙食。一九四二年以后，才在领导同志就餐的那一桌加一个保健菜。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我们办事处的同志也在空地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服装是单衣每人每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套，还有蚊帐。对于不便穿军服的同志，每年按普通标准发一次服装费，由各人自己购买，男的穿中山服，女的穿旗袍。另外，每人每月有三元五角、四元、五元不等的津贴，作为购买零星生活物品之用。

办事处设有医务室，大病到医院治疗，小病就在医务室就诊。在离办事处较远的一个名叫高峰寺的地方，还为重病号设立了休养所。另外，又为婴幼儿办了托儿所。所长和保育人员都是从孩子妈妈中挑选的。孩子们从小就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那批孩子，现在都已是中年干部，有的已是负相当责任的了。

在办事处的几年时间里，我们曾先后为许多同志和烈士寻找亲人，沟通音讯，抚养家属子女，把他（她）们送

到延安或转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记得这里面有毛泽覃同志的儿子毛楚雄，蔡和森同志的儿子蔡博，任弼时同志的女儿，叶剑英同志的儿子叶选平，李硕勋烈士的儿子李鹏，吴玉章同志的外孙女大兰、小兰、霞飞、署苹，李克农同志的父母、妻赵英、女儿李冰，陈毅同志的父母，刘伯承同志的弟弟，叶挺、罗瑞卿、罗炳辉、夏曦、郭亮、严朴等同志的儿女，徐特立同志的亲属等等。寄钱接济的有林伯渠、谢觉哉、唐延杰等同志的家属。这项工作由刘一清（即刘昂）同志负责。被接济的家属无不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这对社会上那些反共分子诬蔑共产党“六亲不认”的谰言，是个有力的驳斥。

那几年，也有些同志和亲属病逝。刘太太在小龙坎找了一块墓地安葬他们。在那里有周恩来同志的父亲，邓颖超同志的母亲和黄文杰、李少石、吴志坚等十一位同志和三个小孩。

由于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是艰苦而又紧张的，大家很少有机会进城。平时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文化教育，抓得比较紧。经常性的教育包括政治、军事、党史、时事；文化教育是语文、算术、作文。同志们通过这些学习，既提高了政治觉悟，又获得了各种基础知识。有空闲时，同志们就在农场、山沟里散散步。山坡上有不少房东的果树，如桃子、柚子、柑子等，大家自觉遵守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不采摘，而附近其他机关的驻地，往往

果子尚未成熟就被采摘了，引起果园主人的不满，这也是一种鲜明的对照。我们的同志除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外，也很注意搞好群众关系，助人为乐。记得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有天连夜大雨，山间大水倾泻，不时有泥土、石块崩塌。办事处附近的一户人家房屋被冲倒，有人压在里面。因为这户人家平时有意注意办事处人员的行踪，我们有的同志对他们有怀疑，没有去抢救。周恩来同志就指出：这样不好，不管他本人如何，他有孩子、家属，我们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于是，许多同志都奋力去抢救。这些事例，说明我们的同志正是通过一些具体事实，培养了高尚的革命情操。

办事处里还设有救亡室，每天晚上都可以在里面进行文娱活动。大家经常唱救亡歌曲。逢年过节，几个爱好戏剧的同志排练独幕话剧。我们还组织同志自己动手修操场、盖礼堂。自己办墙报，也常打桥牌，充分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至于办事处当时的外部环境，我们虽然是公开的合法机关，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敢轻易公然袭击我们，但我们也从麻痹大意。事实上骚扰还是经常有的。一九三九年夏秋之间，陈波儿等几位同志来到重庆，住在房东刘太太家里，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就借查户口为由，进行纠缠，并扬言要把人带走。我得到消息后立刻赶去，说明她们是我们的家属，宪兵无奈才走掉了。“皖南事变”后，办事处

的张裕如同志在送宣传品到军委会稽查监督处时被扣留了，我得知后到歌乐山郭沫若同志处报告周恩来同志，但未遇见他。张裕如在出事后设法通过报童递了一个条子出来，于是我就和龙飞虎同去找他，途中遇到了空袭，恰好看到张正被押送到防空洞。我们弄清了他的确切关押地点，就报告了周恩来同志，经恩来同志写信给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才把人放出来。那时我们被盯梢的事就更频繁了。有次办事处的张剑虹同志外出归来，路上突然有人搭她的肩膀，还叫了一声，她看是陌生人，未予理睬，就急忙赶回办事处，但那个“尾巴”紧紧跟随，一直追到办事处门口，看到我们的哨兵，就说他跟了一个对象，赖在门口不走。我听到后出来对他说：“这里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你的事我们知道了。”他一看有点不对头，才灰溜溜地走开。也许这是个盯梢的新手，但可以看出当时环境险恶一斑。所以在“皖南事变”后，办事处还着重进行了对敌斗争的方法和革命气节、保守机密等方面的教育。同志们平时外出工作，实行请假制，一般是两人以上同行，并告诉值班室的同志，说明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来，以便出了事能及时查找。当时我们的保密工作也很严格，大家都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让你知道的事，会告诉你；不该知道的事，你也不要问。对平时所见所闻，也要守口如瓶，决不让特务从我们口中得到任何东西。

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国共谈判

正在紧张地进行。一月间，刘少文同志奉派到上海，我们曾托他在南京、上海找房子筹备办事处。以后又派祝华、陈展两同志去南京。在二月和四月，周恩来同志两次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蒋梦麟，要求在南京拨给两幢房屋，在上海拨给一幢，筹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之后，就派龙飞虎、刘恕、石西民三同志以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新华日报》成员的公开身份去南京帮助筹备。

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筹备就绪后，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和齐燕铭、章汉夫、廖承志夫妇、钱瑛、王炳南、童陆生等十五人，于五月三日乘马歇尔专机由重庆飞抵南京，陆定一同志等三十人也于同日乘中航机由渝抵宁。五月十六日董必武、李维汉以及刘宁一、罗瑞卿、陈家康、张晓梅等一行，也由渝飞南京。我待搬迁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后，于五月二十三日同张黎群、王华生等乘中航机飞南京。还有些未了事宜，则交给留在四川省委工作的袁超俊、朱爱牧等人负责处理。

我们在搬迁工作中，曾发生过一起碰船事件，在电台工作的女同志叶晋之不幸落水牺牲。还有一个女同志在船上早产，因缺乏接生条件，婴儿出世后就死了。

回顾重庆办事处七年多的战斗生活，我们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尽管处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时掀起反共高潮的险恶环境中，但由于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

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因此团结和争取了广大的民主进步力量。如果说，在重庆初期，还只有文化教育界、进步青年学生靠拢我们；那末到后期，不但工商各界的民族资产阶级向我们靠拢，连各派地方势力、国民党的中间派中，也都有我们的许多同情者和支持者。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相反，国民党当局由于坚持其反共、反民主的反动立场，加上军事溃败，政治腐朽，声望已一落千丈。当我们离开重庆时，国民党反动当局正在一意孤行，不断违反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这时全国已是战云密布。我们党为了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仍然顾全大局，继续为维护政协决议的全面实施而奋斗。我们也正是负着这个使命离开重庆而来到了南京。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北京）

从第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

阳翰笙

第三厅的成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望风披靡，节节败退。不到半年时间，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南京等大城市和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也被迫迁至武汉。

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腐败愤怒已极。中国共产党向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国共合作，改组政府，共同抗日。共产党的要求立刻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纷纷表态坚决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共同抗日。蒋介石迫于民心丧失、大敌逼近的形势，不得不作出一点“改革”的姿态，取消了原军事委员会下面专搞特务活动因而声名狼籍的行营政训处和军委第六部，恢复了北伐时期负有盛名的政治部。蒋介石请共产党的重要领导

人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请北伐时期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任第三厅（宣传厅）厅长，完全是为了挽回声望，收揽人心而打出的“改组政府”的招牌。

我党对蒋介石的反动意图是很清楚的，但是认为争得一点政权机构对突破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推动全面抗战是有利的，所以我党同意了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同时积极将第三厅筹建成由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构。

围绕着第三厅的组建及其以后的发展，我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是一场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化宣传战线上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武汉时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重庆时期的中共南方局所领导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负责的。

在三厅的组建过程中，我党与国民党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非常激烈。

在确定郭沫若为三厅厅长后，蒋介石派复兴社特务骨干刘建群来充当副厅长。显然这是派他来控制三厅的实权，把郭沫若架空。对此，郭沫若向政治部主任陈诚提出要潘汉年作三厅副厅长。但国民党坚决不同意，并企图用既成事实的办法硬将刘建群塞进三厅。于是，郭沫若愤然出走长沙。

郭沫若的出走，使蒋介石的这台戏唱不成了。所以国民党不得不撤走刘建群，但也不同意潘汉年当副厅长。后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由郭沫若推荐无党派学

者、武汉大学教授范寿康当副厅长。国民党同意了。之后，陈诚又派范扬来作第二副厅长，范虽是国民党员，但起不了多大作用。这样，第三厅虽然在国民党控制的政府机构里，却可以相对地在我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了。

党组织多次开会研究第三厅的工作。讨论和确定了：第三厅的任务，是根据我党提出的救国十大纲领来进行宣传工作；机构设置，在三厅下面设文字宣传处、艺术宣传处和国际宣传处，各处下面再设三个科；必须把第三厅建成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三厅的领导干部成立一个党的秘密小组，直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成员有郭沫若、阳翰笙（我的公开职务是三厅的主任秘书）、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维键；基层党员成立一个特别支部，由冯乃超任支部书记，刘季平任组织委员，张光年任宣传委员。党组织是全部秘密的。同时，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和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何伟同志联系，一起行动，内外一致，互相配合。

一切工作就绪之后，第三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在武汉正式成立。

抗战扩大宣传周

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国统区所领导的第一次大

规模抗日宣传活动，也是三厅成立后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宣传战线上的第一次较量。

当时的形势：日寇主力逼近徐州，准备几路配合夺取武汉。南京傀儡政府成立，投降派更加跃跃欲试。国民党表面上喊团结抗日，背地里搞磨擦，在外地公开查禁救亡书刊。面临这种形势，号召全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到底，这已是当时国统区宣传工作的当务之急。于是三厅党组织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决定自四月七日起举行一个抗战扩大宣传周。

关于如何搞好这次宣传，周恩来同志和三厅各处的领导一起研究了多次。周恩来同志指示说：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去，到前线、战壕里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传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演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矢志报仇。宣讲队要由本地人与外省人混合编队，宣传要注意对象，说他们能懂的话，提出他们可以接受和可以做到的办法。还应该印发小型的宣传刊物及画报，迅速送到前方去。必须派宣传队分赴前线慰劳。必须募集药品和经费支援前线 and 伤兵。要作

好救济儿童和救济难民的工作。而且还要使这次抗战宣传活动，扩大到敌占区和敌人的队伍中去。

随后，三厅全体人员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同时依靠省委领导下的“中国工人抗敌总会”和数以百计的群众团体，如“青救”、“民先”、“蚁社”等的密切配合，宣传周的活动就广泛地开展起来。十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的活动延续了很久）；上万人的歌咏游行，使雄壮嘹亮的抗日救亡歌声响彻整个武汉上空；特别是抗日画灯火炬游行和夜晚几百条船相连数里的水上火炬歌咏游行，蔚为壮观，使人们产生自豪感和增强胜利的信心。剧院、电影院全部上演抗战话剧、抗战戏曲、抗战电影，免收门票，特别招待伤兵和难民。还把抗战电影用卡车送到从未看过电影的穷乡僻壤去，配合演讲。经过几天的扩大宣传活动，整个武汉三镇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

宣传周最后一天的活动是六十万人大游行，这是人民群众对自己力量的检阅。在人民声势浩大的抗日热潮面前，国民党顽固派惊恐万状。当几十万群众集合起来准备冒雨游行时，陈诚、康泽之流竟用放假空袭警报的卑劣手段破坏了这次游行大会。尽管如此，还是由许多队伍冒雨各自举行了游行。这说明，已经高涨起来的群众爱国热情，是压制不了的。

全国慰劳总会

继抗日扩大宣传周之后，三厅党组织又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开展了“七七”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群众献金，结果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果。广大爱国同胞拿出自己的积蓄争先捐献，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甚至乞丐，都尽力捐献。其热烈与感人的场面，令人难以忘怀，也使陈诚之流瞠目结舌。最后把群众所献财物折合现款，共计一百万元以上。

为了使这笔献金可靠地用于慰劳前方将士和赈济难民，第三厅派地下党员罗髻渔率领简泰梁、张肩重、程步高、陈泽民等筹建了全国慰劳总会。由陈诚任会长，马俊超和郭沫若任副会长。同时还成立一个全国寒衣委员会。这两个单位都直接由三厅领导。

“慰总”办的第一件大事，是向政府请准了二十万元的外汇，派阳翰笙、程步高和会计雷平一到香港采购了大批前方急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以及十辆大卡车。我们带着这批宝贵物资，绕道越南，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安全无损地运抵重庆^①。“慰总”迁重庆后，又为前方将士赶制了二十万套暑衣。接着又赶制了四十万套棉衣。这些任务，是在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的积极协助和各工会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完成的。这批寒衣分给了八路军五万套。

^① 这时政治部第三厅已迁到重庆，在重庆郊区赖家桥办公。

一九四〇年春，“慰总”又赶制了二十万顶蚊帐送到前线。

“慰总”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慰问活动。郭沫若等同志亲自带慰问团上前线慰问。

当时水上交通全被日寇阻断和封锁，而我国的各大战场又都在边远山区，因此我们与前线联系十分不便。自从“慰总”从香港买来十辆卡车以后，三厅都是用这些卡车运送宣传品和慰劳品；送演出队、慰问团、摄影记者、画家、作家上前线。因此，各种抗日宣传工作都更加活跃起来。

发动慰问信运动，成立战地文化服务处

三厅的文字宣传处拥有很多笔杆子。该处党小组的同志和胡愈之、张志让（皆“救国会”领导人）始终合作得很好，一切工作都是在一起商量着干。当时，国民党对文字宣传压制、封锁得很厉害。针对这种情况，文字宣传处向三厅领导建议，采取了两个措施，对冲破国民党的压制、封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措施是以“慰总”的名义在武汉三镇发动大规模的慰问信运动。这项工作由三厅文字宣传处负责。慰问信运动展开以后，有上百万封慰问信像潮水般涌到文字宣传处。为了防止汉奸、坏人利用慰问信搞反动宣传，文字宣传处的同志对每封信都要看（信都写得很动人，没有发现

坏人)，并且在每封信里都放进小小的慰问品。通过写慰问信，直接向前线广大官兵进行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和鼓舞士气的宣传，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成立战地文化服务处。由何公敢任处长，他是政治部的设计委员；三厅文字宣传处的地下党员刘明凡担任秘书。

战地文化服务处在长沙、宜昌、上饶、西安四个地方设了总站。每个总站在全省许多县城里又成立了战地文化服务站，这些“站”星罗棋布，形成了一个书报刊物发行网。三厅通过这个发行网，把各种宣传抗日的小册子和宣传材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去，送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和散发到广大的中小县城里去。国民党开始对这些小册子并未注意，但后来发现这是一股鼓动坚决抗战到底的力量，于是有的战区的顽固派就下令不准他们的军队接受这些宣传品，也不准地方邮局受理邮寄。但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些进步官兵，和我们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已经搞熟了，他们就自己跑到服务站来要。所以，尽管顽固派实行封锁，但这些宣传品仍然在国民党军队里和大小县城里广泛流传。

战地文化服务处还曾起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守以后，由于武汉形势日益紧张（武汉于十月沦陷），周恩来同志和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湖北省委，抓紧部署湖北省沦陷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准

备工作,主要是研究和整顿各地区的党组织,建立各区委、县委;并研究和确定哪些党员将转移到解放区或是撤退到长沙、重庆,哪些党员将留下来进行敌后斗争。为使各区各县留下的同志能以公开的身份在社会上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公开组织的名义作掩护。周恩来同志和湖北省委找来三厅特支组委刘季平,决定以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名义作掩护,对公开身份活动的同志,委以各地大小县城的战地文化服务站的站长或副站长。整整一个月,每天晚上开会研究。然后刘季平同志把研究决定的名单带回来,由刘明凡同志背着何公敢连夜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名义写好委任状,盖上公章,第二天由刘季平带去交给湖北省委。这件事情在当时是绝密的,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后来,新四军第五师迅猛发展起来,和这一重要部署是有密切关系的。

国 际 宣 传

三厅集中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和擅长日语、英语、俄语、世界语的人才。

三厅的国际宣传工作,以研究日本情况和对日宣传为重点。由一位精通日语的同志,每天监听日本电台抄写情报资料,分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后来是重庆办事处)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另外一些同志,则专门从由香港转来的日本报纸和杂志上,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各方面问题。他们编的内部资料《敌情研究》，也是送到办事处等单位，很受重视。此外，编写日语宣传品也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自一九三八年三厅成立到一九四〇年，平均每月有一至二次用飞机在 frontline 散发日语宣传品和投降通行证，号召日本士兵起义。还曾用飞机将日语传单载到东京上空散发，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战，引起了很大震动。

在武汉时期，三厅左派的英语人材还很少，但却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叶君健同志，当时只要是进步的国际友人来到武汉，或是途经武汉到延安去参观访问，都是由他作翻译。当时，外国记者云集武汉，通用英语。宋美龄主管的国民党对外宣传部门，向他们提供中央通讯社的英语新闻资料，三厅国际宣传处则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英语新闻资料，斗争很尖锐。国民党有印刷条件，我们没有，国际宣传处的几位同志就自己打字印发，然而我们的资料却比国民党的更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武汉时期国民党每周分给我们两次到三次对外英语广播时间，所以国际宣传处的同志还要忙于写英语广播稿，自己去广播。三厅撤到重庆后，国统区的英语对外宣传被国民党垄断。三厅国际宣传处就全力搞日语和世界语的对外宣传。

三厅搞世界语的总共只有叶籁士、乐嘉煊等四、五个人。三厅在武汉时期无印刷条件，完全靠自己打字印发世界语资料。后来到重庆在赖家桥建立了一个简陋的排字房

和印刷厂，于是搞世界语的几位同志就办起了一个定期的世界语杂志《中国报导》半月刊。每期印五、六千份至八、九千份，自己发行，寄给四、五十个国家的世界语组织和个人，宣传中国的抗日情况，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当时，全世界许多人对中国遭到日本侵略虽然都十分同情，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国际上盛行着“中国必然灭亡”的论调。因此当有人收到寄自中国的杂志时，非常高兴，特别是《中国报导》及时地节译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大大鼓舞了国际友人们的信心，产生了积极的政治作用。懂世界语的人，在每个国家虽然不多，但却几乎遍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他们收到我们的世界语杂志，就立即翻译成本国文字进行传播，产生了很好的、广泛的影响。

艺术宣传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几乎人人都唱抗日救亡歌曲。三厅的音乐家们组织和领导了整个武汉三镇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这个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冼星海和沙梅等人早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就组织了“全国抗敌歌咏协会”。后冼星海、张曙、沙梅等人又办了一个歌咏训练班，教基本乐理、歌曲作法和指挥。为抗战培养了一批新音乐工作者。星海的脍炙人口的抗日群众歌曲（不是指大合唱）几乎都是在三厅武汉时期写的。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三厅的美术家真可谓人才济济。倪

貽德、李可染、罗工柳、力群、沈同衡等许多人都创造了很多蔚为壮观、独出心裁的宣传鼓动杰作。他们还就地取材，创造了巨幅“布画”和布画连环画，张挂起来，配合宣传队宣讲，极受群众欢迎。

三厅美术科还有一个由叶浅予任队长、张乐平任副队长的漫画宣传队。在抗战时期，漫画是美术中最活跃、最富有战斗性的。他们画的漫画、宣传画、连环画，广为散发。从城市、乡村到部队都能看到他们画的辛辣讽刺、寓意深刻的漫画宣传品，对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斗志起了很大作用。国民党顽固派对第三厅组织和开展的艺术宣传感到十分棘手，于是企图利用成立“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来束缚和排斥进步的美术工作者。这个“美协”的幕后人是张道藩，操实际大权的是国民党行政院秘书汪日章。当时为了避免分裂，许多进步的美术家勉强地加入了这个协会。但没过几天，这些同志就成立了自己的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这两个协会都是全国性（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组织。它们的成员在政治倾向、艺术思想上并非完全一致，但革命的、进步的力量占主导地位。三厅的漫画家和木刻家都是这两个协会的骨干。这两个协会成立后，就肩负起了团结一切爱国民主画家从事抗战宣传工作的任务。

三厅的戏剧队伍，是由田汉负责领导的，拥有很多人才。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

第一，派话剧团奔赴前线演出鼓舞士气。年轻有为的赵曙同志，就是在徐州失守突围时中敌弹牺牲的。

第二，推动话剧宣传运动。阳翰笙、田汉、洪深都写出了抗战题材的话剧。业余剧团不断要求三厅派人辅导，洪深、应云卫、马彦祥这些名导演十分忙碌。张光年还给第一纱厂的工人业余剧团进行了辅导。田汉主编了《抗战戏剧》杂志。

第三，大力进行戏曲改革。为帮助各地方剧种改革，使它们能演出鼓舞民心士气的戏曲，精通戏曲的洪深、石凌鹤、马彦祥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田汉，他创建了平剧、湘剧两个“实验宣传队”，并亲自率领这两个队到长沙、衡阳、桂林一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田汉和大家同甘共苦，源源不绝地创作出新型的戏曲作品，有《土桥之战》、《新雁门关》、《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共三集）、《岳飞》（共两集）、《双忠记》等十多部大戏，还有十多部小戏；创作了《怒吼吧，漓江》戏曲活报剧，还有许多平剧活报剧。他为我国的戏曲改革铺垫了一块又一块基石。

第四，团结、教育、组织了大批戏曲演员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三厅成立后，周恩来同志特别提出要重视对地方戏曲艺人的了解和团结、支持和帮助，并指示配备管理戏曲工作的专职人员。这是国统区的戏曲艺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受到重视。

三厅举办的“战时歌剧演员讲习班”，由郭沫若任班主任。有十多个剧种、曲艺、杂技团体的九百多名艺人参加了讲习班。他们经过近三个月的学习，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获得了某些新的戏剧艺术知识。在结业典礼上，学员们发出了“坚决不替敌人歌舞升平”，“坚决为民族存正气、与抗战共始终”的庄严誓言。讲习班结业时，发了由李可染设计绘制的毕业证书，每张都有郭沫若亲笔签名。许多艺人至今还珍藏着这份证书。

这时武汉已经吃紧，周恩来同志特地通知郭沫若邀请一些主要戏曲演员在汉口邦可花园开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向大家说：“在强大的日本军阀面前，我们打的是一场持久战，即使武汉作了战略性的转移，我们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他还说：“第三厅组建的抗敌演剧队，是要到战区去、到前线去的。希望地方戏剧团体在大后方把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担负起来。这是全民族抗战的需要，也是我们对民族、对子孙应尽的责任。”会后有上千人报名，要求撤退。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绝不给敌人演戏！”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民间地方戏曲艺人的大转移开始了。仅楚剧和汉剧就有十六个队，几乎包括全部知名演员，统统撤离了武汉。

第三厅为支持地方剧团撤退，用三厅的名义将民间剧团组建为流动宣传队，并签发了番号、军用护照和补助了旅费，帮助他们全部撤退到湘鄂边境和川滇黔地区进行抗

日宣传的演出。这些民间剧团一直苦苦坚持到抗战胜利才还乡。

中国 电 影 制 片 厂

第三厅成立后，原属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的电影股改组扩充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归三厅艺术宣传处领导。阳翰笙兼任“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厅又将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调进了“中制”，从而使进步势力在“中制”占了统治地位。

自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一九四〇年十月第三厅“改组”后^①，“中制”总共拍了十一部故事片和几十部新闻纪录片。其中，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和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曾在纽约、菲律宾、缅甸以及法国和瑞士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放映，反响强烈。武汉时期拍的几十集《抗战特集》，不仅在国内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苏联、美国、英国、新加坡、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地都上映过这部片子。其中有的新闻素材，被美国各影片公司所采用；很多英国观众看完以后，自动捐款支援中国抗战。

^① 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控制三厅，罢免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委任以挂名的部务委员；任命国民党党棍何浩若为三厅厅长；并勒令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三厅人员愤而提出集体辞职以示抗议，退出了三厅。详情见后。

一九三九年《塞上风云》摄制组去塞北拍外景途经延安时，受到延安文艺界欢迎。全体成员参观了延安，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因为这是一部表现蒙汉民族团结抗日的影片，于是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多方阻挠和破坏，他们将有些拍好了的外景拷贝毁掉了。一直到一九四二年，经过力争，该片才得以放映。反映东北抗联活动，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影片《日本间谍》，更是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篡改和删剪。甚至蒋介石亲自出马，派蒋纬国坐镇，勒令将已经公映的片中的东北义勇军，都改成穿国民党军官学校学生制服，把影片搞得面目全非。

一九四〇年十月，蒋介石命令改组三厅后不久，国民党解除了阳翰笙“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同时借口器材来源缺乏，取消了一系列进步抗战影片的摄制计划。这样，“中制”实际上陷于停顿。为了适应新形势，大部分进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戏剧战线，开展了话剧运动。一部分电影工作者，根据党的指示远赴香港，继续开展抗战影片的拍摄工作。

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

第三厅成立后不久，就着手建立了十个演剧队和四个宣传队，准备分赴十个战区的前线。成员是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和被国民党强迫解散的“青救”、“民先”几个最有影响的救亡团体成员中选拔的。

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谆谆告诫全体队员：“要坚持艺术为政治服务，为抗战服务。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口味，你们要入乡随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宣传的预期效果。你们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除了演戏，还要做许多工作。”

这十四个队成立以后，加上“孩子剧团”一起进行了短期集训。由郭沫若、胡愈之、田汉、洪深、石凌鹤、马彦祥、应云卫讲课。各队在集训结束分赴各战区前线之前，周恩来同志亲自给他们作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周恩来同志亲自制订十四个队分赴各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有的路线，他亲自布置地方游击队或八路军部队接应和护送。孩子剧团因为年龄小，留在后方流动。

为了加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以利于深入战地展开抗日宣传工作，三厅派演剧一队到张发奎所属第二方面军总部，由洪深亲自带队前往。演剧三队由张光年带领到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西北二战区去。

周恩来同志和三厅党组织，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名义组织和派遣演剧队和宣传队到各个战区前线去，到国民党军队中去，这是巧妙地利用合法手段突破国民党的禁区，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方针的重要途径。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宣传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的一项重大措施。周恩来同志给各演剧队党的秘密组织的指示是：“随军行动，深入前线，向战地军民宣传党的主

张，占领文化宣传阵地，坚持原则立场，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合法身份，争取自主条件，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各演剧队在国民党统治区机智顽强地展开了抗日宣传，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抗日宣传斗争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各演剧队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坚持了人事自主权。各战区无权撤换演剧队、宣传队的正副队长；队员的去留由队务会议讨论通过，无需上报。这些措施，是周恩来同志严格执行我党在国共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具体表现。

抗敌演剧队、宣传队成立之初，就在各个队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或党小组，个别未建立党组织的队，选派秘密党员任指导员随队工作。各队党组织或指导员，直接与第三厅特别支部联系。四个宣传队的党组织，由第五处的徐步负责。演剧三队派到大西北二战区工作，离延安近，为了便于和组织联系，三队的组织关系从武汉转到延安中央组织部，编为直属中组部的特别支部。在各队分赴各战区之前，周恩来同志召见了各队党组织负责人，他说，如遇重大问题，可以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向他汇报请示。武汉撤退前，他把各队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要他们指定专人和各队的党组织负责人联系。李克农、夏衍和李亚群等同志都曾负责过演剧队的组织联系工作。

在演剧队成立后的十一年间，周恩来同志对演剧队的

领导和关注从未间断过。每逢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他总是派专人或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向演剧队的党组织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每遇关键时刻，他都直接给予指示，并亲自领导演剧队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继续进行斗争。三厅“改组”后，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当了三厅厅长，三厅落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中。但是抗敌演剧队的编制仍属三厅，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把他们的人派进演剧队，但各队用种种办法进行了抵制，即使有的队里派了人进去，也被挤出来或是受到孤立。演剧队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始终贯彻党对演剧队的坚强领导，所以尽管处境艰难，被包围在蒋介石反动派限共、溶共、反共的险恶环境之中，但队员除了个别人以外，他们既没有被压垮，更没有被溶掉，而是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始终立场坚定地坚持战斗。演剧队不但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光荣任务，而且也使自己锻炼成了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国民党对第三厅的迫害

蒋介石虽然被迫抗日，也口头承认共产党合法，但他真正想的是消灭中国共产党。日寇占领武汉以后，开始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而把军事重心指向八路军、新四军的新战略。日寇发表宣言和声明，一再公开要求和蒋介石一起反共、反苏。蒋介石虽然没有象汪精

卫那样公开投降，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却制定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从此，蒋介石就毫不掩饰地搞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勾当，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

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厅，夹在国民党的政府机构里。虽然不断受到蒋介石反动派的挤压、刁难和破坏，但是由于党的工作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思想已普遍深入到国统区的人民群众中去，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仍在蓬勃开展。

第三厅的工作越有成绩，蒋介石就越感到不舒服。开始时，他以为第三厅可以为他装璜门面，宣传他这位“抗战领袖”，但是随着第三厅工作的展开，他越来越感到这是扎在他内脏里的一颗钉子，于是想方设法把它除掉。从一九三九年起，蒋介石对第三厅的迫害，日益加深。

首先，由陈诚亲自出面，将三厅赖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十辆卡车夺去。然后，陈诚和谷正纲又阴谋策划用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将全国慰劳总会和全国寒衣委员会从三厅夺走。与此同时，他们在各地逮捕、监禁三厅所属演剧队、宣传队的队员，对各地的战地文化服务站加以压制、捣毁；甚至对三厅派到前线去放映抗战电影的放映队，也横加迫害。到一九四〇年夏，蒋介石强令取消了战地文化服

务处。他妄想把三厅在国民党军队、地方和人民群众中的各种组织和机构统统搞掉。

蒋介石对三厅人员步步紧逼，采取“溶共政策”，先后三次逼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底。当时三厅的同志都还分散在撤往桂林途中，国民党要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由于大家不予理睬，国民党的阴谋未能得逞。

第二次是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当时周恩来同志暂时离开了重庆，郭沫若也正好回乐山奔丧。陈诚、贺衷寒、张励生便再次策划要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我得此消息后，立即派人到乐山请郭沫若火速返渝，同时和冯乃超一起到南方局汇报。和我们谈话的是博古同志（当时他是南方局的组织部长），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十分气愤。我说：

“三厅绝大多数人都坚决不愿意加入国民党，是不是我们就撤出三厅？”博古迟疑了一下说：“三厅的工作是周恩来同志管，现在他不在，这个问题，要等他回来以后才能决定。”我问：“不撤怎么办？”博古激动地说：“不撤困难当然很多，但你们要顶住！就是死，也要死在这个岗位上！”我们回答说：“好！就这样办！”

一天深夜，新提升为政治部秘书长的贺衷寒，率领了一、二十个喽罗，突然来搜查三厅存放宣传品的堆栈，把一捆捆书报翻得个铺天盖地。我一听说这个情况，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抓三厅的辫子，要向三厅开刀。我便

气冲冲地找到贺衷寒，提出质问：“你们要搜查，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起去搜查？如果有坏人借搜查之名塞些什么东西进来诬陷三厅，怎么办？三厅从武汉到现在为抗战作了许多工作，不辞辛劳，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你们竟这样对待我们，还要不要抗战？”贺衷寒支支吾吾，十分尴尬。

这时郭沫若赶回来了。他听到这些情况后，气愤地提出辞职以示抗议。由于三厅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国民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不便于公开搞三厅，所以没有批准郭沫若辞职。于是强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就暂时不提了。

第三次是在一九四〇年八月。蒋介石反动派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让他当一个挂名的部务委员；派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任三厅厅长。同时又第三次逼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蒋介石亲自下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这是蒋介石肆无忌惮地公然大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政。国民党反动派以蒋的手谕下最后通牒，声称：“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他们在赖家桥三厅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摆上一张填写加入国民党的表格，并对许多人进行威胁利诱。但是三厅人员中的进步人士（占绝大多数）都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某副厅长气焰嚣张，竟召开全体动员大会，在会上以威胁性的口吻说：

“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要留在三厅，就必须

加入国民党！”郭沫若气愤填膺，立刻站起来严正抗议。他针锋相对、慷慨激昂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而且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郭沫若这几句响当当的誓言，至今同志们记忆犹新，被誉为“金刚矢志，坚似金刚”。当时郭老的言行，极大地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的斗志，随即大家也纷纷提出辞职。

郭沫若在大会上誓毕，就在会场摆开书画台，挥笔题赠诸同志。他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与诸同志告别，大有“易水寒”的气概。

在三厅的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是进步人士，他们宁愿受着失业和政治迫害的威胁，也绝不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与之同流合污。如翁泽永是陈布雷的外甥，他不顾各方面的压力，一再拒绝了张治中和何浩若对他的利诱，坚决追随郭沫若。有的民主人士拖儿带女，家累很重，也毫不迟疑地提出了辞职。他们这种坚持真理，坚持进步，坚持革命，不怕个人牺牲的精神，使我们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退出第三厅，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

周恩来同志返渝听了我们的汇报后，指示我们要先沉住气，随即去找新上任的政治部长张治中晤谈。张治中曾问周恩来同志：三厅哪些人是共产党员？他一一点名问郭沫

若、阳翰笙、田汉、杜国庠、冯乃超是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笑着回答说：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文化人。但是他们拥护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抗日，如果国民党抗日，他们也一样拥护国民党。三厅只有一位女演员陈波儿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位学电影技术的钱筱璋是共产党员。我已经将他们撤回延安了。三厅这些人都是有名的文化人，都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居然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请你借几辆卡车让我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张治中一听，感到事情严重，连忙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这事情还要好好商量一下。

没隔几天，蒋介石突然召见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田汉及“慰总”的总干事简泰梁。蒋介石假心假意地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我们表示：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蒋介石说：我们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郭先生主持。详细情况由李维果同你们诸位商谈。

李维果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我们到了外面会客室，他说：诸公都是学问渊博的知名人士。委员长的意思，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其宗旨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现在研究工作也很重要，仍然请郭先生主持，请诸公参加。这样也就是离厅不离部嘛！

这显然又是蒋介石的羁縻政策了。蒋介石知道，如果

这一批人真的到延安去了，不但他面上无光，反而给共产党增加了威望。于是，他变换花招要我们搞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挽回面子，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束缚我们的手脚，不让我们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我们回答说：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搞研究工作的，在朝在野一样可以抗战。现在委员长要我们参加另外一个机构，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回来以后，我们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情况，并说：“蒋介石分明要把我们圈起来，怕我们去延安，你看怎么办？”周恩来同志说：“就答应他吧！他划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大家认真地研究以后，决定答应蒋介石。

就这样，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机智灵活而又坚持原则的领导下，退出三厅之后，又建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斗争。

文工会更扩大了文化界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文化工作委员会（下简称文工会）时期的斗争，是第三厅斗争的继续。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文工会斗争的任务、重心、策略都具有新的特点。文工会是学术研究性团体，不是政权机构，在行政关系上已不能领导剧团、宣传队和演剧队，不可能再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的工

作。但是我们却可以利用这个机构继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政策，贯彻我党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的方针。继续利用合法斗争，团结爱国、进步的文化力量，扩大党的影响，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进行活动。周恩来同志鼓励我们说：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吗？中共南方局通过组织讨论和磋商等方式，用上述策略思想武装了文工会的干部和左派朋友们。

一九四〇年夏秋之际，我们开始筹建文工会。文工会于十月开始工作；十二月七日在抗建堂举行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宣布正式成立。

文工会的主任委员为郭沫若，副主任委员为阳翰笙、谢仁钊（是国民党派来监视的）。十名专任委员为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休、翦伯赞、胡风、姚蓬子；十名兼任委员为舒舍予（即老舍）、吕霞光、张志让、邓初民、侯外庐、卢于道、马宗融、黎东方、王昆仑、吕振羽。文工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组长为蔡馥生；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组长为田汉，田汉到西南工作后，由石凌鹤代理；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组长为冯乃超。在文工会的委员、研究人员、工作人员中，除了保存第三厅时期的骨干外，还包容了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如著名作家沈雁冰、舒舍予，

历史学家翦伯赞、邓初民，自然科学家卢于道，“七月派”文艺家胡风，国民党方面作家姚蓬子等，比第三厅更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在文工会内，党的组织和第三厅时期一样，分为领导干部小组和基层支部两部分。领导干部党小组的成员为：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等人。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基层支部由冯乃超负责，还有张光年、臧云远等人。由于斗争形势恶化，一般实行单线联系。

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硕果累累

文工会的工作可以分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社会活动三个方面。从学术研究来说，文工会是一个新型的学术研究机构。在各专任委员、兼任委员和各组人员中，有历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音乐家、美术家、电影艺术家等等，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被人们称为“齐之稷下”。这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在国统区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或著书立说，或讲学论争，或从事文艺创作，在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工会的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有着鲜明的特点：同志们能自觉运用先进的世界观去研究问题、指导创作，因而在文史研究和文艺创作方面有新的建树和开拓；他们学风严肃，注重联系实际。

文工会的历史学家们，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

发，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必胜前途。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还有文工会委员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都是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的著作，各具特色。一九四三年三月，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深刻总结了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战斗性，为毛泽东同志所称赞，并被中央列入整风学习文献中。在哲学研究方面，杜国庠写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都是很重要的著作，尤其是他对冯友兰先生的《新原人》的批判，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原则精神。

文艺创作也是硕果累累。郭沫若的《屈原》、《虎符》等五个剧本就是在文工会写的，他还写了《沸羹集》、《天地玄黄》两部文艺论文集。

田汉在桂林写了话剧《秋声赋》、《风雨归舟》等；石凌鹤写了话剧《乐园进行曲》等。我在重庆时期的创作有《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四个话剧和《塞上风云》等三部电影。美术、音乐方面的同志也有很多好的作品，特别是漫画和木刻，利用辛辣讽刺的表现手法，具有高度的战斗性。这些文艺创作，大多是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蔡仪的《新美学》、文工会委员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都是很受群众欢迎的著作。

此外，文工会的同志继续编译《国际问题资料》、《敌情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文工会内部十分重视自我教育，提倡切磋学问、砥砺品节。当时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政治上国民党又实行专制高压，周恩来同志多次强调“在革命退潮时保存实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据此，我们提出“多研究、多学习、多写作”的口号。可以说，文工会为革命文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坚强的骨干。

跳出圈圈以学术活动、文化 活动的方式进行斗争

我们还以个人名义到社会上进行学术文化活动，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加强统战工作。如郭沫若同志的住处天官府四号，就成了重庆进步人士、民主党派交换意见的场所。各方面代表人物，各地的文化人士络绎不绝地出入郭府，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也是这里的常客。大家在一起分析形势，交换意见，很自然地就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文工会经常举办各种讲座、演讲会、报告会，以学术活动的方式联系群众、宣传群众、鼓动群众。主讲人都是著名的学者、专家。如郭沫若开的“古代社会讲座”和关于文艺问题的演讲，邓初民讲的“清国政治史”，翦伯赞

开的“新史学讲座”，冯玉祥讲三国故事，张志让、潘念之讲国际形势，老舍讲小说，田汉讲戏剧，贺绿汀讲音乐等。请来主讲的还有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张澜、张友渔（当时未公开党籍）、王芸生，国民党左派人士冯玉祥、邵力子、王昆仑等，深受大家欢迎。常常因为人多座位不够，而要临时加座或更换会场。特别是针对时局的演讲，例如邓初民讲《团结》，讲者激昂慷慨，听者热血沸腾。气氛之热烈，令人至今难忘。我们还通过时事座谈会的形式，驳斥国民党的反动谬论，获得很好的效果。

由于国民党的限制，文工会没有办成自己的刊物。文工会的同志除了在《新华日报》发表一些文章外，在《新蜀报》有文工会的同志负责主编《国际问题周刊》和《七天文艺》；在《新民报》和其它报刊上，文工会的同志亦发表了许多文章。叶籁士等同志办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向全世界报导了我国艰苦抗战的情况，取得了世界人民和爱国侨胞的同情与支持。

文工会作为学术机构不能直接领导群众团体，但在南方局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却和“中苏文协”、“抗敌文协”互相配合开展工作。在“中苏文协”主持实际工作的王昆仑、刘仲容、侯外庐、屈武、许宝驹等，“抗敌文协”的实际主持人老舍、罗荪、丰村、梅林等，在斗争中和我们完全能保持默契，配合得很好。由于在三厅时期，我们许多同志和各种文艺团体就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到文工会

时这些有威望的作家、艺术家仍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南方局主要是通过文工会来领导国统区的抗日文艺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企图和我们争夺中间群众，争夺文艺界的领导权，破坏抗日的群众文艺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张道藩、潘公展、王平陵等是一些反共老手，有相当的政治经验，他们既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本旨，又不肯拉下假面具，对我们采取敷衍、欺骗、磨擦、压制的手段。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我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我们对他们举行的一般性呼吁抗日的庆祝会、纪念会，就同他们合作，并注意保持自己的主动；对其有投降、反共倾向的活动，就坚决抵制、反对。同时我们自己也举行各种活动，如纪念鲁迅逝世时，强调不屈的斗争精神，纪念孙中山、钱亦石逝世时，宣传联苏、联共的政策；给苏美发通电，谴责国际法西斯和各国反动派。我们还通过发表文章、组织座谈和总结一年文艺工作等方式，提出对未来形势的展望，发挥了指导文艺运动的作用。

从文工会成立起，我们就处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包围之中。在城区天官府七号和乡间赖家桥两处会址附近，都有特务的据点；文工会内部也有敌人安插的特务。那个所谓的“鲁迅研究专家”荆有麟就是特务（解放以后荆有麟被查获，搜出电台，被处决）。但我们巧妙地进行了斗争和防范。

“皖南事变”以后新的斗争方式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何应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山城重庆，为法西斯白色恐怖所笼罩。新华日报社、红岩村、曾家岩五十号都处在武装特务监视之下，街上到处都是便衣、巡警。面临这样严酷的形势，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周恩来同志当即向何应钦严辞抗议，并领导《新华日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的滔天罪行，发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谴责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挫败敌人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同时，南方局提出为了防止“四·一二”事变重演，强调要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党内外骨干中进行斗争形势教育和气节教育，同时有计划地迅速转移力量，以防遭受严重损失。

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保护文化界革命同志和朋友的工作。党组织经过周密考虑，决定欧阳凡海、林默涵、刘白羽等一些同志回延安；田汉、光未然、石凌鹤、贺绿汀、徐步等一些同志去昆明；夏衍、柳亚子、杜国庠、叶籁士、宋之的、章泯、舒强等不少同志去香港。至于我自己，恩来同志则让我回川南家乡隐蔽一个时期。

一九四一年夏，周恩来同志又领导我们重新部署力量，

向反动派进行回击。十一月十六日，文工会和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发起的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活动，就是周恩来同志创造的一种斗争方式，意在冲破敌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包括了文化界、新闻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无党派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国民党左派人士等，体现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纪念活动热烈盛大，宣传报导达到空前规模。在党组织统一部署下，延安、成都、桂林、昆明、香港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各地报刊发表纪念文章达半年之久，影响十分广泛。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冲破了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喊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正义呼声；各种爱国进步力量团结一致，表明了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

通过这次庆祝活动，我们在禁止群众集会的国统区找到了一种扩大影响、团结战斗的方式。此后，我们又为沈钧儒、茅盾、冯玉祥、老舍、洪深作生日或进行创作纪念活动，借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歌颂不畏强暴、坚持原则的政治品格，提倡讲大局、求团结、抗战到底。

以戏剧为突破口， 反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皖南事变”以后，为了避开敌人的“刀锋”，我党

有计划地从重庆转移了大批同志。我在川南老家隐蔽了两个多月之后，又回到了重庆。这时的重庆在蒋介石高压政策之下一片阴森沉寂。我一直怀着悲愤的心情在考虑：蒋介石屠杀我新四军，我们在这里也得想个办法对他进行反击。当我了解到戏剧界有些朋友有演戏的愿望，我就产生了用戏剧来反击蒋介石同室操戈和法西斯专政的想法。这就需要写出新的剧本，需要组织一个新的剧团（因为现有的剧团都从属于官方的电影厂或机构）。周恩来同志十分赞同和重视这个想法和计划。于是，在郭沫若和戏剧界一些老朋友的支持下，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于十月份成立了以名导演应云卫为社长的中华剧艺社。

鉴于政治环境的恶劣和经济条件的艰难，中华剧艺社的基本队伍只有三十人左右；其他演职员都作为业余参加，不脱离自己的原单位，这样工作比较灵活主动。剧社成立后打头炮的戏是《大地回春》（陈白尘著）。继而演出了《天国春秋》，该剧明显是针对蒋介石的同室操戈和独裁的。为了避免国民党的注意，周恩来同志指示不要在报上宣传。然而观众是敏感的，《天》剧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热烈的反响。连演二十五场，几乎场场暴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九四二年四月，中华剧艺社又以第一流的阵容演出了郭沫若的巨作《屈原》，犹如万钧雷霆，爆发出人民群众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愤怒，轰动了整个山城。许多观众，为了买到戏票，头天晚上搬着铺盖排队等候。大

学生们步行几十里进城看戏，晚上坐在观众席上过夜。后来中华剧艺社又演出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等。“中万”^①、“中青”^②、“中电”^③、孩子剧团以及后来夏衍领导的“中术”^④也相继演出了《升官图》、《两面人》等等揭露蒋家王朝的戏。在短短三、四年内，仅在重庆上演的新创作的大型话剧就有四十多个，掀起了戏剧运动空前未有的高潮。这时重庆整个戏剧界几乎都控制在我们手里，连三青团的剧团导演也是我们的人（马彦祥，他提出的应聘条件：他不同意的剧目他不排）。

强大的戏剧攻势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到处派特务捣乱、破坏；猛加苛捐杂税；加紧扼杀上演和出版自由的措施。他们将郭沫若、阳翰笙、夏衍、于伶、陈白尘、田汉、石凌鹤等许多人写的一百六十多个剧本，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禁止上演和出版。一九四三年潘公展又亲自挂帅主管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此以前，审查委员会里有我们的朋友吴茂荪，他为了使有的剧本能获准上演，明着大加删改，暗地向我们打招呼，让我们在台上照原样演出。）这时，我们在重庆活动就更加困难了。党组

① “中万”是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中国万岁剧团”的简称。

② “中青”是青年艺术剧社的简称。

③ “中电”是中央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简称。

④ “中术”是夏衍同志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的简称。

织决定转移力量。周恩来同志指示起带头骨干作用的中华剧艺社离开重庆到成都、川西一带中小城市去演出。昆明和桂林在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人的领导下，早已蓬蓬勃勃地展开了戏剧活动。当蒋介石反动派在重庆大加绞杀戏剧运动时，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桂林举行了西南剧展，有八个省的二十六个团体，一千多人参加，演出了好几十台戏。检阅了力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南方局领导下又一个斗争胜利的战场。

我们在重庆则发动争取民主的舆论攻势，揭露当局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的黑幕，致使潘公展及其审查机构声名狼籍。一九四四年潘公展又拉起了一个“中国著作人协会”。我和郭沫若、夏衍、洪深等事先商量了对策，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三项议案，要求重新审查被禁的一百多种剧本；要求废除剧本演出审查等等，在讲台上进行了说理斗争，揭露和谴责了当局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的反动措施。争取了一些中间作家随同我们一起退出了会场。

另外，我还应该提一下，我们党利用文工会这个合法学术机构掩护和埋伏了我们党的一些同志，保护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在中共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文工会成为国统区的一个革命文化基地。许多同志美称它是“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

文工会在战斗中结束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志自延安返回重庆，代表中共中央对时局发表了纲领性的谈话，提出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活动、保障人民权益、停止内战、承认解放区和抗日军队等一系列主张。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宣言，一时造成强大声势。我们根据南方局王若飞同志的建议，郭沫若、冯乃超、杜国庠和我，按照党中央的精神讨论拟定了六条提纲，由郭沫若执笔，写成《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宣言中要求国民政府“改弦易辙”、“及早实行民主”、“结束党治，还政于民”。要求召开党派会议，“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使人民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取消一切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枪口一致对外”等等。我们决定以秘密方式发起签名运动，郭沫若和我以及文工会所有领导干部都投入这项工作，四处奔走。二月二十三日，《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有三百多位文化界代表人物签名，其中不仅包括了在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还包括了不少中间的文化人士。显示了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威力。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当他们的特务追查出文工会是这次签名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时，蒋介石暴跳如

雷，下令立刻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招，我们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我们研究决定文工会以战斗的姿态结束，以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扩大统一战线力量，促进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同时，尽可能妥善地安排好文工会工作人员，保护革命力量。四月一日晚，文工会招待重庆新闻界、文化界和民主党派的代表及国际友人，宣布文工会解散。四月八日，重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沈钧儒为首设宴慰问郭沫若和文工会全体人员。在这两次会上，各方面进步人士热情赞扬了郭沫若和文工会的贡献，控诉了反动派摧残文化、绞杀民主的罪行。重庆市的许多进步青年、爱国人士纷纷到文工会致意。延安、香港、昆明、桂林、成都等地的文化团体，都来电来信对郭沫若和文工会工作人员表示敬意和慰问，并进一步提出民主自由的要求。文工会就这样以战斗的姿态结束了，在国统区人民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第三厅到文工会，经历了七个年头。在长江局、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第三厅和文工会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而且团结了国统区整个文化艺术界，不畏白色恐怖，对蒋介石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不久，抗战胜利，我们又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投入到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去，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香港《经济导报》 的创刊及其活动

赵元浩 雷起予 林 铃 方卓芬

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国内和平局面被彻底破坏了。这时上海中共代表团领导的上海工作委员会（党内组织）的工作，向香港转移，一部分同志到香港开展工作。在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下简称港工委）领导下成立了财经委员会（下简称财经委，书记许涤新）。财经委的任务，除管理财务工作外，并对工商界进行统战工作。为了开展统战工作，需要建立一个宣传机构，香港《经济导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的。这个刊物，直到现在还在香港继续出版。本文所介绍的只是《经济导报》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三年的情况。

一、《经济导报》概况

香港《经济导报》（周刊）创办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它是由赵元浩、陈文川、林铃等同志发起，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开始筹办，经港工委（港工委在中共香港分局设立后，

成为分局属下的一部分)批准出版的。《经济导报》直接归港工委的财经委领导。当时,党组织通过这个刊物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勾通各地经济消息;研究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动态;特别是和香港市场关系密切的东南亚市场;报导与分析国内外的经济情况,以便争取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和我们合作。

《经济导报》是白手起家的。筹办之初一无所有,资金依靠自己去筹措,采取认股的方式,每百元港币为一股。同志们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请工商界的朋友认股。最后,共有二十三位进步人士认了股,其中出资最多的是李启辉先生,出了二千元港币。李启辉先生大力支持我们,真诚和我们合作,所以由他任《经济导报》的督印人,并对香港政府负法律责任。当我们筹到一万元股份时,就向港政府登记注册,缴纳三千元保证金,并在香港乍畏街一〇三号租到一层不到五十平方米的破旧三楼作办公室。后搬到大道中七十八号二楼,以后又迁乍畏街一〇二号四楼。

《经济导报》创建初期,总编辑先后为赵元浩、陈文川,记者和编务工作人员有孙孺、麦扬(当时叫麦克明)杨文炎、袁式邦、英冰若、袁大顿(河卓)等人,经理林铃,发行陈展谟、助编梁兴尧,行政梁东蒲,会计林润渠。后来陆续来了雷起予、容若思、梁建平、谭永柏、龙克明、黎裘、邱陵、陈伯钧(陌军)、黎仕英、林南岳、谢一锋、吴郁友、钟杰明、赵元铭、陈燕然、李少雄等

人。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工作人员从十多人发展到三十人左右，蔡北华、古念良先后主持了编辑工作，重要问题由财经委召集赵元浩、陈文川等同志开会讨论决定。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后，赵元浩、陈文川、孙孺、林铃等同志相继离开香港，回国内参加工作。编辑部由杨文炎负责，陈展谟任经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

《经济导报》是面向香港，面向南洋的刊物。它的编辑方针是：坚持爱国进步立场，避免浓厚的政治色彩，并请一些专家和学者撰稿。当时许涤新等同志曾用化名为“导报”写文章，章汉夫同志、马寅初老先生和陶大镛教授等都为“导报”写过文章。为了适合香港工商界的要求，打开销路，“导报”还要迅速反映和分析香港的金融、股票、贸易及工商业的动态和趋势。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导报”在出版周刊的同时，每日出版香港标准行情。编辑和记者广泛接触工商界，和进步及中间派的人士交朋友，报道他们的业务消息，为他们作广告，这样就把“导报”办得颇具特色。

当时在香港的客观条件下，要创办一个刊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印刷费用昂贵，房租又高，如果销路和广告打不开局面，支持不到半年就得关门。但在“导报”工作的同志们，兢兢业业，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当时每个工作人员既是作者，又是推销员和广告员。为了节约资金，“导报”内部规定：“凡在其它工作岗位已有工

资收入的，一律不发薪水或津贴（稿费除外），专职的则发较低工资或津贴费。”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一律港币五十元，仅够维持起码的生活。并规定每人每月要与一篇不拿稿费的文章，以支持办刊。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导报”的销路打开了，有一部分还远销到东南亚一带和美国。经过大家的努力，“导报”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赢得了信誉，在克服困难中前进了。

二、在新闻战线上展开对敌斗争

《经济导报》创办后，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对外大举借债，对内滥发通货，掠夺人民的反动政策；报道了物价飞涨，生产萎缩，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情况。仅在一九四七年，就刊出《大额关金券发行以后》（第5、6期）、《美金库券公债的发行》（第15期）、《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实施后香港市场的反应》（第9期）、《沪穗物价涨风》（第42期）、《五万元大钞与改革币制》（第44期）等文章。这年冬天，为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进行内战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又刊出了《评经济戡乱的重要措施》（社论，第49期）、《十万元大钞也发出了》（第50期）、《为什么统制花纱布呢？》等短评，并在“一周述评”中突出了这些方面的评述。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所谓《金融改革方案》，当“金元券”发行以后，《经济导报》立

即和有关各报的经济版，以大量篇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掠夺的事实，并对其反动政策进行抨击。除此而外，我们还组织了各种有代表性的座谈会，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批评与揭露，并组织了一些文章在各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在当时香港的工商界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使一些中间派逐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

三、扩展宣传阵地

我们要在新闻战线上取得胜利，仅凭《经济导报》力量毕竟是微弱的，因此必须扩展宣传阵地。一九四七年，香港各大报社都增聘经济记者，扩大经济版，以加强业务竞争能力。《经济导报》的一些同志，提出趁此机会派干部到各大报社去占领阵地的主张。财经委对此事进行了讨论，并作了安排。这年五、六月间，派陈文川、麦扬、容若思进入《华侨日报》，下半年又派杨文炎、雷起予进入《工商日报》协助原来在该报担任采编的林铃；一九四八年三月派黎裘进入《大公报》，年底调邱陵去《华商报》，这年下半年又派容若思去香港路透社分社工作，同时派陈伯钧进入《华侨日报》。至此，除《星岛日报》之外，我党通过《经济导报》派出的采编人员基本上控制了香港几家大报的经济版，使它们成为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压制民族工商业、掠夺人民的宣传阵地。被派出的同志肩负两重任务，他们白天要进行采访，并为

《经济导报》开展工作，晚上回到各自的报馆撰稿和编辑，工作十分紧张。尽管如此，他们凭着一颗赤诚的心和火样的热情，以苦为乐，以完成任务为荣，愉快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被派到反动报社和中间派报社工作的同志，在宣传上虽有所倾向，但不能表现得太红，必须稍为灰色一点，在社会上公开活动还要保持慎重的态度。特别是在反动报社工作的同志，必须在隐蔽中坚持斗争。他们都能坚持到底，完成了党所交办的任务。

四、成立“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

《经济导报》的党员，不仅要把刊物办好，还要负起统战工作任务。“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就是我们团结经济记者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香港光复以后，各大报为了争取工商界、金融界的人士订阅和发展广告，均辟有经济版。不论左、中、右报社，每家一般有两个经济记者，最少的也有一个专职记者，总共十多人。为了团结这批记者，做好新闻界统一战线的工作，由赵元浩、林铃、陈文川、孙孺等同志发起组织“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成立。参加该会的有《华商报》的赵元浩和孙孺（他们当时是《华商报》的记者兼任“导报”编辑），《华侨日报》的陈文川、麦扬、容若思，《工商日报》的林铃、杨文炎、雷起予，《星岛日报》的潘霞飞、

宋明，《新生晚报》的刘国钧，《国民日报》的英冰若、陈伯钧、黎仕英。一九四八年春，《大公报》和《文汇报》在香港出版，又增加了《大公报》的谢润身、黎裘，《文汇报》的王思曙、刘士伟等人。

“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一般是每周聚会一次。或以聚餐、茶会形式，或以集体参观、采访形式进行。每次聚会一般是针对每周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共同交换意见。对许多问题，通过交谈、互相协调，然后分别在各家的报纸上发表意见，或刊登新闻。这样做有利于我们的宣传。

五、调查研究，搜集经济资料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人民解放军开始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不断溃败，国民党官僚资本被迫向香港转移。这时，《经济导报》就揭露四大家族的资本在国内流动的情况，并对它们在香港的金融、股票、贸易、企业、地产等方面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同时对国民党四大家族和地方实力派驻在香港的经济机构，如中中交农四行^①、中央信托局、资源委员会、招商局等单位及其所属机构，也进行了调查。当李宗仁被选为国民党政府的伪总统后，“导报”还专门调查和搜集了桂系官僚资本在香港活动的资料。这些调查材

^① 即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

华料，有的整理后送交财经委；有的在《经济导报》、《商报》及与“导报”有联系的报纸上刊用。如陈文川通过私人关系接近张发奎的副官处长，了解到他们一小撮人勾结美帝垄断资本集团的卖国活动后，在《华商报》第一版上作了全面揭发。此事轰动一时，弄得这一小撮人手忙脚乱，使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在香港的代理人非常狼狈。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我们准备提供接管华南各大城市的资料，进一步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在“导报”内部成立了财政、金融、贸易、工业、交通（包括城市建设）等几个小组，任务是搜集和研究有关材料。小组成员由本社人员自行选择，但也吸收社外人员。如交通和城市建设小组的成员，除雷起予、邱陵以外，还有香港《文汇报》的胡星原等人。

为接管广州，赵元浩组织了一个以广州大学副教授伍顽立为首的小组，成员有林燮寰、曾锐成、谢绍康、吴清泉等人。这些人都是原来广州报社的经济记者，他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收集有关经济情报和动态，对于接管广州的官僚资本企业起了作用。小组由赵元浩、孙孺等具体联系。在广州解放前夕，小组部分成员进入了解放区。

六、推动港商对解放区开展贸易

解放战争后期，东北、华北解放区日益扩大，收复区恢复生产需要原料和器材，部队需要军用物资，这就需要

和香港进行贸易。当时，香港工商人士对国民党的反动性虽有一定认识，但对共产党的政策仍有怀疑。《经济导报》的编辑和记者，在和工商界人士的接触中，经常向他们介绍解放区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情况，宣传解放区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并有意识地鼓励和介绍他们在东北、山东解放区及北朝鲜开展贸易，逐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顾虑。平津解放以后，为了沟通北方与香港的贸易关系，《经济导报》又作了推动工作。陈祖沛（香港大成行经理）、黄长水（港菲出口商会主席，泉昌公司经理）等人首先开展港津贸易，主要采取易货办法。由香港运到天津的主要是生产资料，如工业原料、器材、化肥、医药用品等，由天津运往香港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如大豆、生仁、牛皮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极力阻挠天津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对工商界人士进行恐吓，胡说不许与“匪区”做生意，甚至制造不利于天津与香港进行贸易的谣言。“导报”针对这些恐吓与谣言，在工商界中进行了工作。一方面宣传我党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联合有关报社辟谣。因此曾经发生了一个笑话：《工商日报》在同一天报纸的两个版面上，刊登了自相矛盾的消息。该报头版（要闻版）刊载“中共炮轰香港货船”的消息，同日经济版却登出相反的消息，否认香港赴津货轮被炮轰，并详细地报导了香港与天津进行贸易的情况。

七、开展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经济导报》的编辑和记者，利用其合法身份接触工商界人士，积极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和财经委下属的统战小组（由周康仁、何平同志负责）的同志并肩作战，协助他们组织“香港工商俱乐部”，同时在香港工商界三大社团（即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九龙总商会）中开展了统战工作。

华商总会是香港最大的华人团体，香港华人商业公会都是它的属会，在香港的中国人中有很大的影响。一九四八年春，香港华商总会酝酿改选。华商总会的未来人选一向是各方面逐鹿的对象，这次改选又是香港光复后第一次，当时国内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国民党伪国大正在准备召开，因此更加引起各方面人士的注意。

一九四八年春，华商总会竞选的局势已经表面化，竞选对手是以雷荫荪、徐季良、蔡贞人、赵耀华等人的“七君子”为一方，以新世界药房高卓雄等为首的新兴商人为另一方。我党对两方面人选的情况都事先做了调查研究，了解到以雷荫荪为首的一派，因雷本人年纪老，实际上幕后人物是徐季良、蔡贞人等人。徐季良是上海青红帮人物，与国民党关系密切；蔡贞人是C.C.分子；赵耀华是日本统治香港时的密探，这一派在政治倾向上是反动的。而高卓雄是经营西药的商人，属于战后新兴商人，思想上接受新鲜

事物，在香港工商界上层人物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党决定在华商总会竞选中支持以高卓雄为首的一方。而国民党港九总支部则公开支持雷荫荪一派。

根据上述的情况和分析，财经委决定由《经济导报》出面，利用各种渠道支持高卓雄一派。这时《经济导报》、《华商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等各报经济版，分别发表了有利于高卓雄一方的文章和报道，包括人物介绍和他们的言论等，提高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同时《华商报》和《经济导报》的工作人员又系统地揭露徐季良、雷荫荪、蔡贞人等人的政治面目，使香港政府和工商界人士为之震惊。同时，《经济导报》派赵元浩、陈文川为高卓雄一方出谋献策，派杨文炎专门做高卓雄的工作。其他人员则以记者身份，对双方的情况进行采访，然后把对方的活动情况提供赵等参考，使他们更便于研究对策。我们还以记者的身份，对华商总会属下重要的同业公会进行工作。如曾对港菲进出口商黄长水、华南纸商会的李文祺、五金商会的彭昇平，果菜商会的叶若林，维大洋行的王宽诚，南北行公所的汤秉达等人做工作，争取他们及其属下同业公会、企业支持高卓雄一方。这些人中有的成为高卓雄班子的主要人物，如李文祺后来担任华商总会司库；有的至今还是华商总会的负责人，如王宽诚、汤秉达、叶若林等。此外还争取了一些中间状态的企业和团体，支持高卓雄一方。

国民党港九总支部为了对雷荫荪等人的支持，动员了他们在香港的舆论机构和掌握的一些同业公会也大做工作。双方斗争很激烈，经过一番较量，结果，高卓雄的一方获得大胜，取得了华商总会的领导权。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联系华商总会打下了基础。

高卓雄掌握了华商总会领导权以后，我们继续派杨文炎做他的工作。他对我们的态度比较明确，对进步的活动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香港华商总会首先升起五星红旗，并组织第一批港澳工商界回国观光。当五星红旗在香港空中飘扬时，多少人激动得流下热泪！工商界中的反动分子则惶惶不可终日。这是我党统战工作的胜利，是经过在香港的工商界中尖锐复杂的斗争取得的成果。

“导报”还作了争取“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工作。此联合会是拥有全港九工业行业的团体，尽管主席岑载华对我们的态度不如高卓雄明朗，但我们并不放弃对他进行工作。此外，还对该会的办事人员、理事及其所属同业工会做工作。从而加深了对中华厂商联合会及其企业的联系。

另外对九龙总商会，由于其会长谢伯昌是国民党的死硬派，我们就对其所属同业公会及企业进行工作。

八、为灾区和游击区募捐

一九四八年夏，党发动港九各界捐款救济灾区。《经济导报》接受了这一任务。每个工作人员除了自己捐款以

外，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发动各界人士捐款。所捐款项均由捐献者直接交《华商报》转交。一九四九年初，某音乐家夫妇来香港。《经济导报》为了给游击区募捐，请他们公演，为其推销入场券。一月十九至二十日他们在香港大酒店公演，所有收入除付场租和其他开支外，和“导报”各得百分之五十。“导报”将所得收入全部转交游击区，供购买药品和军需物资。

《经济导报》还为游击区募捐医药用品，主要是向西药行业工商界人士和企业募捐，其中新亚药厂捐了价值七千多元的药物。

《经济导报》从创刊到全国解放，为党在海外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如派干部支持达德学院，创办建中工商专科学校；有的同志还兼任这两个学校的教授。这两个学校为接管两广城市提供了人才。

《经济导报》的同志们，在党的培养下政治和业务都得到了提高。留在香港工作的，在实践的锻炼中都已成为香港各大报社或企业的负责人；回到国内的，均已从事各级行政、业务及学术界的领导工作。

当我们回忆《经济导报》这段历史时，十分怀念陈文川同志。他是“导报”的创始人之一，为了“导报”的发展，为了党的事业，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战斗，他不仅是一个好编辑，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忠于党的事业

的好同志。全国解放后，他在广州工作。“文革”时期，他在广州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冤诬迫害致死。他死得很惨，我们衷心地哀悼他，怀念他。

《中共党史资料》征稿启事

一、《中共党史资料》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资料性内部刊物。

本刊的宗旨是：本着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尽力为学习、研究和编写党史以及对广大党史爱好者提供有价值的新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服务。

二、《中共党史资料》的主要内容是：新发现或没有公开发表过的重要档案、文献资料，党史专题资料，党史专题座谈纪要，专人专题访问记，革命回忆录，人物介绍或传记，重大党史事件的大事记，重要人物的年谱，史实考证，综合整理的重要资料，译文和港台报刊资料，以及转载报刊上发表过的一些重要党史资料等。欢迎全国各党史资料征集单位、各党史研究单位、各大专院校和军事院校的党史教研室；广大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者、党史研究工作者、党史教学工作者和党政军部门的老同志踊跃投稿。

三、来稿请用横格稿纸缮写清楚，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发表时署名自便）、工作单位和通讯地点。

四、请勿一稿两投。来稿一般不退，如需退还，请注



2 023 2953 2

明。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五、来稿请寄：北京一九二九信箱《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四辑

作者 =

页数 = 278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